陶瓷之路

——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

［日］三上次男著　胡德芬译



TAOCIZHIL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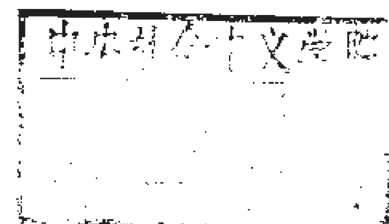
陶　瓷　之　路

——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

〔日〕三上次男　著

胡　德　芬　译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陶瓷之路
——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
〔日〕三上次男 著
胡德芬 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787×960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03千字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300
统一书号：11072·122
定价：0.65元

中译本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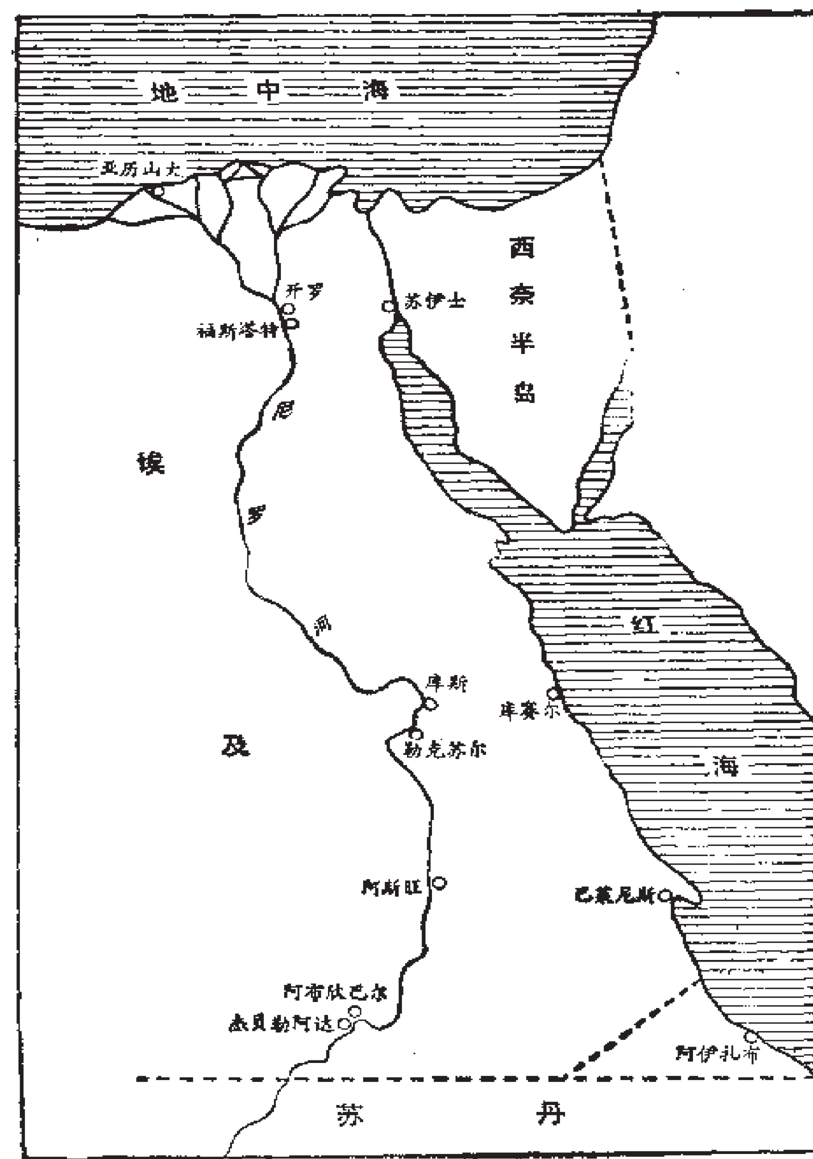
这次欣闻拙著将在中国翻译出版，不胜雀跃。拙著主要是从考古学方面进行阐述，以说明中国陶瓷自古以来是如何地被输往海外各国，而在海外又如何地得到重视。并且还拟通过这些事实，探索中国与外国之间在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方面的具体情况。因此，此书能为许多中国读者阅读，对我来说，至感快慰。

我对这方面的问题感到兴趣，始于五十年代中期，迄今已近三十年。在此期间，我获知中国陶瓷器的输出，近则到附近的东亚各国，远则达中东各国以及欧美。通过研究，还学习到：古代和中世纪中国陶瓷器生产的实际情况，陶瓷器生产与（同时代的）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关系，当时的贸易实况，以及在输入中国陶瓷的各国之间所出现的陶瓷制作技术上和文化上的影响等等。但是，研究还很不够，所以今后仍

须继续学习。在这方面，并且希望中国诸君的指教。

三上次男于白水书屋
一九八二年二月

目　次



地中海
亚历山大
开罗
福斯塔特
苏伊士
西奈半岛
尼罗河
埃及
库斯
库赛尔
勒克苏尔
红海
阿斯旺
阿伊扎布
苏丹

一　遥远的埃及地方的中国陶瓷

——在埃及流行的中国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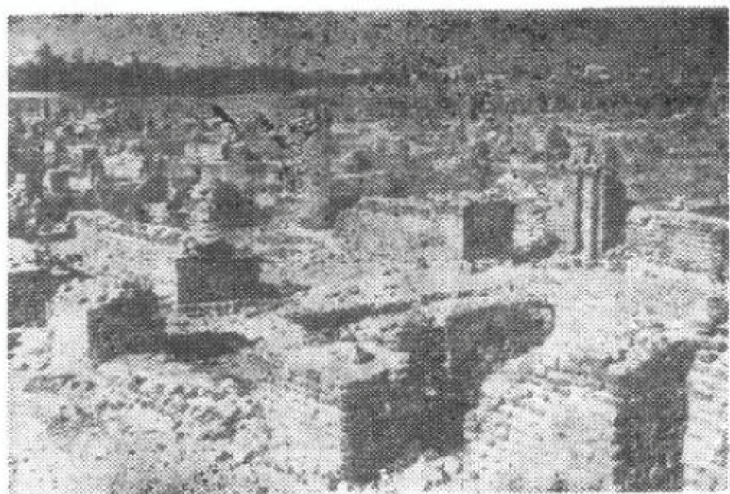
在福斯塔特遗迹上

一九六六年二月初，在一个余寒犹厉的晴冬之晨，我又站立在阔别二载的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遗迹上，缅怀着中世纪的都市遗迹。

建造已达千年或更早的一排排结实的砖房遗址，如今已成了可怜的废墟，一望无际，连绵不断，这就是蔚为壮观的中世纪伊斯兰都市的遗迹。

从一九一二年起陆续发掘出来的房屋，虽然其大小格式千差万别，可是极目望去，多数都围着坚固的砖墙。其内部结构，既使从现在看来，也是相当奢华的。底楼庭院的正中央，建有四角形或八角形的精致小水池，中间装有喷泉，水从屋顶的大槽通过埋在砖墙里的陶制水管流入水池。

以水池为中心的庭院四周是居室，从一角有楼梯可登二楼。在炎热的夏日傍晚，家族们团聚



福斯塔特遗迹

庭院，一面欣赏水池的喷泉，一面谈笑纳凉。墙壁上厚厚地涂抹着灰泥，上面似有各种装饰，有几处还隐隐地留着刻有线条花纹和壁画之类的痕迹。到处都能感觉到千年以前曾经充满着这个地方的阿拉伯气氛。此外，居然还有地下室，其中一部分是作为贮水池用的。

记载中甚至还有七层楼的房屋。总之，由于这些房屋大大小小栉比连领，因而使这个遗迹延伸很广，其中既有官署，又有商店和仓库；既有面粉工场，又间有玻璃和陶器作坊。埃及人民自豪，这是中东的庞培①，也并非没有理由。

在房屋之间的道路中曲折穿行，也是别饶风味。从这里到那里地逶迤穿行，有时甚至莫知所

穷，当古代道路二侧围着高墙的时候，真是名副其实的迷魂阵了。

中世纪都市的这种迷魂阵道路，据说是出于一种军事上的需要。一旦外敌入侵，可以引敌迷惑，从实地观察，这种解释也是可信的。

沿途处处有井，水源似乎来自尼罗河的地下水，甚至在深达四、五米之处仍有积水，地面上在当年想必置有井栏，但现在却已无存，倘夜行时失足落井，无疑就要淹死。听说入夜后野犬横行，甚为可畏，又有狐狸之类出没其间。白天则秃鹰不断地在天空盘旋，大概是有什么猎获物吧。

福斯塔特遗迹上，类似这样的废墟接连不断，长达几公里。千载往昔，景象繁华，令人神往。置身于如此壮观的废墟之中，不禁发人深思：人类社会的艰苦经营，究竟是为了什么？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历史呢？

你若登上稍高一点的废屋极目四望，则埃及五千年悠久历史中的艰苦经营，就会展现在你眼前，对于人们在尼罗河谷地上的那种难以想像的意志、生存欲和物质欲，你必将受到强烈的感动。

耸立在遗迹东侧的白垩纪石灰岩山丘，叫做马加坦山，五千多年以前，建筑金字塔的二百三

十万块大石料，就是从这里开凿出来的。在这座山丘里，现在一定还渗透着奴隶们的汗血，回响着迫使奴隶们血汗交流的神权的声音。

在其北面的山丘上，建筑着开罗引以自豪的伊斯兰时代的庄严城堡和气势磅礴地屹立在城堡上的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同时还有一座火箭形的光塔（又称尖塔），宛如刺破青天。

北面的重重叠叠的房屋和清真寺群，是阿拉伯人的开罗市区。这百余万贫富悬殊的人们，千百年来，一直在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中从俗浮沉，世世代代地在这里繁衍生息。

向西遥望，能看到吉萨的三座大金字塔②，它们静穆地浮现在沙漠之上。

这一切，都是人类主宰的历史缩写图。像这样规模宏大的历史遗迹，是今天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都不曾见到的。

使我们这些游子对历史产生无限感慨的福斯塔特都市遗迹，就是我们第二次福斯塔特调查团（出光中东文化调查团），在今后二个多月中要停留在此进行调查工作的场所。

假使有人问我们这次调查的目的，我们的回答是，要彻底调查从这个中世纪遗迹中发现的大量中国陶瓷，以及当时在埃及生产的中国陶瓷仿制品。中国陶瓷——它是在隔山阻海、远达一万

五千公里以外的东亚之地制造的。不消说，必须通过巨舟大舶和驼峰马背，才能运到这里，这中间一定是一条困难重重的陶瓷之路。

福斯塔特遗迹的重要性

访问开罗的人，都要去看看吉萨或沙加拉的金字塔，要去埃及博物馆领略一下法老时代帝王贵族的荣华和文化古迹。但是在今天，到目前世界伊斯兰教一大中心地开罗去访问的人，其中能够懂得福斯塔特城在历史上的无比重要性的，在日本人中间，真是凤毛麟角。

这是因为地处亚洲东端的日本，至今尚未充分认识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性。但是欧洲的同行们却不同，他们已从理性和感性两方面，都体会到伊斯兰世界在政治上和经济活动上的重要价值，以及在文化上的贡献。

欧洲自从公元七世纪与伊斯兰世界接触以来，在此后的漫长历史中，不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提出了重大的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假使不与伊斯兰世界作对比，那就很难设想欧洲世界的形成与发展。

这个伊斯兰世界的一大中心就是埃及，而埃及的中心就是开罗。

福斯塔特遗迹是今日开罗的前身，是公元六

四二年阿拉伯军队征服埃及后最初建设起来的城市。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中，它是继美索不达米亚的巴士拉（公元六三五年）和库法（公元六三八年）以后，阿拉伯军队所建设的第三个城市。在伊斯兰历史上，这个城市称得上是伊斯兰躯体成长的纪念碑，因而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下面且让我简单地叙述一下这个城市的兴亡史。

福斯塔特的历史

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它不仅是东地中海沿岸的重要都市，也是东北非洲的要地，而且又是沟通红海、连接地中海和阿拉伯海的东西方交通线上的枢纽，它集中了这个地区的权力和财富，因而在任何年代都受到重视。

在拜占庭时代③，埃及也是这个帝国的重要领土，尼罗河畔建立了巴比伦城，从而把埃及严密地掌握在这个帝国的手中，今开罗南郊的科布特博物馆所在地，即是过去的巴比伦城廓旧址，当时的部分石砌城墙，至今仍然残留在博物馆的一边。

公元七世纪初，伊斯兰的势力在阿拉伯半岛上崛起，他们当然不会放过富庶的埃及，到公元六四一年，当第二代哈里发④乌马尔时，就派遣将军阿穆尔进攻埃及。

他们就这样在公元六四二年占领了巴比伦城，将军阿穆尔在离旧城不很远的地方修建了赞美安拉神的礼拜堂（阿穆尔清真寺），旁边修造了他的官邸，于是，尼罗河的财富就归阿拉伯人所有了。

阿穆尔清真寺留存在开罗南郊，它后来曾被重新翻造过近十次，每次都有所扩大。创建之初，它四边围墙，屋顶覆以芦苇，看来是非常简陋的。

但是，由于这个清真寺和总督官邸是统治埃及的中心，所以围绕着这个中心，不久就出现了政府机关和鳞次栉比的住宅。有了市场，形成了城市，这就是福斯塔特。

福斯塔特意谓营地，亦即军营之意。此一词汇足以说明这个城市形成的情况，所以很有意义。

福斯塔特城逐渐向四周扩展，伊斯兰帝国在埃及的权势于是日益巩固。这里确立了地中海和北非的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地位以后，城市随着发展，建筑日趋完备，这样，福斯塔特就名副其实地成为尼罗河流域的中心都市。

城市扩大后不久，中心有往北面转移的趋向，于是在城市北面出现了新的政治中心阿斯加尔。最后，埃及成立了从巴格达政权独立出来的

都兰王朝（公元八六八一九〇五年），这个王朝以今开罗城东面的都兰清真寺为中心，兴建了新的政治中心地加塔伊。

接着，建立在突尼斯的法蒂玛王朝占领了埃及；形成了以这里为轴心的庞大的政治势力（公元九六九——一一七一年），在更北面建起了新的政治中心比拉（胜利之意），这就是今天开罗这个名称的由来。

虽然政治中心已如上述地往北面转移，但往昔的福斯塔特城却作为产业中心而继续繁荣，马路纵横伸展，高楼大厦鳞次栉比。

但是不久，这个繁荣一时的福斯塔特却面临了它的末日。与第二次十字军⑤一起进驻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军队发起了进攻，为了埃及的财富，他们于一一六八年包围了开罗。由于当时法蒂玛王朝宫廷内部的纠纷很多，势力已江河日下，所以无法击退十字军，相反地，他们唯恐开罗南部的这个产业中心福斯塔特陷入敌手，决定将它付之一炬。

根据传说，当时在福斯塔特市街上装置了一万五千个油脂炸弹，这个长期来以繁荣自豪的城市，就这样凄惨地烧毁了。据说大火燃烧持续了五十四天才告熄灭。如今漫步在遗迹上，可以看到到处散落着的炸弹碎片。是用无釉陶烧制的坚

硬的石榴形炸弹。

这种焦土战术的断然采用，虽然勉强防止了政治中心开罗的陷落，但是已经遭到肢解的法蒂玛王朝，其实力更丧失殆尽，终于在公元一一七一年灭亡。

这个烧毁了的大城市遗迹，后来就一米、二米、三米地掩在沙漠的风沙之下，加上因建设北部的新城市而搬来的废土又倾倒其上，于是遗迹就深深地进入了千年的酣睡之中。

福斯塔特遗迹的发掘及其遗物

二十世纪初期，阿拉伯民族主义唤醒了福斯塔特的沉睡。埃及曾经长时期受土耳其的统治，十八世纪以后，又沦为欧洲各国的殖民地，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在阿拉伯人的埃及，民族意识提高了，注意力于是倾注在根究自己的历史上面。由于这种原因，福斯塔特遗迹就作为伊斯兰时代的最古老城市而显露头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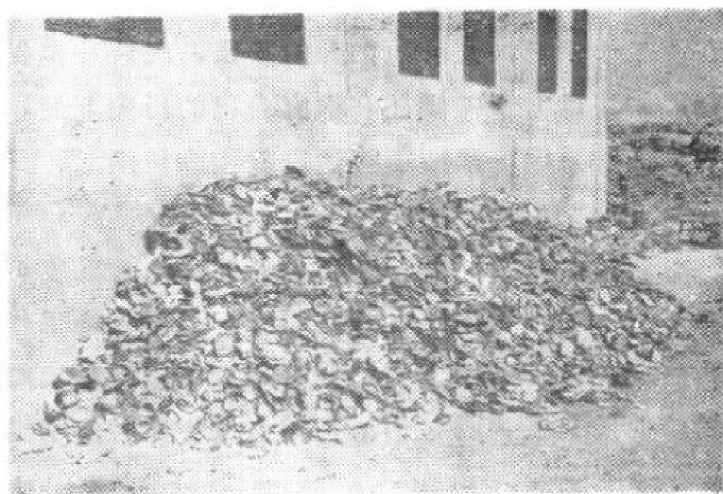
这样，就在一九一一年起开始了遗迹的发掘调查，一直持续到一九二〇年*。负责发掘工作的是埃及学者阿勒伊·巴贾特博士。值得指出的是，他后来成为阿拉伯博物馆（今伊斯兰美术博

* 阿勒伊·巴贾特，艾伯特·加布里埃尔：《福斯塔特遗址的发掘》，巴黎，1921。

物馆）的实际创始人。遗迹的全貌虽已清楚，但发掘工作此后仍断断续续地进行，阿拉伯联合考古局和美国研究中心这两个组织，最近也还在对这个古代城市的遗迹进行探索。

我们之所以在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六年先后两次以这个遗迹作为工作场所，并非为了对遗迹本身进行发掘，而是为了调查其地下埋藏着的为数众多的遗物，特别是调查其中的陶器。

从这个遗迹发现的陶片为数甚巨，被携带出国的也相当可观。但是留在那里的仍有极大数量，在遗迹中央的两座仓库里堆积如山，其数恐上百万片，经调查计算以后的比较可靠的数字，大概也有六、七十万片吧。



福斯塔特出土的陶片（整理中）

陶片大部分是七、八世纪到十五、六世纪的遗物，而其中也有更为晚近的。既然福斯塔特毁灭于十二世纪末叶，可是陶片却有十六、七世纪以前的，骤看颇觉不可思议，但前面已经指出，因为此处毁灭以后，北部建立新城市所运来的废土之中也杂有陶片。

除了陶片以外，还有数十年的沙尘，也和陶片一起堆积在仓库之中。

且不说陶瓷研究者，其他如研究东西方贸易或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专家们，也无不把这些陶片作为注意的对象。因为这些陶瓷是经过一万五千公里以上的海路，从东亚的中国运到埃及的福斯塔特来的，更何况数量又是异常的多。

虽然欧洲各国的学者们强烈地希望调查这些陶片，但仓库一直严扃，并不因他们的要求而开放。战后，由于小山富士夫氏斡旋的结果，总算获得了机会，调查工作终于委托给了日本，这是因为日本在陶瓷器研究方面的实力受到了赏识的缘故。

我们的工作是一面掘开堆积如山的陶片和沙尘，一面逐片检视。首先从中检出中国陶瓷片，把它们进行种类和时代的分类、计数、测定，最后用同样的方法，调查埃及制造的中国陶瓷仿制品。

因为这是不可再得的机会，所以也乘机尽可能地搜索埃及独特的陶瓷以及从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输入的陶瓷。至于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次调查，此中原因，当容后再叙。

虽然我曾和小山富士夫氏等于一九六四年共同努力从事这项工作，但是要调查堆积如山的六、七十万片陶瓷，却实非易事。因此，第一次调查工作中辍以后，又进行了第二次调查。通过前后二次调查，总算大致达到了目的，我们的责任卸掉了一半。不过，要完成正式报告的撰写，我们仍肩负着一半责任。

陶片按类别区分以后，其中以在埃及制造的为最多。但是也有很多是来自埃及以外的，例如地中海周围的叙利亚、土耳其、塞浦路斯、意大利、西班牙和北非，当然也有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的陶瓷，甚至还有远在东亚的泰国、越南和中国的陶瓷，并且还包括少量的日本伊万里⑥的制品。简直像一个世界陶瓷片的展览会，也可以称得上是世界陶瓷研究的宝库。

中国陶瓷的发现及其性质

根据我们两次调查的结果，在收藏于福斯塔特遗迹仓库里的陶瓷片中，中国陶瓷片约有一万二千片。

一万二千片这个数字，说起来简单，但堆叠在那里，看起来却是相当可观了。假使全部陶片为六十万片，则六十片中就有中国陶瓷一片。在福斯塔特遗迹出土的陶瓷片中，除了属于埃及的以外，与其他地方的陶瓷片相比较，这个数字显然已经很多了。正如以下还要叙述的，在中东和东非沿岸的许多伊斯兰时代的遗迹中，同样也发现中国陶瓷片，但是，福斯塔特遗迹中的出土数量，是其他遗迹所望尘莫及的。这不仅对研究中国陶瓷，也是对研究中世纪埃及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方面所提供的重要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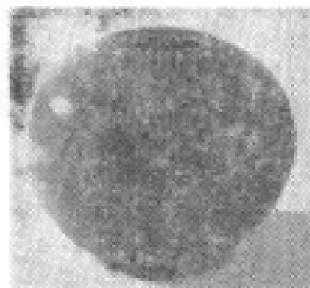
更须特别指出的是，从这个遗迹中所发现的中国陶瓷片，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品质也很优异。

这里发现的中国陶瓷片，包括从古代八、九世纪的唐朝起，直到十六、七世纪的清朝为止。在这段时期中，中国制造的著名陶瓷，几乎都包括在内。

埃及陶器与中国陶瓷

因为下面经常要提到中国陶瓷，所以这里有必要把中国陶瓷的发展情况回顾一下。

首先得从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开始叙述，即世界上什么地方最早制作陶器？最古老的陶器



越州窑
（出光美术馆收藏）



青　瓷
（阿尔德比勒收藏）



白瓷
（阿尔德比勒收藏）



青白瓷
（日本松山古城出土
出光美术馆收藏）

出现在埃及，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初期，这里已经制作了呈铜色的、闪耀着土耳其阿齐布尔的碱性釉彩的陶器，这是距今约五千年以前的事。

这种陶器的色调有一种埃及风味的神秘感，和以后用陶土作坯子的陶器不同，它是把硅石研成粉末作坯的，这是古代埃及陶器的一个特征。在相同时期，美索不达米亚也出现了性质类似的施釉陶器，现在还不明白，它们在时间上孰前孰后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到公元前二千年，当埃及进入新王国时代的中期，发明了在青釉的内层，用锰的黑紫色绘上池鱼嬉水或睡莲等的技术，埃及陶器因而有了发展前途。这样，到了公元前一千年前半期，无论是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都能分别用涂上青、绿、黄等各种颜色的釉，做出雅致的花纹。总之，这种陶器的制作方法，延续了近三千年之久，直到埃及进入罗马统治的时代。

可是，公元前二世纪以后，在东地中海沿岸一带，出现了与过去不同的陶器制作方法。就是用可塑性较大的陶土作坯，随心所欲地做成各种形状，并用以铅作媒溶剂的釉（铅釉）来润色陶器。用这样的方法，就能显出铜绿、铁黄褐、锰紫等鲜艳的色彩，这是一种迎合罗马人喜爱的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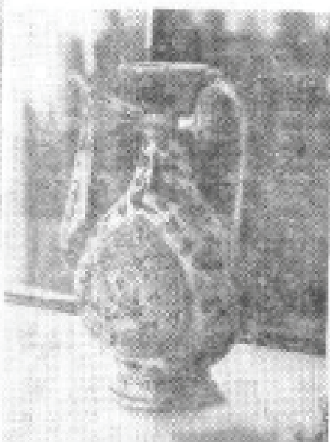
元代的青釉瓷器



明代的赤絵



明初的青釉瓷器



明代的金襕手

从这以后，出现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的碱性釉彩陶器和起源于东地中海沿岸一带的罗马系统的铅釉陶器，这两者同时在中东地方制作，一直到公元七世纪以后的伊斯兰时代为止。到了伊斯兰时代，中东的陶器因受到下面将要叙述的中国陶瓷的影响而获得迅速发展。于是，伊斯兰陶器和波斯陶器就名闻西方世界。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当在下文另叙。

那末，在东方世界的各种陶器中，以什么为核心呢？这正是中国陶器。

中国最早出现陶器，为时远比埃及要晚，当在公元前二千年后半期的商朝。当时的陶器，其性质与埃及完全不同，是呈铁色的灰釉陶器。这种陶器表面呈褐色或暗褐色的素淡颜色，其色调有中国风味的感觉。这种性质的陶器，以后一直继续制造，成为古代和中世纪中国陶瓷的主流。

及至后汉中期（公元二世纪），出现了与已往陶器毫无联系的、呈铁锈黄和铜绿色的铅釉陶器，它和上述罗马领地东地中海沿岸出产的罗马系统的绿褐色陶器一样。中国为什么能够制作出这种陶器？假使联系到当时西方的罗马领地和东方的中国之间，已经有了以印度沿岸为中转地的通商关系，那末，我认为中国的这种绿褐釉技术，正是罗马绿褐釉技术传入的结果。

此后，中国的灰釉陶器以华南为中心，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公元四世纪初期，在浙江省地方甚至出现了半瓷体的青瓷系统陶器。这种技术，由杭州湾南岸的越州地方的越窑继承了下来。从隋（公元五八九—六一八年）、唐（公元六一八—九〇七年）、五代（公元九〇七—九六〇年）以至十一世纪的北宋初期，这里一直盛产灰釉陶器，这种橄榄色或青绿色的青瓷系陶器，就是输出到中东地方的越州窑瓷。在唐、五代和北宋（公元九六〇——一二七年）时代，福建省地方也制作了同类型的陶瓷。

在唐朝时代，华南制作青瓷系统的陶瓷，华北则制作白釉陶器、黑釉陶器，以及用绿色或黄褐色釉彩把器皿渲染得很漂亮的三彩陶器等等。唐三彩是汉朝的绿、褐釉陶器技巧的翻新，它与当时唐朝在国际上的声势相呼应，形成了一个豪华的气氛。白釉陶器和三彩陶器是当时华北的代表性陶器，它们也向海外输出。此外，当时还出现了在淡褐的底色上用绿釉描绘花纹的长沙窑陶器。

中国从唐朝后半期起，开始进入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一起变革的时期。经过十世纪前期的五代以至宋朝（公元九六〇—一二七九年），社会安定了下来，于是就迎来了陶瓷生产在量和质方面都飞跃发展的时期，从此，世界上生产的陶瓷之中，就出现了品质最佳和最美丽的产品。

具体地说，一进入这个时期，生产青瓷的中心地就转移到浙江省的龙泉地方，这种瓷器的青色，其清澈犹如秋高气爽的天空，也如宁静的深海，这就是名闻世界的龙泉窑青瓷，它和福建窑及广东窑的青瓷，一起大量地向国外输出。

当时，江西省的景德镇也是窑业的一大中心地，这里烧制着清澄的青白瓷（影青）和白瓷，福建省的水吉县烧制黑釉瓷（天目），德化县地方也烧制白瓷。此外，在福建、广东两省建了许多窑，在那里烧制青瓷、白瓷和青白瓷等，同样也向国外输出。

宋代的华南青白瓷和白瓷具有很大的特色，这是一些以陶土为原料的极好的瓷器，中国陶瓷由于这些产品而又获得一次重大飞跃。从此，世界陶瓷界竞相追赶中国创始的瓷器，制作仿制品，更加积极地致力于瓷器的制造。

另一方面，磁州成为华北的制陶中心，那里大量地生产白釉、黑釉和白釉黑彩陶器（磁州窑系统），在河北的定州，烧制宫廷、显贵们使用的高级白瓷（定窑），在陕西耀州、河南洛阳和开封附近，还烧制种种精美的青瓷（耀州窑、临汝窑、汝窑和北方官窑）。

继宋朝以后的元朝，除了烧制过去的青瓷、青白瓷、白瓷和黑瓷等等，还烧制出新型的瓷器——白瓷青花（青釉瓷器）、白瓷五彩（赤绘）和釉里红等等。青釉瓷器主要是在景德镇烧制的洁净白瓷的釉彩之下，用钴釉描绘上有趣的故事图案、写实的草花图案和复杂的蔓藤花纹等等。所谓赤绘，主要是用红、绿、黄、蓝等彩色颜料，在釉上描绘得很艳丽的瓷器。

这种用钴或彩色颜料描绘图案的方法，虽然是受了伊斯兰瓷器影响的结果，但出色的中国制陶技术，在模仿伊斯兰制陶技术的同时，就立刻精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优异陶瓷器。同样，在一面参照伊斯兰制陶技术、一面烧制出中国的新型陶器中，也有用称为法花的七宝技术渲染而成的瓷器。

十四世纪中期，当明朝（公元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兴起以后，陶瓷器的生产，仍然是中国的主要产业之一，继续制作前代的各种类型的陶瓷。只是在十五世纪以后，长期来占有华南陶瓷宝座的青瓷衰落了，代之而起的称为青花（青釉瓷器），成了中国陶瓷的代表。同时又发展了五彩（赤绘）陶瓷，出现了更华丽的类型。到这个时代的后期，还盛行采用金色的产品（金襕手）⑦，这种陶瓷象征着当时文化上的成熟。

始于十七世纪的清代（一六一六——一九一二年），上述状况也仍然没有改变，中国的陶瓷器在日益精巧的同时，还显得更为华丽。当时并开始烧制在白瓷的表面用种种色彩画上精致的花鸟图案（豆彩）的瓷器。

如上所述，在如此众多的陶瓷窑里，长期生产着大量的陶瓷器，它除了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要外，并且还向海外输出，正如后面还将叙述的，其运销范围竟远达非洲。

福斯塔特的中国陶瓷

从福斯塔特所发现的中国陶瓷器来看，首先是唐代的唐三彩、邢州白瓷、越州窑瓷、黄褐釉瓷和长沙窑瓷，其中特别多的是越州窑瓷。

从十世纪到十三世纪的宋代，是中国陶瓷生产在质量上最高的时代，当时的陶瓷计有：著名的龙泉青瓷、福建窑和广东窑烧制的青瓷，景德镇的青白瓷，德化窑和其他南方窑的白瓷以及北方定窑系统的白瓷。至于十三、四世纪的元代陶瓷，除了青瓷、白瓷和青白瓷以外，还有许多在那个时代首次出现的白瓷青花（青釉瓷器）。此外还有被认为是广东方面烧制的褐釉陶瓷。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七世纪的明代，其陶瓷的种类虽与元代大致相仿，但是由于出现了一种五彩（赤绘）

技术，因而增添了陶瓷的光洁度。

按上述品种一一列举，则中国华中、华南的重要陶瓷窑的制品，几乎可以全部包括在内。不过华北的制品较少，当系距离输出港口较远之故。但是其中却发现了可能是蒙古东部的辽的首都制作的具有特色的白瓷（即所谓辽白瓷），虽然为数仅有几片，却深深地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所有上述的中国陶瓷，都是品质极佳的。若要把各种类型全部叙述，则将费很大篇幅，所以只能略举数例。例如唐代至五代大量生产和输出的越州窑和黄褐窑等，其器皿内侧，画有篦雕或线雕的花纹，有时甚至还有少量的透雕。其色调则是用上品的橄榄绿釉所渲染，确实可称精品。

不过，仅按上述，恐怕还不足以表达优秀制品的情况，故拟与同时代输入日本的陶瓷作一对比，以资说明。

因为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人们往来其间，所以越州窑瓷和黄褐窑瓷也随着输入到了日本。今天博多港⑧平和台球场的某个地方，曾是当年接待外宾的鸿胪馆所在地，就在这里发现了相当数量的越州窑瓷，想系当时供应宾客使用而残留下来的餐具。

但是，从平和台球场所发现的越州窑瓷和黄褐釉瓷，几乎全是制作粗糙和没有任何花纹的。

它们与从遥远的福斯塔特出土的相比，显得绝不相同。这就不得不使人想到，这两个地区之间，其财富必有极大的差距。

越州窑瓷近来已成了重要的观赏陶瓷之一，日本也有很多输入，为收藏家所珍藏。但就连这些珍藏品中，也很少有像从福斯塔特大量发现的那种优质越瓷。由此可见，在公元九、十世纪的古代，那些输往福斯塔特的商品，确实是精选出来的优质品，这真正使我们感到诧异。

那末，在中东的其他地方到处残留着的中世纪都市遗迹中出土的越州窑瓷，是否处处都是优质产品呢？其实并不如此。在伊朗内陆的东西交通要道上的重要中世纪都市遗迹内沙布尔，以及波斯湾沿岸和东非沿岸的港口遗迹中，虽然也出土了相当数量的越窑碎片，但它们的质量和从日本博多港平和台球场所出土的大致相同，都是一些供输出用的普通产品。

我不嫌冗长地以最古老的越州窑瓷为例，作了以上的叙述，这是因为这个例子对于从福斯塔特发现的任何一种中国陶瓷都是适用的，所以此外就不再赘述了。还得补充一点的是，在这里也发现了元代的青釉瓷器。

这种青釉瓷器为景德镇所烧制，系在清晰的素坯瓷器上，用鲜艳的钴蓝色画上花鸟风景或人

物等的白瓷青花（青釉瓷器）。这是中国在蒙古世界帝国即元朝的统治之下，受波斯伊斯兰陶器技术影响而生产出来的。元代的白瓷青花花样繁多，笔法锋利，充分体现出这个王朝在其开创时期的强盛。而且，毕竟因为是初期制造的东西，所以为数不多，因而极受珍视。根据小山富士夫氏的说法，元代白瓷青花的完整品，在世界上仅存二百件左右。

在福斯塔特遗迹中，这种元代青釉瓷器的优质瓷片，出土了好几百片，虽然只是些碎片，但对于研究元代青釉瓷器，却是很难得的资料。

总之，即使在中国，元代的青釉瓷器也被认为是价值连城的。在相隔如此遥远的福斯塔特遗迹中竟发现大量碎片，这就可以设想，或是当时的开罗市民相当富有，或是他们嗜好珍奇，或是他们喜爱中国产品，或是中国陶瓷的使用价值很高，这些原因想来必居其一，也可能是所有这些原因凑合在一起，才导致发生这种异乎寻常的事。

中国陶瓷的仿制品

从其他方面，也可以证明当时埃及人对中国陶瓷的爱好情况。

前面已经提到，在福斯塔特遗迹的仓库里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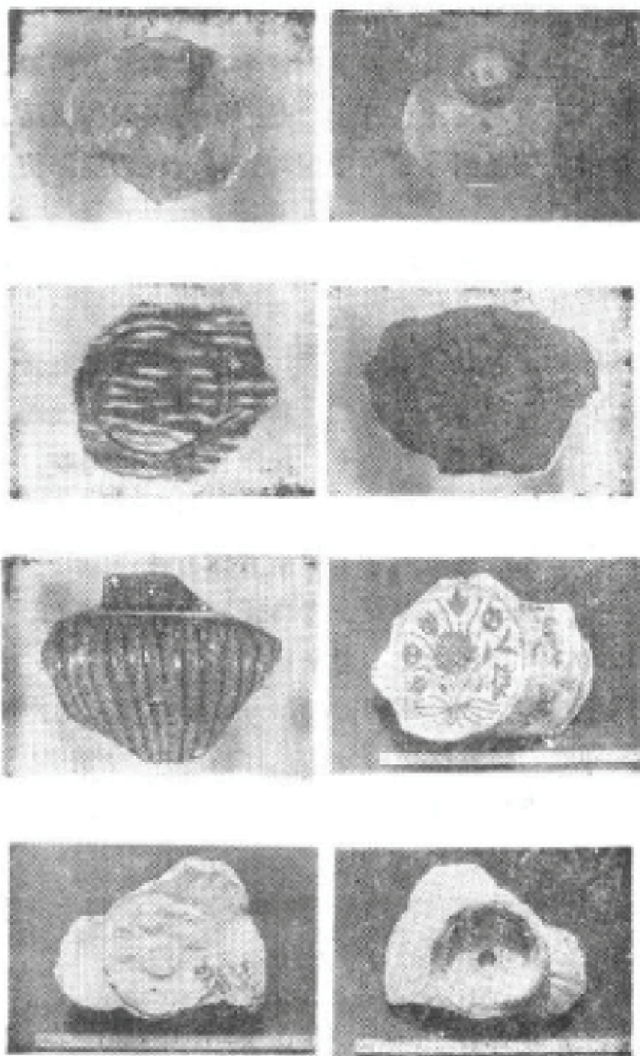
藏的陶瓷片，为数达六、七十万，其中大部分都是埃及制造的。

在这些埃及制造的陶器中，从某些方面看，约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中国陶瓷的仿制品。这种仿制品当然是在中国陶瓷输入以后随即仿制的。

在九、十世纪，埃及已有三彩陶瓷的输入，于是就制作出模仿它的多彩彩纹陶器和多彩刻线纹陶器。在白瓷输入以后，就制作出白釉陶器。埃及所仿制的越州窑瓷，属于黄褐釉刻线纹陶器的类型。不过，九、十世纪制作的埃及陶器，一面固然模仿中国陶瓷，一面又有伊斯兰独特的色彩和工艺，从而体现了伊斯兰的特色。但到了十一世纪以后，在青瓷、青白瓷和白瓷青花（即青釉瓷器）的仿制中，看来已经是全盘模仿了。根据碎片的情况，中国的产品是瓷器，埃及的产品是陶器，这是清晰可分的，但从照片的情况来看，无论在形式上或花纹上，都有难以分辨之处。

青瓷系统或青釉系统的陶器，仅据照片简直很难分清中国产品与埃及仿制品的差异。

日本对中国青瓷的仿制品，早在镰仓时代，也已在濑户制造，但无论色调和形态，都尚未十分相似。


福斯塔特遗迹出土的中国陶瓷仿制品破片

不过在十五世纪以后，在青釉瓷器方面，日本和中国一样，都发生了伊朗式的变化。

在日本，不要说明治、大正年代，就连现在，也仍然酷爱舶来品，并且让舶来品的仿制品充斥市场。如果联想到日本的这种情况，那末，埃及在当时大量需要中国陶瓷和制作仿制品的情况，就很容易理解了。不过在当时的埃及，由于这种商品的本身销路畅通，所以也并非不加选择地仿制外国产品的。

红海沿岸的港口，阿伊扎布的遗迹

要叙述的事情正像《天方夜谭》⑤似的千头万绪，我还得在此继续谈一谈当时在埃及流行的中国陶瓷热的情况。

通过对福斯塔特遗迹两次调查的结果，在这个遗迹中发现了多得出乎意料的中国陶瓷及其仿制品，对此我们颇感惊奇，它们究竟是从何处运来的呢？诸如此类问题，我们决心探索清楚。

这些商品显然是由船舶运载而来的，但若要卸货，则只可能在红海沿岸。而红海沿岸尤其是靠近埃及的北半部，既使在今天，也是不易靠岸卸货的地方。因为这一带与阿拉伯半岛或西奈半岛一样，全是沙漠。这里十分缺乏饮水，从海岸通往尼罗河畔的几条沙漠商队路上虽然有井，但

矿物质含量太高，一般也难以饮用。

因此，对于散布在埃及沿红海的一千数百公里之间的矿山和小渔港，只好用船只到苏伊士运水，或借蒸馏海水所得的淡水来补充。总之，这里是一大片除了沙粒、岩石和天空以外别无所有的恐怖地方。

虽然是如此恐怖的地方，可是从法老的时代起，红海沿岸就已经有了港口，可供从阿拉伯或其他地方运来的香料、象牙及金银等卸货之用。到了罗马时代，这里还残存着古来闻名的港口，自北而南有米奥斯、霍尔木兹、库赛尔、巴莱尼斯等，溯昔抚今，令人神往。自从三、四千年前的古代以来，人们对珍贵物品的欲望何等强烈，对利益的追求何等迫切，而能够在沙漠海岸艰难地维持偌大海港的统治阶层，其权力又是何等巨大。

那末，在伊斯兰时代运往尼罗河畔的中国陶瓷是在哪里卸货的呢？根据古老的记录和调查报告，已经查明，从十世纪到十四世纪，在目前苏丹国境内的红海沿岸，有一个叫做阿伊扎布的港口，在这港口的遗迹上，散落了中国陶瓷的碎片。此外，在红海对岸的阿拉伯半岛上，有麦加的外港吉达，是距此最近的港口。对于这个事实，我们是从曾任埃及地理调查所所长的英国人

约翰·默里氏的几页简短报告中获悉的。他曾于一九一二年到过这里*。

原来，十二世纪后半期的著名旅行家伊本·朱巴伊尔[10]和十四世纪的大旅行家伊本·巴图塔[11]，都曾到过这个阿伊扎布港，撰写了各种津津有味的记载。此外还可在各种阿拉伯文字的记载中，见到有关这个港口的零星记载。

由此可见，从十世纪前后起，由印度方面溯红海向埃及行驶的船只，其目的地都是阿伊扎布港。至于从阿伊扎布港出发的船只，其航向一半去遥远的印度西南的马拉巴尔海岸，另一半则往西北岸的格贾拉特。所以这个港口的使命，并不仅仅是向附近的麦加航行的进香船舶的基地。根据也门的犹太商人的纪录，从印度运往阿伊扎布的商品，首先就是中国陶瓷，其次是胡椒、药草、丝绸、珍珠、铁等等。所以，在这里发现中国陶瓷，实在毫不足怪。

从十一世纪中期到十四世纪中期（一〇五八——三六八年），是这个港口最繁荣的时期，前面提到的伊本·朱巴伊尔等的记载中甚至说：“因为从印度和也门来的船只出入频繁，所以这

* 约翰·默里：《阿伊扎布》，载《地理杂志》，第六十八卷，7—12月，1926年。

里成为世界上最热闹的城市之一。”*

现在，我们决定以默里氏的简短报告为依据，从红海沿岸南下，去到阿伊扎布。就这样沿红海历尽千辛万苦，直到第七天，总算艰难地到达了阿伊扎布遗迹。

由于没有专门设置的正规道路，所以只能在沙漠中朝着南方迂回前进，而最后两天，其艰难困苦竟出人所料。载重卡车的驾驶稍一不慎，就会陷入沙漠，竭尽全力拉上了卡车，但另一辆吉普车却又深陷在沙中。

要是车辆在此动弹不得，则调查将会全盘失败。若不幸而与其他车辆失去联系，那就连生命也有危险。因为在出发以前，获悉德国调查队在西南沙漠中曾因此而造成五名队员的丧生，所以我们是抱着拚死的决心才驱车前往的。心情简直和在大海中冒险航行相似。

此行虽然备历艰苦，但从苏伊士到阿伊扎布之间，却经历了许多奇闻趣事，此处当然无暇细叙。途中有一事可以稍提的，那就是在库赛尔遗迹上，也搜集到了宋元时代的中国陶瓷碎片。库赛尔是一个港口，它曾从罗马时代持续到十三、四世纪。这样，在埃及出土中国陶瓷的遗迹，又

* 家岛彦一：《关于印度洋通商史的一次考察》，载《东方杂志》第十卷，一一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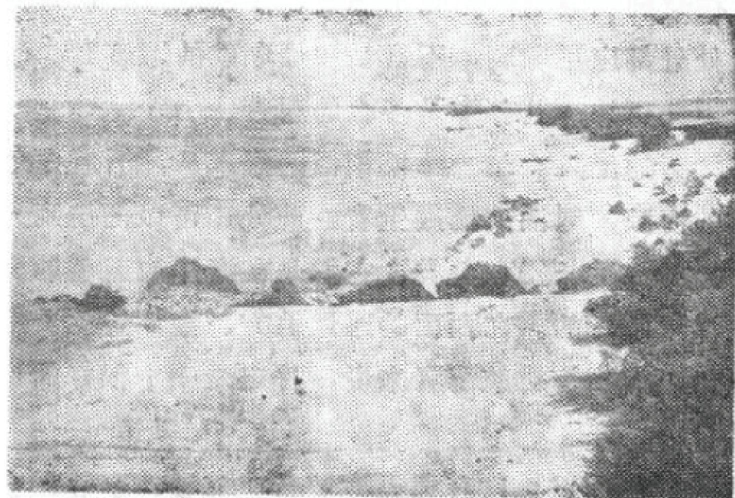
该增加一处。

总的说来，阿伊扎布是位于面向珊瑚礁海岸的荒凉沙漠和贫瘠草原地带上的一个港口，其景象极荒芜。当我们发现它时，真是不胜欣喜，我们的调查就由此开始。

阿伊扎布港遗迹和中国陶瓷碎片

遗迹沿着海岸分布，长达二公里。港口城市的中心，在海岸低地稍稍宽阔之处。它的背后是高达六、七米的海岸台地，台地上留着大小建筑物的遗迹，台地东端，则有清真寺和可能是灯塔的遗迹。

这个港口宛如沙漠上的孤岛，其居民似乎是



阿伊扎布港的遗迹

紧密为邻，聚居在一起。他们生活孤单，唯有潮汐的声音和红海上狂啸的海风，作为他们的慰藉。正因为如此，所以当贸易的商船或到麦加的进香船从海面珊瑚礁的缺口处驶来时，人们必然分外欣喜。

由于这里既无木材又无石料，所以房屋的墙壁都用切成块状的珊瑚堆叠而成。不仅如此，连建筑在住宅区四周的约三千古墓中，其石棺也是用板状的珊瑚制作的。有些石棺上有宛如鲜花怒放的花纹，非常美丽。这种形状，在我们的心坎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港口设施和四个大型贮水槽，当然也都是用珊瑚块制作的，用船只从远处运来的水，就贮藏在这种珊瑚制作的贮水槽里。在这里，建筑材料处处都应用珊瑚，不啻是“珊瑚礁的遗迹”。而由此可知，其环境是多么的艰苦。

这里只有与卧藤松相似的灌木丛，沿着白色的海滨，绿油油地滋生着，此处还可以捕捞到大量的红足长蟹和鱼类，它们是在海岸或蓝色的海洋中嬉游的。在西面的遥远地方，巍然耸立着厄尔巴石山，对航海者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好的目标。

在这里，只有那纵横散布在孤独、宁静、空无一人的沙漠海岸上的废墟，向我们倾诉着人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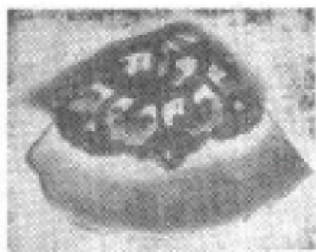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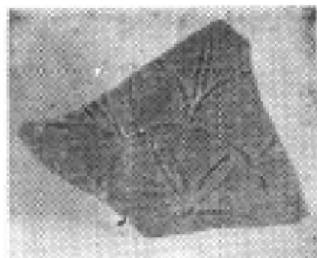
的种种艰苦经营和四百年来的苦难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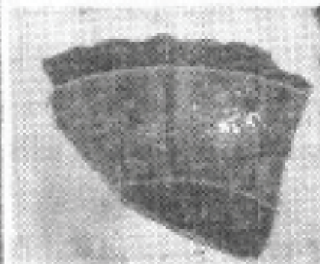
中国的陶瓷片在这里比比皆是。为了绘制详细的遗迹地图，以备今后有机会再度来此发掘调查，所以我们到处察看，而我们足迹所到之处，都散布着中国的陶瓷碎片。虽然都是些越州窑瓷、龙泉窑瓷、白瓷、青白瓷、白瓷青花（青釉瓷器）和黑褐釉瓷等的小碎片，但是检拾所得，计唐末、宋、元和明初的瓷片，为数竟达千余。在朴素的黑釉瓷壶的碎片中，竟发现了“□清香”这种戳子的瓷片，当系广州一带烧制的瓷壶，因贮存香料之类的货品而运来此处。像这样在整个遗迹中都散布着中国陶瓷的，除此以外，实在罕见。这里曾是渡越万里波涛而来的中国陶瓷的主要卸货场所，那是绝无可疑的。

根据记载，在这里卸下的货物，还要向西横穿沙漠和石山，运到尼罗河畔的库斯和阿斯旺。库斯因为是王陵所在，所以是勒克苏尔以北的著名商业城市。从阿伊扎布到库斯，骆驼商队据说要走九一十天。

商品运到尼罗河畔的库斯和阿斯旺以后，一部分沿河而下，运到尼罗河口；一部分则溯河而上，运到古代的埃塞俄比亚（今努比亚沙漠的南部）。

中国陶瓷就是这样历尽海陆运输的一切困难





福斯塔特遗迹出土的中国陶瓷片

和危险，从福斯塔特和开罗运到亚历山大去的。在这数万公里艰难的旅程之中，不得不使人惊叹，表现在各个方面的人类欲望，是何等地深刻和强烈。

到这里为止，我所叙述的，还限于福斯塔特遗迹和阿伊扎布遗迹的掌故。但是，假使能到开罗去走一走，就可以在更多的地方捡拾到中国陶瓷片，其中之一就是特勒·卡特·马拉丘陵，这是一个位于开罗城东端的人工丘陵，距离有名的阿兹哈尔清真寺不远。据说，这是在马美尔克时代[19]以后，由建设现在的开罗市街所掘出的废土堆成的，特别是这个丘陵中的巴卜·达尔卜·马赫尔克丘陵附近，散布着大量中国陶瓷碎片，其中包括许多南宋、元、明时代的龙泉窑青瓷；南宋、元、明时代的景德镇青白瓷；元、明、清时代的青釉瓷器和明、清时代的赤绘等。人们几乎马上就会想到，这里是一个豪华住宅区被毁后的废土堆。假使这个丘陵的任何地方都有这样多的碎片，则中国陶瓷输入开罗的数量就将更为使人诧异。看来，好像家家户户，在当时都使用中国陶瓷器。

不过，在这个丘陵上，没有发现像福斯塔特遗迹那样的唐代越州窑瓷或北宋时代的中国陶瓷，这是因为这个地区使用中国陶瓷的年代比福

斯塔特遗迹要晚的缘故。

还有其他一些出土中国陶瓷的地方。在开罗市区东端，有一处坚固的法蒂玛时代的开罗城墙，其南部一角，有一座建造于十九世纪初期的、壮丽的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据住在开罗的一个美国人乔治·斯坎伦氏所说，在靠近阿里清真寺附近发掘中，出土了宋代的陶瓷碎片。不过因为东侧的城墙向北，它的尽头与上述特勒·卡尔·马拉丘陵相连接，所以斯坎伦氏所采集的中国陶瓷碎片，或许仍与这个丘陵的遗物有关。

在开罗，凡是足迹所至，都必然会接触到中国陶瓷，这就增加了我们访问这个古都的乐趣。

译 注

① 庞培（Pompeii），亦译庞贝，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古城，建于公元前七世纪。公元七十九年，因附近的维苏威火山爆发而全城湮没，十八世纪中叶起开始进行考古发掘，获得了研究古罗马社会生活和历史的大量原始资料。——译者

② 吉萨（Gizeh）位于开罗以西，这里的三座大金字塔指胡夫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和曼古拉金字塔，其中以第四朝法老胡夫金字塔为最大，每边长约二三二米，高约一四六米，共用巨石二百三十余万块，建于公元前二十七世纪。——译者

③ 拜占庭（Byzantium），即东罗马帝国。公元三三〇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改名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三九五年罗马帝国正式分为东、西二部分；一四五三年，东罗马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所灭亡。——译者

④ 哈里发（Calif,Caliph,Khalifah），是伊斯兰教国家政教合一的领袖的称号。——译者

⑤ 由神圣罗马皇帝康拉德三世和法王路易七世率领的一次东侵战争，一一四七年从欧洲出发，于一一四九年在小亚细亚惨败而告终。——译者

⑥ 伊万里，在日本九州岛西北部，以其南部有田町所产的陶土为原料烧制陶器，称为伊万里陶器，素负盛名。——译者

⑦ 金襕手，“金襕”，原是金线织花的锦缎，此处指用金色绘画的陶瓷器，“手”在日语中常用作陶瓷器的通名，如高丽手、祥祐手、七官手等等。——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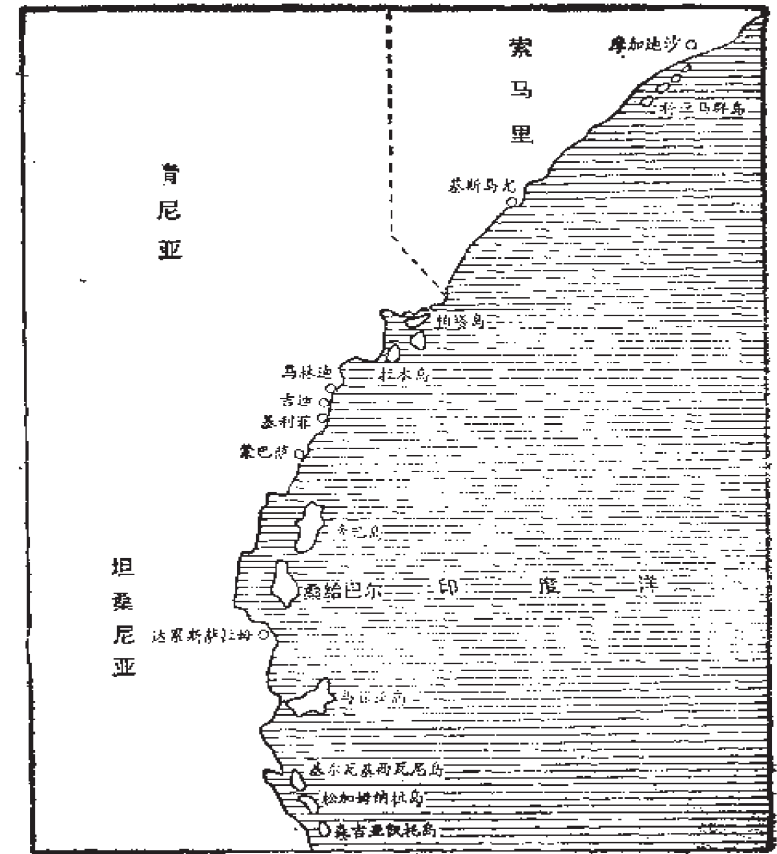
⑧ 博多港，在日本九州岛福冈市，滨临博多湾，历史上即为一贸易港。——译者

⑨ 《天方夜谭》，即《一千零一夜》（“The Arabian Nights”）的旧译，是一本阿拉伯民间故事集。故事均以本章论述的地区为背景，故作者以此书为喻。——译者

⑩ 伊本·朱巴伊尔（Ibn Jubayr,1145—1217），生于巴伦西亚的旅行家，曾任穆瓦希德王朝（1130—1269）的记录官，遍游埃及和中东一带，著有《旅行记》一书。——译者

⑪ 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h,1304—1377），阿拉伯旅行家，曾遍游伊斯兰世界，其行历在《薄寿庚考》（中华书局出版）一书中有较详记载。——译者

⑫ 马美尔克，一二五〇年建于埃及的王朝，于一五一七年为奥斯曼土耳其所灭亡。——译者



东非诸国

二　东非和东方陶瓷

——中国陶瓷研究的新领域

溯尼罗河而上

红海说来名实不符，它是一个碧波浩瀚的美丽的海洋。由于它的四周是沙粒粗糙的红褐色沙漠，所以海的颜色看上去就显得更为深沉。在它对岸的西奈半岛上，冷漠地横卧着淡茶色的石山。

沿着红海从苏伊士南下约五十公里，是库赛尔城。从法老时代开始，经过罗马时代，直到伊斯兰时代的今天为止，库赛尔一直是个生命悠久的港口城市，是埃及在红海沿岸唯一稍具规模的城市。城市中心，还留着一座奥斯曼土耳其统治时代建造的、坚固的方形城堡，现在就这样崩塌残破地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着冷冰冰的形骸。既像是夸耀着古老的历史，又像是无可奈何地缅怀着流逝的荣华。不知怎样，它总使人们感到无限凄凉。

这个城市也和其他许多中东城市的经历一

样，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其命运似曾多次遭遇过激烈的兴亡，又曾几度更换了统治者。现在的城市是在进入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以后兴建的；中世纪以前的城市，在今城以北七公里余的海岸上，已成了残破不堪的废墟。

在滨临着小小海湾的旧库赛尔城废墟上，留着几个被埋在沙漠里的大小山丘，在这些山丘上，混杂着玻璃及许多无釉陶制水壶的碴砾，散布着罗马时代的粗制埃及陶器和精制伊斯兰陶器碎片。从罗马时代开始，持续到伊斯兰时代的十四、五世纪，由于船舶的进出港口，这里显得十分繁荣。

去阿伊扎布遗迹调查的途中，我们徘徊在这个遗迹上缅怀往昔。从散扔的陶片中捡到了好几片中国陶瓷碎片，包括唐末、宋初越州窑系统的青瓷，宋代的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白瓷以及元末、清初的青釉瓷器碎片。其中特别是青白瓷的碎片，使人有一种恬静的淡青色感觉，洋溢着东方式的幽美。在埃及，这里是一个至今尚未报导过的中国陶瓷出土地，我们为此欣喜地欢呼。

由此可见，中国陶瓷在埃及卸货的，除了接着前去调查的阿伊扎布以外，还有其他各处港口。

这也说明了中国陶瓷在埃及的消费地很多。

实际上，在尼罗河流域，发现中国中世纪陶瓷的还不仅福斯塔特和开罗，其他地方也有所发现，这些将在下面探讨。

亚历山大港和阿布欣巴尔附近

位于尼罗河河口的亚历山大港，在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四世纪后半期所建立的许多城市中，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个大城市。这里有被誉为当时世界七奇①之一的灯塔，有大型的图书馆。所有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遗骸虽然尚未发现，但传说埋葬在这里。早在罗马时代，这里已很繁华，现在，这个在沙洲海岸上修建得非常美丽的城市，在中东也是屈指可数的。

为了探索这些罗马时代的中东文化遗迹，最近，波兰考察队在亚历山大港车站附近，选择了几个点，继续进行发掘，已经发掘出埋在四、五米深处的四世纪前后的罗马时代建筑物遗迹。一九六四年，在罗马时代层上面的伊斯兰时代层中，又发现了中国龙泉窑青瓷的碎片。年轻可爱的考察队员泰莱萨·博尔坎萨小姐说，这些似乎是十二到十四世纪，即南宋到元朝的瓷器。

假使如此，那末，亚历山大的居民，当时也如同开罗居民一样，渴望着中国陶瓷。亚历山大

港在当时是繁荣的海港，从儿童十字军② （一二一二年）的悲惨末日中，可以知道它还曾是个贩卖奴隶的中心。所以这里必然住着许多富商，而中国陶瓷器，正是这些富商邸宅中的装饰品。

在埃及首都开罗市，遗留着几处土耳其时代的豪富们建造的石砌住宅，它们已被规定为受到保护的文物。我们参观了这些住宅中的一个名叫塞赫努的家庭，它座落在阿兹哈尔清真寺附近。在满布土耳其图案的二楼主室中，壁橱里陈列着好几十只十七世纪前后的成套中国青釉陶瓷器皿。虽然稍嫌杂乱，但使人感到兴趣的是阿拉伯贵族的爱好于此可见一斑。他们与同时代的欧洲的贵族和富豪们，可说趣味相同。甚至直到十二、三世纪，在亚历山大港的富豪邸宅中，大概仍保持着这种风格，贮藏了许多中国的青瓷和白瓷之类的器皿。

亚历山大港和中世纪中国青瓷的关系，这是当然存在的，但这种关系之得到证实，毕竟也是一件快人心意的事。

溯尼罗河而上，经过了三角洲后就到达开罗。开罗与中国陶瓷之间的关系，前面已经作了种种叙述，所以这里从略。继续上溯，就到达尼罗河第一瀑布，这就是景色秀丽的阿斯旺。

现在的阿斯旺以高坝著名。在法老时代，这

里开始用石头建造方形尖塔。作为一个供建筑用的优质红色花冈岩采石场，因而是个重要的地方。在伊斯兰时代初期的法蒂玛王朝（九〇九—一一七一年），当突尼斯向埃及侵略的时候，这里曾是迁往开罗以前的首都所在地。因此，在阿斯旺山上，遗留着重重叠叠的法蒂玛王朝时代的圆屋顶型坟墓。前面的一章中已经提到，从阿伊扎布穿越沙漠的两条骆驼商队道路，其中偏南的一条，即是通往阿斯旺的。

假使阿斯旺也是骆驼商队必经之地，那末就可以肯定，在阿伊扎布港卸货的中国陶瓷，必然也运到这里。事实也确实如此，这里曾发现了南宋和元朝（十二—十四世纪前半期）的中国青瓷。

由此看来，中国陶瓷不仅是尼罗河下游地区贵族和豪富们的崇拜物，同时也为整个尼罗河流域的城市所普遍爱好。

原来，我们以为在发现中国陶瓷的城市中，阿斯旺已算相当深入内地了。到此才惊异地知道，更为上游的斯比亚地方，也发现了中国陶瓷。它位于阿布欣巴尔神殿以南约五公里的杰贝勒·阿达，这个神殿由于建造阿斯旺高坝要被淹没，因而花费了巨大的资金而迁移到山岗之上。

从事这个遗迹的调查工作的是一位年轻的英

国人马丁·明斯，据他的指导者斯坎伦博士和他本人所说，在这个伊斯兰时代的遗迹中，发现了十二—十四世纪的宋朝青瓷。

由此可见，中国中世纪陶瓷的足迹，曾溯尼罗河而上，逐渐深入，最后到达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高原

埃塞俄比亚是青尼罗河的发源地，是一个以历史古老而自豪的高原之国。

它并不是一个伊斯兰国家。而是信奉一种具有特色的古老的柯普特基督教。根据马修氏的报告*，在这个国家的东部，与面临亚丁湾的索马里港口吉布提之间的通道上，有一些城镇如阿马特、阿巴萨、戈吉萨和更内地的哈拉尔、达加布尔、埃伊克等地，都发现了中国宋、元、明各代的陶瓷碎片。

由此可以说明，在非洲发现中国陶瓷的，并不只是埃及。

古代的埃塞俄比亚与埃及的关系，正如被韦尔迪取材，作为他所编的壮丽歌剧《阿伊苔》③的主题所描述的那样，是有着深厚渊源的。埃及有权势的法老们，为了想获得这里的黄金、宝

* 杰维斯·马修：《东非与阿拉伯南部海岸的中国瓷器》，载《东方艺术新丛书》第二卷、第二册，1956年。

石、香料和象牙等等，经常向这里派遣远征军。

埃塞俄比亚与埃及的贸易关系，虽然直到中世纪的伊斯兰时代还没有中断，但与外国接触的通道，当时看来已经转移到面对亚丁湾的索马里的港口了。

下面还将述及，阿拉伯半岛南岸的亚丁及其东北的阿布扬港，曾是包括中国陶瓷在内的各种商品的大贸易市场，这些商品都在亚丁对岸的泽拉城（中世纪的泽拉城位于今泽拉城附近海中的萨丁岛上）卸货，然后从此由骆驼驮运到高达一千五百米的高原上的阿马特等中转贸易地。根据马修氏的研究，在十四、五世纪时，这里曾是阿德尔王国所管辖的城市。在这些高原遗迹中所发现的中国陶瓷，与阿拉伯半岛南岸的阿布扬城市遗迹所发现的十三—十五世纪的中国陶瓷，两者完全相同。据此，我们的眼前似乎浮现出为了获取利益而匆匆跋涉的古代阿拉伯商队行列，他们将珍贵的中国陶瓷等运往埃塞俄比亚，在那里交换宝石、香料和象牙等，从中牟取暴利。

在阿马特成交的中国陶瓷，再被运往更内地的哈拉尔和达加布尔等城市。在这些地方发现的宋末、元、明初的中国陶瓷，包含着多少当年的旅途辛劳。这种贸易情况，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

虽然，在更为内地的亚的斯亚贝巴还不曾发现中国陶瓷，但当年中国陶瓷也曾到达这些地方，却是可以肯定的。

东非沿岸的港口城市

如果中国陶瓷运往埃塞俄比亚方面去的卸货地是索马里港④和萨丁岛，那末，在东非沿岸，肯定还有其他的卸货地或卸货用的城市。

从亚丁湾的索马里出发，绕过称为非洲之角的加尔达菲角，沿着面向印度洋的海岸南下，到达索马里、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地。则就会发现，在这一带的海岸和岛屿上，星罗棋布地存在着多得惊人的中国陶瓷遗迹。此外，在坦桑尼亚洋面上的桑给巴尔岛和巨大的马达加斯加岛上，也有所存在。

英国的弗里曼·格伦维尔氏曾经报告说*，五十年代中期的三年时间里，仅在坦桑尼亚海岸，就发现了四十六个出土中国陶瓷的遗迹。则遗迹数量之多，由此可以想见。

对于那些很小的遗迹，这里暂且不提，而值得查究的遗迹，就有下列各处：属于索马里的，有前已提及的亚丁湾附近的萨丁岛和柏培拉，以

* 据杰维斯·马修的同书第53页。

及滨临印度洋的摩加迪沙、基斯马尤和科亚马群岛；属于肯尼亚的有邓福特港、帕塔岛、曼达岛、拉木岛、曼布鲁伊、吉迪、马林迪、基利菲、姆纳拉尼和蒙巴萨等；属于坦桑尼亚的有奔巴岛、马菲亚岛、基尔瓦基西瓦尼岛、松加姆纳拉岛、森吉亚凯托岛和基尔瓦岛等。此外，桑给巴尔的各个遗迹也很重要。

在这些遗迹中的若干处，不仅发现中国陶瓷，而且发现了中国钱币。例如，一个德国人于一八九八年在摩加迪沙发现了宋朝钱币，一八八八年，英国人在桑给巴尔捡到了宋朝钱币。*看来，东非与中国的往来，似乎是相当密切的。

在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岛和肯尼亚的吉迪和基利菲等地，最近正在对那里的阿拉伯人废墟和清真寺等进行调查，我们且把这些地方的调查情况讨论一下。

基尔瓦岛位于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以南二百四十公里左右，这个海岛浮沉于离海岸并不很远的地方。岛的西北角残留着中世纪都市的废墟，这就证明，在中世纪时代，这里曾是一个贸易中心。

这一带，近海岛屿作为通商活动中心的，并

* F·赫斯：《东非地区的早期中国记录》，J.A.O.S.，第55—57页。

非仅此一处。前面所举的各个遗迹，有许多都是岛屿，它们都位于和大陆一衣带水的地方。波斯湾沿岸的著名中世纪海港霍尔木兹也是一样，此外还有在十九世纪以后在东亚兴起的新加坡和香港，它们不仅是良港，而且当大陆形势动荡之际，借此可避免扰攘，进行安全的通商活动。

基尔瓦岛的城市遗迹，是英国东非考古学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内维尔·奇蒂克氏所发现的。随着发掘和调查的深入，混杂在伊斯兰陶器中的中国陶瓷就越来越多地被发现了。

美国菲利亚美术馆的亚历山大·约翰·波普氏，曾经访问过东非，并且看到了那里的情况。在他看来，其中既有十世纪唐末到宋初的越州窑瓷和白瓷碗，也有为数众多的、十四——十五世纪初的青瓷，包括十四世纪前期和中期（元朝）绘有凤凰和蔓草花纹的瓷器。其中还有元代的素底雕花白瓷，即所谓枢府窑的制品，种类繁多。

波普并且说*，岛上还混杂着少量十四——十五世纪安南的黑褐釉陶器和同时代的泰国宋家洛府窑的青瓷。令人更为惊奇的是，竟混杂着一片日本伊万里青釉瓷器的碎片。

总之，从十世纪后半期以后直到十五、六世

* 亚·约·波普：《非洲区域报导》，马尼拉陶器贸易讨论会，1968年。

纪，各种中国陶瓷都曾历代不绝地运到该岛贮藏，然后从此推销到它的腹地即非洲大陆东岸各地。至于这些珍贵而精致的中国陶瓷，是怎样被运到东非这个偏僻地区的，下面将继续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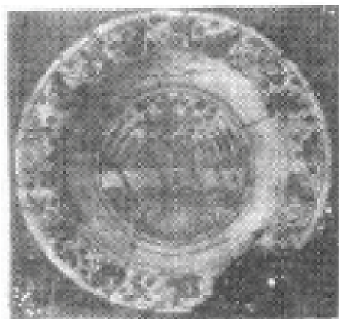
通过对吉迪的阿拉伯人旧市区的调查，可以明白，中国陶瓷在东非内陆，是多么受人喜爱。

吉迪位于肯尼亚的蒙巴萨以北一百十三公里，城内的中世纪建筑物已成废墟，对这个废墟进行发掘调查的，是一位早就熟悉该地而现在担任蒙巴萨福德耶苏国家公园园长的詹姆斯·柯克曼，他在报告上说*，吉迪城建于十二世纪，到十八世纪初期，从南面的基尔瓦岛来此的移民，又建筑了新城墙，而由于葡萄牙人的贸易等原因而兴旺起来，但到了十六世纪末期，因为遭到邻城和加拉族的袭击而消亡。这一带的城市，遭受着命运的残酷摆布，其兴亡变化的剧烈，是出乎人们想像的。

大量的青瓷类，包括越州余姚窑瓷、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和广东石湾窑青瓷，十四——十六世纪的青釉瓷器和仅存一片的釉里红等，据说这些都是从这里的大清真寺和其他遗迹中获得的，它们是与南宋宁宗（一一九五——二二五

* 詹姆斯·柯克曼：《阿拉伯城市吉迪》，牛津，1954年。







镶嵌在基利菲庙内的中国陶瓷
（采自柯克曼氏的论文）

年）年代的庆元通宝和理宗（一二二五——二六五年）年代的绍定通宝等钱币一起出土的。这些碎片与相距数百公里的上述基尔瓦岛都市遗迹中的碎片属于同一类型。

根据在现场看到这些情况的波普说，其中的精品是釉里红上绘有花卉图案的瓶和绘着龙的青釉瓷（当是十四世纪的瓷器），以及在青釉上施彩色的磁州窑壶等。意想不到的是，还有在釉下施加黑绘的泰国宋加洛府窑的碎片。

东非的中世纪社会与中国陶瓷

柯克曼还有另一个关于出土中国陶瓷的其他遗迹的调查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位于蒙巴萨以北五十六公里的基利菲的姆那拉尼清真寺和墓地里，也发现了明代的青釉器。

令人感兴趣的是中国陶瓷在这里的使用方法。在这里的阿拉伯人社会中，把珍奇而又昂贵的中国陶瓷作为室内的摆饰，用以夸耀兴趣高雅或财产富裕。此外，在宴会中使用中国陶瓷的餐具和酒壶，其情况也与当时的其他城市相同。但是在这里，中国陶瓷还发现了另外一种用法，那就是用来装饰清真寺的内部或柱墓。

＊ 詹姆斯·柯克曼：《基利菲的姆那拉尼清真寺和墓葬》，载《东方杂志》第三卷，第95—111页。

参观了遗留在吉迪和基利菲的十五—十六世纪的清真寺废墟，在那里，把输入的中国陶瓷碗或盘，以一定间隔嵌在壁上，用以装饰壁面。

这种一见就使人感觉新奇的壁面装饰，在这一带的中世纪大建筑中，似乎极其普遍。例如，在坦桑尼亚的松加姆纳拉岛上，宫殿遗址的壁上和顶棚上，次序井然地镶嵌着内侧朝外的青瓷碗，看去颇像四方形的花纹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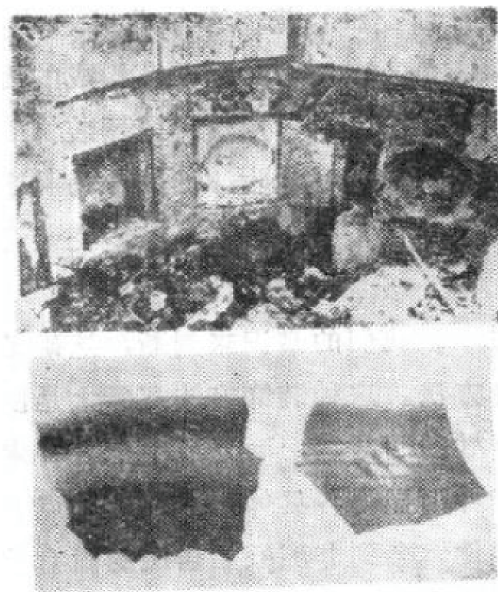
在朱阿尼岛的卡阿中世纪清真寺里，米希拉布（礼拜用的神龛）的壁上，也整齐地镶嵌着中国陶瓷，作为一种装饰*。

以镶嵌中国陶瓷作装饰的，并不限于宫殿和清真寺等大型建筑。

从索马里穿越肯尼亚到坦桑尼亚的沿海地带，在那里的伊斯兰时代遗迹中，有许多竖着巨大柱子的墓标，这就是所谓柱墓。柱子的高度，低的三米左右，高的则有八、九米，威风凛凛地耸立着。柱子的形状是形形色色的，有圆形、六角形、四角形，还有一种有槽的（与希腊的柱子相似）。顶棚的形式也有圆形和尖细形等等。由于最近新建了许多清真寺，有时竟会把这种柱墓误认为清真寺的尖塔而引人喜爱。真是百里不同

* 杰维斯·马修：《东非与阿拉伯南部海岸的中国瓷器》第52页。

风，而这种柱墓恰恰就是这个地区的特征所在。它们的年代并不十分古老，早则十五世纪，而一般多为十六—十七世纪的遗迹。



松加马纳拉岛的遗迹和陶片
（采自马修氏的论文）

柯克曼氏曾经调查了二十多处残存的柱墓*，其中有一座马林帝柱墓，它曾为十五世纪初期的中国海军所访问，建得极为壮观，柱子高达九米，是柱墓中的翘楚。

对于为什么要建造这种柱形陵墓的问题，这

* 詹姆斯·柯克曼：《壮丽的马林帝和曼布鲁伊柱墓》，载《东方艺术新丛书》，第四卷，第二册，1958年。

里且不赘述，但这种柱墓的建造，却仍然借助于中国陶瓷碗盘的装饰，而且所用的多是十五世纪以后的中国陶瓷。除了青瓷和青白瓷以外，还装饰着在白底上绘着天蓝色花纹的大量青釉瓷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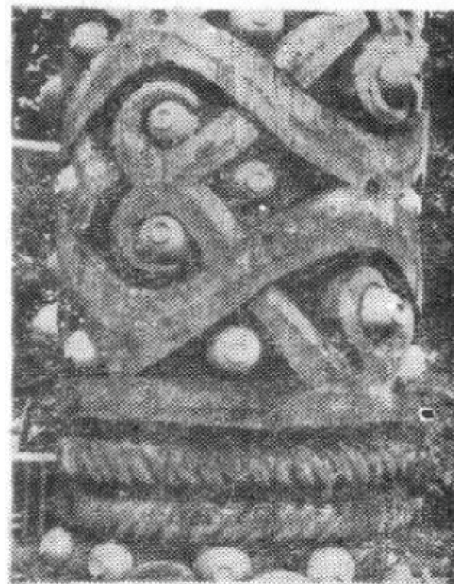
这种青釉瓷器的花纹约有花木、水果、鸟类、麒麟、鱼，以及由蔓藤花草构成的万宝图，显得丰富多采。所以，用这种瓷器装饰的柱子，确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而其中马林帝柱墓以北约十公里的曼布鲁伊柱墓，其陶瓷装饰更为精美。

总之，以我们的常识来判断，这确是一种特殊的装饰方法。这种装饰方法实际上是使壁面形成一种奇妙的凹凸感，而且还由于各种陶瓷在品质上的差异而显得各具体态。在这一点上，不禁令人奇妙地体会到非洲原始居民的固有艺术感，同时也因为在形式上的并不千篇一律而体会到他们的现实感。

中国陶瓷原来是恬静而朴素的。却被用于这种新奇而有强烈感觉的壁面装饰，对于陶瓷本身，也许是啼笑皆非的吧。

《古兰经》的条律禁止用人像装饰建筑物，在这样的伊斯兰社会里，人们就放弃人像，而是随心所欲地用各种颜色漂亮的瓷砖搭配起来，作为他们补壁的装饰。中世纪以后，无论是伊朗、

美索不达米亚或叙利亚，他们的花色瓷砖，其艳丽程度，使人叹为观止。而且成为促进伊朗陶瓷业发达的一个间接因素。



镶嵌中国陶瓷的柱墓
（沙捞越古晋博物馆）

这种装饰壁面的风气，也传到了非洲东部的伊斯兰社会。但是，由于那里的窑业很落后，烧制不出装饰用的精致瓷砖。因为这种原因，加上原在东非的土著人民，在他们自己当地的生活优美感影响之下，因而就采用了中国陶瓷来装饰他们的壁面。

其实，用中国的陶瓷碗或钵作为镶嵌装饰的，并不限于东非。根据泰国希尔巴空大学的迪斯克尔教授所说，在泰国的最偏东地区，当十五世纪的阿育迪亚时代⑤，城门上也有用陶瓷镶嵌作为装饰的。据说，这是伊斯兰文化对泰国的影响（第五次伊朗美术、考古学国际会议）。使人奇怪的是，在更为东方的婆罗洲沙捞越的帝雅克

人之间，也存在这种习惯。

沙捞越的古晋，是一个特别清洁和安静的城市，在这个国家的国立博物馆前庭，竖着高达十米左右的巨大柱子，据说，这原是帝雅克部落百年前后的墓标，后来被迁移到了这里。柱子的外侧表面，像疙瘩似的凹凸不平。由于好奇而走到近处观看，原来这个作为墓标的装饰物，是在木头中成排地镶嵌着底面朝外、直径达十厘米左右的中国瓷碗。因为沙捞越也有不少伊斯兰教徒，所以，这种装饰方法，也许是伊斯兰教徒的装饰技术与当地原始社会的土著意识的混合物。

面向东非的中国陶瓷

暂且离开正题，再回头叙述一下。

在东非沿海地方发现中国陶瓷的中世纪城市，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很多。在它们中间，中国陶瓷的数量决不会少，而种类也很繁多。把时代和种类综合起来，计有九—十世纪（唐末、五代、宋初）的浙江越州窑瓷；十一—十五、六世纪（宋、元、明代前半期）的浙江龙泉青瓷和其他福建、广东方面的青瓷；十二—十五、六世纪的江西景德镇青白瓷和以福建德化窑为代表的福建、广东两省地方的白瓷；十四—十五世纪（元、明初）的釉里红和十四—十六、七世纪华南诸窑

的白瓷青花（青釉瓷器）以及五彩等等，真是多种多样，不胜枚举。

有趣的是，这些青釉瓷器的盘碟碗壶等，上面画着独特的花纹，具有这种花纹的陶瓷器，其中有不少就连在中国、日本和欧洲等收藏地也从未见过。但它们与波斯一带的中东地区遗迹出土的中国陶瓷，却有相同之处。由此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即画着这种别致花纹的青釉瓷器，是专为中东地区的需要而烧制的。

关于这方面，以后还要讨论。总之，这些画着过去从未知晓的花纹的青釉瓷器在东非废墟中的发现，这件事的本身，就证明了中国陶瓷生产基础的雄厚和行销范围的广阔，从而更使人增添了无限兴趣。

因此，散扔在埃及和东非沿岸遗迹中的大量中国陶瓷，又以其新的面貌引人入胜，被人们作为研究的新宝库而去寻根究底。

从东非各遗迹中所发现的大量中国陶瓷，假使按其年代进行分析，其情况又将如何呢？关于这个问题，马修氏曾有如下的论述：

从东非沿岸诸遗迹中所发现的陶瓷，有从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各种产品，但从十五世纪后期起，中国陶瓷器的输出情况似乎有所改变。在十五世纪后半期前，即整个时期的前半期，主要

是青瓷，而青釉瓷器却很少。但在此以后（后半期），这种情况适得其反，是以青釉瓷器为主，而青瓷居次。而且前半期输出的多为优质品，粗瓷很少；但到了后半期，就以输出廉价货为主。另外，前半期的优质品主要发现在索马里北部，到了粗制品较多的后半期，中国陶瓷一般发现在索马里南部，即基斯马尤遗迹以南的地方。

以上就是马修氏的看法，* 这种看法颇为新颖。因为如上所述各个时代和地区输入的中国陶瓷具有种类和质量的差异，而通过对这种差异的研究，可以让我们作出种种有趣的历史性推测。

对于马修氏的看法可以作出如下的推测，为什么十五世纪以前在北面的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地方发现很多优质品？从东非方面来看，因为当时那里比较发达，拥有比较富有的买主；另外，从输出方面的中国来看，在当时，非常粗糙的产品是不投放市场的，所以其输出商品的质量，估计都是较好的。

从十五世纪后期开始，在肯尼亚以南的城市中，发现了特别大量青釉瓷器的一般制品和粗制品。对于这件事，似乎可以说明，那里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它并不特别奢望优质品，但求

* 杰维斯·马修：《东非与阿拉伯南部海岸的中国瓷器》第53—54页。

能获得大量的一般制品。

再从中国方面的情况来看，十五世纪以后，浙江、福建和广东三省，陆续兴办了地方窑，烧制普通的青釉瓷器。这些地方窑的产品，可以说都是为了大量输出。也许是当时的贸易商低价收购并垄断了这些粗制品，然后把它们运到遥远的非洲而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

所以，这种现象，可能是非洲方面和中国方面相互制约的结果，而贸易商掌握了这种相互关系并适当地加以调节。因此，通过这种时代和地区变化的分析，对于当时的贸易状况、贸易商的性格和变化等问题，也就不难加以探索了。

所以，若能继续不断地去探索中国陶瓷在各个地区的上述这些情况，那末，依靠文献所无法知道的当时的经济和社会，贸易商和生产者的意图以及消费者的爱好等等问题，也都能逐个地迎刃而解，这样的研究，真是趣味无穷。

航海去非洲

那末，这么多的中国陶瓷，是如何运到非洲去的呢？现在必须转入这个问题的讨论了。

东非的沿海地带，究竟是否如阿非利加这一词汇所虚构的，全是些非洲的土著人呢？事实完全不是如此。因为这一带盛产大量的黄金、宝

石、象牙、香料等等古代人们所珍奇的东西，所以希望经营这些东西以获得巨利的波斯人和犹太人，早就移居到这里沿海的要地和良港从事商业活动了。

尤其是到了伊斯兰时代，萨拉逊商人的贸易活动一旦开始，东非沿岸的港口就落入了他们的势力范围，船舶出入也就逐渐增加了。

蒙古人在十三世纪的西亚之征，使阿拉伯人进出这一地区更为频繁。因为在这次西征中被驱逐的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市的伊斯兰人，为了寻求新天地，转而出入于东非沿岸。从此，阿拉伯商人就在这里搜集黄金、铜、奴隶、象牙、毛皮、海龟、犀角等，然后运往国外，牟取暴利。只要看看残存于摩加迪沙的、建造于一二三八年的宏伟的清真寺的细长尖塔，就不难了解，十三世纪前半期的伊斯兰教徒，已在这里积聚了多么强大的势力。

从十一世纪到十三、四世纪，运抵这个地区的中国陶瓷，即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经过居间人的多次经手，而最后被运到这遥远的东非来的。

郑和远征

在十五世纪初期，由于发生了一次重大的

事，使得中国陶瓷与东非发生了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以“郑和远征”著称的中国大海军来到印度洋的活动。

最早出入印度洋的中国海军是在明朝的第三代，即明成祖永乐三年（一四〇五年）。在此后的二十八年中，曾前后出海七次（也有些学者，如苏宗仁氏，认为有八次）。司令官是云南出生的郑和。这位能干的将军，究其生平却是太监（宦官）出身，也有人以为他是伊斯兰教徒。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往麦加巡礼，被授予“麦加朝圣”的称号。按此推理，则郑和之行，是否也有因受到召唤而前往这个伊斯兰教中心地的可能呢。

中国的偌大海军在印度洋上的大规模活动，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因此，这件事引起了国际上东方学者们的兴趣，从十九世纪末期起，G·菲利普斯、W·W·罗克希尔、P·佩尔奥特、J·J·L·杜易凡达克和向达、山本达郎等人，进行了种种调查，并发表了经过情况。由于一般人对此了解很少，所以在此借用一九三一年福建省长乐县天妃宫中所发现的《天妃之神灵应记》这一碑文⑥，对此事经过，作大致的介绍，因为这与下面将要论述的有关中国商品流通的情况，将有很大关系。

郑和的第一次出海，是永乐三年秋季到永乐五年九月（一四〇五——一四〇七年）之间的两年。他率领以大舰六十二艘为主力的许多大小船舰，经过爪哇、苏门答腊、锡兰以及印度西海岸的柯钦，到达当时对中东贸易的大中心地加尔各答。作为他的初次航行，这个半径，已经很大了。

第二次从永乐五年十一月开始，到永乐七年七月结束（一四〇七——一四〇九年），采取与第一次相同的路线，向加尔各答航行。这就说明，这条航线，确实是连接东亚和南亚的重要海路。

第三次是在永乐七年九月起到永乐九年六月（一四〇九——一四一一年）的两年之间，这一次以东印度洋为中心，从爪哇、苏门答腊往锡兰航行。到锡兰后，与锡兰军队交战，俘虏了阿拉加克·科内拉王。由此北上印度的东海岸，到达孟加拉湾。以后他们折往马六甲海峡，在马六甲修筑了城塞根据地后返国。

这样连续三次出海，中间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但在第三次航海以后，稍稍间隔了一段时间。第四次是在相隔两年以后，即从永乐十一年十月至永乐十三年七月（一四一三——一四一五年）之间。这一次又航行在印度洋上，从印度东海岸折往波斯湾，到达霍尔木兹。这是由大舰队

所进行的一次航海活动。也有人认为，这次远征曾到达东非沿岸的海港，但情况不甚清楚。

第五次航海又过了两年（永乐十五年秋到永乐十七年七月，一四一七——一四一九年）。舰队的路线与上次相同，从东南亚经印度诸港，然后进入波斯湾。而另一支分队则通过阿拉伯南岸到达东非海岸，再从摩加迪沙、布腊瓦绕到马林迪。这真是一次值得纪念的大航海。虽然葡萄牙人达·伽马⑦由伊斯兰教徒的领航员导航，也曾横渡阿拉伯海到达加尔各答，但为时已在一四九八年，而郑和的第五次航海比他还早八十年。

这样，中国和东非就首次得到了直接的接触。

两年以后，郑和的第六次出海于永乐十九年春解缆起航，翌年即永乐二十年八月回国（一四二一——一四二二年）。这次航行中，船舰的本队也驶入波斯湾，而另一支分队则绕非洲东海岸诸港口航行，中国和东非的距离，从此似乎显得缩短了。

如此伟大的航海事业，随着永乐二十三年（一四二五年）永乐帝的逝世而接近尾声。

以后，从宣宗宣德六年正月至宣宗宣德八年七月（一四三一——一四三三年），又进行了第七次往印度洋及波斯湾的巡航。这是最后的一次，

同时也是总结性的一次航行。在这一次航行中，郑和让他的部下去到阿拉伯，到麦加参加巡礼。这件事反映了郑和的内心以及与这次远征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必须加以注意的。

郑和的第二次远征，由二百四十九艘大舰队组成，而第一次远征时的舰队，其中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大舰，竟达六十四艘之多。郑和统率的海军，其规模之大，由此可以想见。至于人员，据统计有二万七千余人（第一次、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七次），所以这真是一支骇人听闻的海军。* 这样巨大的海军停泊在洋面上，无论到那里，人们都将会吓得心惊胆战的吧。

对于明朝第三代的永乐帝为什么要在十五世纪初期计划进行一次如此空前的壮举，其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查核被他所驱逐的第二代皇帝明惠帝是否逃入缅甸，因为南海方面有这样的传说，却不知真伪，所以要调查他的去向。但实际上的目的，似乎是为了向南方诸国显耀中国的国威。

当时，在西亚还有号称成吉思汗子孙的帖木儿[8]所建的大帝国，帖木儿并且还梦想重建大蒙古帝国，企图攻打中国的明朝。所以郑和最初的

* 包遵彭：《郑和下西洋之宝船考》，台北，1961年。

远征计划，可能也包含着要想从背后牵制元人的打算。

与此同时，其另一主要目的显然是为了扩大中国和各国的通商以获得珍贵物资，从而掌握印度洋的贸易。这支舰队的停泊地和目的地，都是当时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从这一点看，就可明白此中道理。另外，郑和的舰队携带着大量黄金和钱币，也是有关这方面的一种证据。

如果这样，那末，反过来看，也就可以推测东非的摩加迪沙和马林迪，都是当时贸易的要冲，则这些地方发现从十四世纪后半期到十五世纪的著名中国陶瓷，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有幸跟随郑和远征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一书，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的见闻录，还有费信[9]，著有《星槎胜览》的旅行记。在《星槎胜览》上，记载着有关摩加迪沙（木骨都束）和布腊瓦（卜剌哇）的情况，其中指出在这些地方是使用瓷器的[10]。瓷器在当时已经是重要的商品，远征军本身当然是知道的。总之，由于郑和的海军远航东非，使中国陶瓷在那里得到普及，这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人开拓的贸易航线就这样地远及东非。但是以后由于明朝国内情况的变化，中国人与这个地区之间，以政府力量为后盾的来往突然减少

了。不过，向东南亚移居的中国人，此后却逐年增加（华侨），而且通过他们自己的力量和印度、阿拉伯商人的努力，使中国商品的输出日益增长。

十五世纪以后，中国陶瓷在东非的数量之所以愈益增加,可以认为是上述原因所造成的结果。

在东非沿岸，沿坦桑尼亚领土以南，至今虽然还没有发现中世纪的中国陶瓷，但是若在沿海地带进行调查，则这一带甚至更多的地方，都有可能发现中世纪的中国陶瓷，马达加斯加岛的情况也是如此。

此外还有使人感到兴趣的地方，那就是位于非洲东端，索马里的加尔达菲角洋面上的索科特拉岛，这个现在好像已经被人们遗忘了的岛屿，古代称为迪斯科里拉岛。这里，罗马时代以后，曾是印度商人、希腊商人和阿拉伯商人等之间，经营大规模贸易的中转地。根据桑田六郎氏的说法，当时，很多商人聚集在这里，带来了地中海地区、非洲和印度的物资进行交易*。中国陶瓷在中世纪作为重要商品在此登场，这当然是不在话下的。如果能到那里进行访问，我想，必然会有宝山等待着我们去发掘的。

---

* 桑田六郎：《上代东西海上交通史话》，载《怀德》第二十三期，1952年。

译　注

① 世界七奇，指①埃及的金字塔，②以弗所的阿苔密斯神殿，③巴比伦的空中花园，④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⑤小亚细亚哈利卡纳苏的加里亚国王摩索拉斯陵墓，⑥地中海罗得岛的太阳神巨像，⑦法罗斯岛上亚历山大城的灯塔。 ——译者

② 儿童十字军发生于一二一二年，当时，由于几次十字军东侵的失败，欧洲流行一种荒谬的说法，认为成人有罪，只有儿童才能夺回圣地。于是有三万名儿童从法国北部到马赛集中，另有二万名儿童从德国出发到意大利。船主佯言把他们送到巴勒斯坦，结果却被送到埃及，卖作奴隶，并有大量死于途中。

③ 《阿伊苔》（Aida），意大利作曲家韦尔迪（Giuseppe Verdi）所作歌剧，描写埃塞俄比亚公主阿伊苔为埃及军队所掳，与其将军拉塔梅斯相恋，结果同死于狱中。 ——译者

④ 索马里港，指吉布提(Jibuti)。 ——译者

⑤ 阿育迪亚（Ayuthaya），泰国旧都，在今首都曼谷以北七十公里的湄南河沿岸。系一三五〇年阿育迪亚王朝所建立，至一七六七年灭亡，为入侵的缅甸军队所毁。 ——译者

⑥ 此碑在长乐县南山寺，原碑篆额作《天妃灵应之记》，碑文较长，不在此抄录，可参阅明巩珍《西洋番国志》向达校注本附录二。碑尾有立碑年月和主碑人：“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冬吉日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李兴、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张达、吴忠。都指挥朱真、王衡等立。正一住持杨一初稽首请立石。”必须指出，作者在本书中叙述的郑和历次航行的经过，并非完全根据此碑，而是增加了另外一些资料。例如，郑和的历次航行，此碑只记年代，不记月份；郑和的第五、六、七三次航行，此碑只记出航年代，不记归航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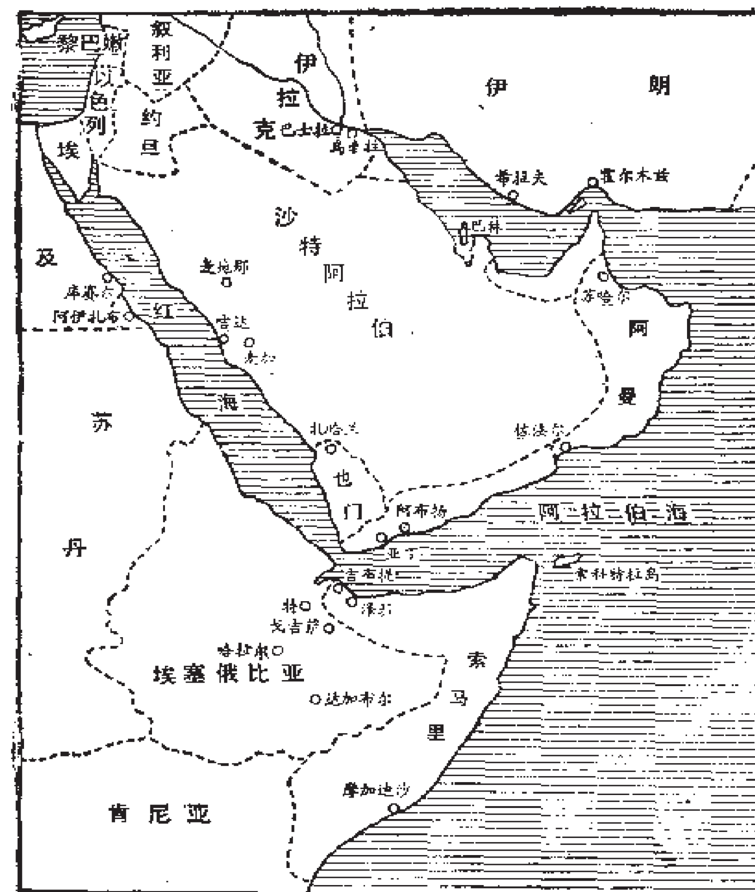
代；此碑所记地名，均是明代称谓，而本书已作现代地名等等。 ——译者

⑦ 达·伽马(Vasco de Gama，约1460—1524)，葡萄牙航海家，一四九七年奉葡王命率船队自里斯本出发，绕好望角，于一四九八年到达印度。 ——译者

⑧ 帖木儿（Timur-i-lang，1336—1405），帖木儿帝国的创立者，自称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一四〇五年（明成祖永乐三年）率兵二十万，拟东侵中国，因途中病死而罢兵。 ——译者

⑨ 马欢，字宗道，浙江会稽人，伊斯兰教徒，通阿拉伯语，任通事（即翻译）之职；巩珍，号养素生，南京人，约系郑和军中幕僚；费信，字公晓，江苏太仓人，原是太仓卫戍军出身，从郑和军。 ——译者

⑩ 《星槎胜览》（冯承钧校注本）后集，木骨都束国："货用金银、色段、檀香、米谷、瓷器、色绢之属。"又后集，卜剌哇国："货用金银、段绢、米豆、瓷器之属"。 ——译者



原著绘制此图时，这个地区尚无南也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

三　运往阿拉伯半岛的东方商品

——中国陶瓷去到非洲和欧洲的桥头堡

发现中国陶瓷

最接近东非的是阿拉伯半岛，如果东非有中国陶瓷的出土，那末，阿拉伯也就不会没有。实际上，阿拉伯南岸与东非诸港，近得几乎可以互相握手，西岸隔着狭长（虽然说它狭，但其实宽阔，绝不能望见彼岸）的红海，与埃及、苏丹和厄立特里亚遥遥对峙，东岸靠近印度，北岸与波斯湾彼岸的波斯地方，互为东西贸易上的要地。

这里也存在中国陶瓷，在其南岸、东岸和北岸都有所发现。因为尚未进行周密的调查，所以还不能说，在阿拉伯半岛上有很多出土处。但根据马修氏的报告，在南岸，从亚丁及其附近的库特阿姆赛拉、阿勒哈比勒以及离亚丁东北五十六公里的海港阿布扬等废墟中，都发现了中国陶瓷。美国米特罗波里坦博物馆① 的一些人，从亚丁往北进入也门领土，在接近也门和沙特阿拉伯国境的扎哈兰，也发现了龙泉窑青瓷和元代青

釉瓷器的碎片（笔者亲见）。在阿拉伯东南角的阿曼的苏哈尔和东北岸石油之岛的巴林也有发现，后者是根据铃木八司的报告。对于苏哈尔的情况，则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上，也已经提到了瓷器交易的事[②]。

现在先从南岸说起。

首先是亚丁市，在过去，通往欧洲航道的船舶，在进入苏伊士以前，在此稍事休息，这个港口以此知名。可是谁也不知道，亚丁市附近还有一个称为阿布扬的地方。这个城市虽然现在已成废墟，但却发现残留着一个三平方公里的城市遗迹，已经查明，它在当年曾是一个很繁荣的城市。从十二世纪到十五世纪，这个城市由于骆驼商队而繁荣起来。在此积聚的商品，通过亚丁湾而运往索马里的萨丁岛（中世纪的泽拉城），再从此推销到埃塞俄比亚的高原城市去。但是，到了十五世纪末叶，它就趋于衰落而随即为它的商敌亚丁所灭亡。所以，留在这个遗迹里的中国陶瓷，大体上是十二世纪到十五世纪的东西，这正是我们所设想的。

虽然我们还不十分清楚，中世纪的阿拉伯城市之间，时常因政治或经济而发生战争，影响城市的命运，出现城市的兴亡，阿布扬大概就是如此。

阿布扬以外，在南部其他阿拉伯遗迹中发现的中国陶瓷，有很多是十三世纪到十五世纪的青瓷和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的青釉瓷器。

这些都是各城市所使用的，或作为商品买卖的中国陶瓷器。其中在亚丁卸货的，数量似乎特别多。十四世纪的著名旅行家伊本·巴图塔（一三〇四——一三七七年）在其旅行记中提到中国的陶瓷说："在亚丁，由于价格统制两限制输入"。由此可以窥及，作为中世纪的贸易港口，亚丁是很重要的。同时也可以推测，在十四世纪，这个港口的中国陶瓷输入量很大。另外，十五世纪初期随郑和远征的费信，也在其著作《星槎胜览》上说，在这里的贸易商品中，还有青白花瓷器，並杂有金、银、色缎、檀香和胡椒等商品[③]。

阿拉伯半岛的地理条件

一提到阿拉伯半岛，思想上首先就浮现出一片连续不断的、荒凉而灼热的沙漠地区，宛如瀚海茫茫。事实上，半岛的大部分确实如此，从天空鸟瞰，土地看不到一丝绿色，全是红色的沙漠和连绵起伏的石山。这种景象，倒使人忘却了荒凉或空旷，却令人有壮严之感。

生活在沙漠上的是剽悍的阿拉伯人，或称贝

都印人，他们是漂泊的闪族游牧民。所以，在世界文明史上，阿拉伯半岛的居民给人以落后的印象。只有伊斯兰教的发祥地，似乎使这个半岛放出一片光芒。但随着伊斯兰教国家的发展，其中心随即又转移到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埃及等地方去了。在人们的心目中，阿拉伯不过如此而已。

不过，从历史上的事实来看，人们对阿拉伯半岛的这种看法，虽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也有其片面之处。因为，粗略地看来，这个地区界于印度次大陆和非洲、地中海之间，既是一个大半岛，又是一片小大陆。而仔细地看来，这个地区具有介于地中海沿岸的叙利亚、埃及与波斯湾两侧的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之间的地理位置。

因此，从印度往红海方面航行的船只，自古以来都必然要经阿拉伯半岛的东南角航行，到达东南角以后，就一直沿半岛南岸到达亚丁，再由亚丁进入红海。或掌舵朝南绕过称为“非洲之角”的加尔达菲角，向东非诸港航行。另外一个方向，罗马时代从红海沿岸的库赛尔、米乌斯霍尔木兹或贝雷尼克等港口启航的船只，也是在亚丁港停泊一下，然后从亚丁去往东方的印度，这种情况，在罗马时代著名的《埃留乌德拉海航行记》④和普利尼乌斯⑤的《自然史》上，都有清楚

的记载。

另外，根据家岛彦一氏的看法，即使在伊斯兰时代，在开往波斯湾的船只中，有许多也是先在阿拉伯半岛南岸的亚丁或佐法尔停泊，由此折向东北，绕阿拉伯海东岸，经马斯喀特、阿曼一带，然后顺潮流进入波斯湾。*

陆上交通中心地表加

如上所述，可知阿拉伯半岛南岸诸港口，实在是贸易商品的堆栈，是重要的中转贸易地。在像现在这样有发达的航空交通以前，阿拉伯半岛西南岸酷热难耐的亚丁港，作为前往欧洲航路上的停泊地，受到许多人的重视，这是由来已久的。

如此，在阿拉伯半岛南岸，就有了亚丁这一个连接东西方两个世界的重要贸易基地，并且形成了通过亚丁连接中东文化中心地的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埃及的陆上交通道路。其中主要的交通路线，是沿半岛西侧红海岸的一条，许多装载着贵重商品的商队，从一个绿洲到一个绿洲地辗转通行于这条道路上。以叙利亚为目的地的商队，就由此北上，去到地中海沿岸的巴勒斯坦；

* 家岛彦一：《论南阿拉伯的东方贸易港》载《东方学会报》，第三十一辑，1965年。

贩运商品到埃及去的商人，则在中途的西奈半岛西折，径去尼罗河。

往美索不达米亚去的商队，也要先在这条路上跋涉一段，然后在麦加折向东北，横越半岛的大沙漠，到达波斯湾沿岸。因为波斯湾沿岸的巴士拉是个重要的地方，所以当公元六三五年阿拉伯军队进军时，这里就马上建起了城市。

这条道路不仅用于连接阿拉伯半岛南岸和地中海及波斯湾海岸，而且，每当从东地中海海岸到幼发拉底河上游以至美索不达米亚的北路由于某种政治上的原因而堵塞时，则经过麦加的南路就繁荣起来，队商们可以通过巴士拉前往巴格达。

四周为岩山所包围的麦加绿洲，是具有上述重要意义的交通枢纽，这是麦加之所以能繁荣的经济基础。加上它又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加瓦神殿的所在地，因而更增添了它的繁华。

聚集在麦加的商品，再运到麦加的外港吉达，由吉达横渡红海，运往阿伊扎布或其他埃及港口，正如前面已经叙述的，阿伊扎布就是中国陶瓷运往埃及的重要卸货之处。

这样看来，阿拉伯半岛不仅如古代所传说的，在其南部有一个富裕的希娃女王国，由于女王把那里的黄金和香料等送给了法老时代的埃及，才使埃及繁荣起来。而且，在古代和中世

纪，它也是对东西方贸易发生很大作用的。从残留在南阿拉伯沙漠中心的那些古代和中世纪的非常宏伟的遗迹中，可以推测，这些都市在当时曾积贮了大量的财富。*

所以，从阿拉伯南岸的中世纪遗迹中发现中国陶瓷，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些陶瓷用以装饰商人和富翁的家庭，或者作为商品被贮存起来。由于地理条件和政治条件的困难，阿拉伯半岛在考古方面尚未进行充分而彻底的调查，将来若能对西阿拉伯的中心地麦加或麦地那进行考察，则在陶瓷贸易方面，肯定能发现饶有兴味的结果。

陶瓷贸易的记录

前面提及的那位十四世纪的伊本·巴图塔，他在他的旅行记中叙述有关中国陶瓷时提到："传入印度和叙利亚的中国陶瓷，在吉达（麦加的外港）不足为奇。"同样，元朝人汪大渊在十四世纪前半期所著的《岛夷志略》这本地理书中，也指出"青白花瓷"是中国运往天堂、即麦加的贸易商品之一⑤。另外，前已提及的、十五世纪初期随郑和远征的费信，在其旅行记《星槎胜览》中，也记载了同样的情况，清楚地记录了

* R.L.小鲍恩，F.P.奥尔布赖特：《南阿拉伯的考古发现》，巴尔的摩尔，1958年。

“青白花瓷器”。[7] 由此可知，在十四世纪初期，麦加的本地人已经知道了中国陶瓷，并且十分喜爱，这是信而有征的。同时也可以窥知，在当时的品种中，包括青瓷、白瓷、白瓷青花即青釉瓷器等，都是很受人们珍视的。

现在还有一个有趣的记录，和费信一起随郑和远征的马欢，在其所著从军记《瀛涯胜览》中写道，明朝的海军抵达加尔各答时，恰巧有一艘麦加船停泊在那里，于是就要求此船乘坐七个使者去麦加，带去了“麝香和瓷器”等。这些使者在一年后返回，据说买来了那里的珍货奇物。[8] 这份历史资料对了解当时麦加的情况很有意义。不过当时送去的中国陶瓷是什么品种，就有待于考古学调查的结果了。

费信在《星槎胜览》中说，在阿拉伯的佐法儿（Zafar）和剌撒（AlAhas），也把瓷器作交易的商品[9]。佐法儿据说相当于现在半岛南岸的佐法尔，但剌撒的位置还不清楚[10]，可能也是南岸的某个地方。关于阿拉伯半岛南岸的情况已如上述，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半岛东面的波斯湾海岸吧。

波斯湾海岸的巴林岛

从阿拉伯半岛南岸进入波斯湾，必须经过面

向阿拉伯海的阿曼。阿曼东岸有个苏哈尔港，在这个港口的旧市区，也出土了中国的青瓷和明代的青釉瓷器，还有泰国的青瓷。这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现代探险家兼考古学家温德尔·菲利普斯所发现的。他还详细地叙述了同时出土的伊斯兰陶器。但遗憾的是，对中国陶瓷的情况语焉不详。* 不过，阿拉伯半岛东岸的阿曼既已探明了有中国陶瓷的出土，则以后的考察就可转向波斯湾一侧了。

巴林岛是中国陶瓷在波斯湾的出土地。它是波斯湾南岸略居中央的酋长国，是英国的保护国，[11] 如今则以石油产地而著名。从空中鸟瞰，这是一个漂浮在青澄碧绿得异乎寻常波斯湾海面上的棕色岛屿。从油田附近到港口，则脏得乌黑一片，确实让人联想到这是一个石油之岛。

在岛上捡到中国陶瓷片的地方是首府格拉特巴林[12]以南四百米的清真寺废墟和附近的海滨。铃木八司氏在这里搜集了二十八片青瓷和五十八片青釉瓷器碎片。** 据小山富士夫氏所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陶瓷片收藏中，也有从巴林

* 温德尔·菲利普斯，《尚未探明的阿曼》，第161页，纽约1966年。

** 《漫步在波斯湾沿岸的遗迹上》，载《朝日新闻》6卷31期，1964年8月2日。

岛采集而来的。*

虽然石油和中世纪的中国陶瓷，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是在这个地方出土了中国陶瓷，毕竟是出乎意料的。这里发现的青瓷，多数是十四世纪后半期到十五世纪初期的明初龙泉窑瓷器。其中还有事前粘贴上并状花纹的、独特的元代青瓷钵碎片（参照“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普萨拉伊博物馆”）。青釉瓷器的花纹主要是蔓藤草花和莲花，多数似乎是明代中期的制品。

此外，按照铃木氏的说法，居住在对岸沙特阿拉伯的达兰的美国人，在他们的收藏中，有在接近海岸的卡提夫所发现的中国北宋货币咸平通宝（九九八—一〇〇三年）等，此外，康奥尔教授在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的调查中，同样也在卡提夫搜集到北宋绍圣年间（一〇九四—一〇九七年）和南宋绍定年间（一二二八—一二三三年）的钱币（大概就是绍圣通宝和绍定通宝）。

在内地十分荒凉的巴林岛及其对岸的卡提夫地区，发现了中国北宋时代的钱币和元、明时代的陶瓷器，这无疑说明了，从十二、三世纪到十五、六世纪，这里曾是波斯湾沿岸的中转贸易地，而且当时在此居住着相当多的富豪。

---

* 《美国美术馆中的东方古陶瓷》，载《陶说》57期，昭和32年。

回溯到伊斯兰时代以前的远古，当公元前三千年中期至公元前二千年中期，即是繁荣的印度河文明时代。那时，印度河流域的人们，曾使用具有特色的印章，这种印章，已于一九五二年在这个巴林岛上为丹麦调查队所发现。印章的大小不过三厘米见方，刻有作为图腾的兽形和印度文字。由此可见印度河文明人（确切地说是哈腊帕人[13]）在公元前三千年的后半期或二千年的前半期就已经居住在这里。当时，印度河流域的哈腊帕人，把木棉和宝石之类，经水陆两路，大量运往美索不达米亚，从而获取贸易之利。在那样的远古，巴林岛及其近处，就曾是海路上的重要停泊之处，是一个贸易基地。

所以，在波斯湾贸易兴隆的伊斯兰年代，巴林岛作为一个贸易港而繁荣起来，这自然就不足为奇了。

译　注

① 米特罗波里坦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在美国纽约市中央公园东侧，是全世界最大的美术博物馆之一。 ——译者

② 此处原书有讹，苏哈尔（Sohar）应作佐法尔（Djohar）。苏哈尔今在阿曼东北部，是滨临阿曼湾的一个小港口；佐法尔今在阿曼西南部，滨临阿拉伯海。巩珍《西洋番国志》（向达校注本）记载的是祖法儿国，也就是《星槎胜览》记载的佐法儿国，並非苏哈尔。《西

洋番国志》记载祖法儿国说："中国宝船到，开读诏书并赏赐劳，王即遣头目偏谕国人，皆以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易纻丝、瓷器等物。"——译者

③ 《星槎胜览》（冯承钧校注本）后集，阿丹国："货用金银、色段、青白花瓷器、檀香、胡椒之属。"

④ 《埃留乌德海航行记》（Periplus Maris Erythraei），公元一世纪的希腊文著作，内容主要是有关红海、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等地航海、贸易的目击记载。古希腊地理学者把红海、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等，统称为埃留乌德拉海。——译者

⑤ 普利尼乌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公元23—79），罗马帝国的将军和海军提督，对自然科学有广泛研究，公元七十九年维苏威火山爆发，前往现场进行科学调查，因有毒气体窒息而死。最著名的著作是《博物志》三十七卷。——译者

⑥ 《岛夷志略》（藤田丰八校注本）天堂："贸易之货用银、五色缎、青白花器、铁鼎之属。"藤田注："天堂，谓默伽Mecca也"。

⑦ 《星槎胜览》（冯承钧校注本）后集，天方国："货用金银、缎匹、色绢、青白花瓷器、铁鼎、铁铫之属。"

⑧ 《瀛涯胜览》（《纪录汇编》本）天方国："宣德五年，钦蒙圣朝差太监内官郑和等，往各番国开读赏赐，分䑸到古里国时，内官太监洪见本国差人往彼，就选差通事等七人，赍带射香瓷器等物，附本国船只到彼，往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其默伽国王亦差使臣将方物跟同原去通事七八，献赍于朝廷。"——译者

⑨ 《星槎胜览》（冯承钧校注本）后集，佐法儿国："货用金钱、檀香、米谷、胡椒、色缎、绢、瓷器之属。"又后集，剌撒国，"货用金银、色绢、瓷器、米谷、胡椒之属。"——译者

⑩ 《星槎胜览》前集，剌撒国，冯承钧注："旧考谓即波斯湾中之al-hsā，伯希和云，对音虽未尽合，比附颇有可能。"——译者

⑪ 已于一九七一年八月独立。——译者

⑫ 今名麦纳麦（Manama）。——译者

⑬ 哈腊帕（Harappa），在今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位于印度河支流拉维河以南，萨希瓦尔城以西。早期居民曾在此活动，已发现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到一千五百年间的遗迹。——译者

四　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普萨拉伊博物馆

——中国陶瓷的世界性搜集

去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是我喜爱的城市。结束了在埃及的长期调查，来到这个城市的郊外，总觉得轻松愉快、心性舒畅。时值三、四月间，这里是一片绿野，草原嫩绿而鲜艳，自然界似乎在招手欢迎着我，真想在草地上躺下来舒展一下身体。

一接近市区，就逐渐显现了这个地区的古色



从马尔马拉海眺望托普卡普萨拉伊

古香。东罗马时代的高高的水渠挡住了去路，历经古代和中世纪的坚厚城垣，也令人神往。进入市中心，人群就熙熙攘攘，在这个亲切而平静的集体中，这种纷杂的场面，倒也使人感到兴奋。

在这里，即使你混杂在人群之中，没有谁会对你露出敌意的眼光，男男女女，小伙子和姑娘们，都是笑容可掬地来来往往。但是，我们却也并非不受注意，因为我们是日本人，据说，土耳其对日本人怀有好感。

站在欧洲那一侧的山丘上向下瞭望，能看到起伏着深绿色波浪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海峡彼岸的亚洲一侧，有许多起伏的山丘，连绵不断直到遥远。海峡中，波涛滚滚，汹涌澎湃，与辽阔明亮的马尔马拉海相连。

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马尔马拉海连接之处，有一个深邃的海湾，楔入于欧洲一侧的山丘之间，这就是金角湾。山丘因海湾的楔入而形成隔岸对峙的形势。在海湾的出口处附近有一座加拉塔桥，把两岸的山丘连在一起。集中在这一带有许多烤栗摊、烤鱼摊以及设在棚屋里的饮食摊，它们的香味引起人们的食欲。向亚洲那一侧摆渡的渡船，以及开往博斯普鲁斯海峡或马尔马拉海的船只，都从这桥下通过，正因为此，所以这里挤满了男女老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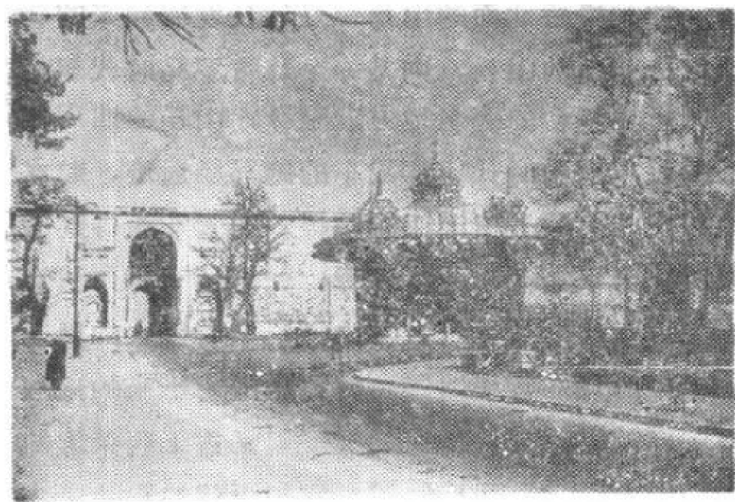
加拉塔桥北面的山丘，是近代发展起来的新市区；南面的山丘，则是一个从古罗马时代起就进入历史舞台的著名地方。至今，山丘的四周，还残留着罗马时代比赛战车的跑马场遗迹、贮水池以及闻名的圣索菲亚寺院等。圣索菲亚寺院后来改建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此外还有布尔清真寺等许多伊斯兰建筑，其中还混杂着巨大的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宫殿遗迹。在前代遗留下来的这些宫殿中的一部分，现在就成了追忆古王朝荣华的托普卡普萨拉①伊博物馆。它和近代的那些考古博物馆一样，让旅游者浮想联翩，缅怀往昔的历史。

中国陶瓷的宝库

我们梦寐以求的中世纪中国陶瓷的巨大收藏，就堆积在这个托普卡普萨拉伊博物馆的好几个房间之中。

总的说来，世界上陈列着中世纪中国陶瓷的博物馆多得不计其数，但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一样，名贵的陶瓷陈列得如此琳琅满目。

一进入陈列室，映入眼帘的是十三世纪后期即南宋末叶以至元、明时代的各种色彩绚丽的青瓷。其中也有十四世纪即元朝和明朝初年的白瓷青花大盘和大碗，其色彩和花纹的美丽，令人眼



托普卡普萨拉伊博物馆入口处

光缭乱。完整的元朝青釉瓷器，据说在世界上已经为数不多，约仅二百件左右，但这个博物馆里却收藏着其中的八十多件。

元、明时代的白瓷也有不少，都是些当时输入的没有花纹的产品。它们好像是特别为了迎合这个地区人们的爱好，而制造的精细工艺品。这中间，有的是在白瓷碗上镶嵌宝石作为装饰，或是用金银精制而成。这些都是洋溢着东方风采的辉煌灿烂的工艺品，看到这样的制品，就可以了解当时的宫廷生活。

此外，还有铭文为“大明正德年造”（一五〇六—一五二一年）的黄彩，十五、六世纪的五彩（赤绘），嘉靖年间(一五〇六—一五二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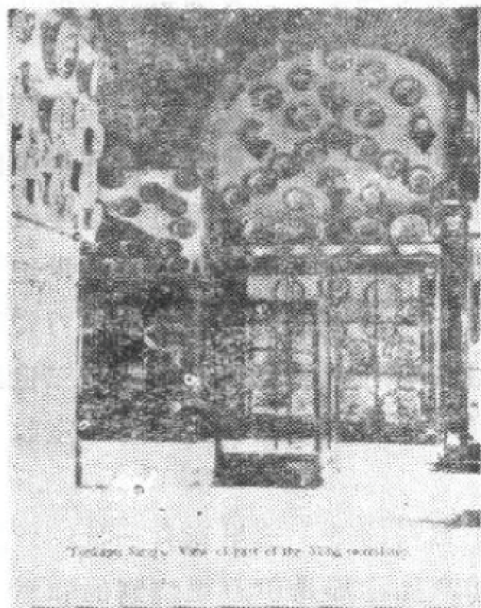
制造的豪华金襕手，以及为数颇多的十七世纪即清朝初期的青釉瓷器和五彩瓷器。

总而言之，和我们在埃及福斯塔特所见到的元朝以后的中国陶瓷碎片几乎是同类型的瓷器，都在这里完整地陈列着。不过，这里没有象在埃及和东非沿海地方所见到的那种十世纪到十二世纪的制品——例如越州窑瓷、北宋青瓷和青白瓷等，而且在青瓷方面也只有始于十三世纪末叶的龙泉窑产品，这就可以说明这个王室收藏的历史。

出乎意料的是，这里竟有一批江户时代从日本输入的产品，那是伊万里烧制的非常美丽的彩色画大坛。它们在从前因为质量不如中国陶瓷而未受注意，但现在仔细鉴赏，却是极其精致出色的制品。其中有许多称为沈香壶形式的十八世纪制品，也还有一些更早期的或更近代的制品。古伊万里制品，原来都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舶运到爪哇，想必是后来辗转地运到了伊斯坦布尔。在这里能偶然遇到日本的制品，毕竟令人愉快。

我们在这里到处浏览，陈列室里无处不是中国陶瓷，满满的橱窗里，使人应接不暇。墙壁上也挂得琳琅满目，几与屋顶相接。

眼目所及，全是陶瓷，倒不免使人杞忧，假使这里发生地震，则挂在墙上的许多珍品，将会



托普卡普萨拉伊展览的部分明代陶瓷

遭到如何的结果？

这里为什么能搜集到如此众多的陶瓷，总数共有多少呢？这些问题，在参观的过程中，都情不自禁地涌上心头。

托普卡普萨拉伊博物馆的由来

在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型博物馆，多数都是从前的旧宫殿。现在，在质和量方面都称得上第一流的博物馆，计有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鲁布尔博物馆，列宁格勒的埃密塔奇博物馆和纽约的米德罗波里坦博物馆等四大博物馆。它们

之中，就有两个是由从前的王宫改装而成的。

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普萨拉伊博物馆，也是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旧宫殿，但是它的来历比较复杂，故特据波普氏的研究*，略述其沿革。因为事前有所了解，则访问参观时将会倍增兴趣。

在伊斯坦布尔建造宫殿的最早皇帝，是奥斯曼帝国的穆罕默德二世（一四五一——一四八一年）。他在一四五三年占领了攻击已久的伊斯坦布尔，消灭了历史悠久的拜占廷帝国，然后选择了狄奥多西② 皇帝广场（今巴亚齐特广场附近）地方建造王宫，这就是旧宫殿（土耳其语称为埃斯基萨拉伊）。

不久以后，他似乎厌弃了这个地方，而在俯视马尔马拉海的风光绝佳处，于一四六七年建造了一座新宫殿（土耳其语称为耶尼萨拉伊）。

新宫殿的东门由炮兵守卫，在塔上装置了大炮，所以东门在习惯上就被称为大炮门（土耳其语称为托普卡普）。在这以后约二百五十年，阿哈迈特三世于一七〇九年在托普卡普附近的滨海处又建造了一座木结构的离宫，它以后逐渐扩充，到了十八世纪中期（一七四八年），已经成为一座有美丽庭园环绕的大宫殿。从此以后，托

* J.A.波普，《十四世纪的青瓷和白瓷，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萨拉伊博物馆中的一批中国陶瓷》，华盛顿，1952年。

普卡普萨拉伊（大炮门宫）这个名称就出现了。

这座滨海建造的托普卡普宫殿，后来又经过改建，作为夏宫（在山丘上的新宫殿作为冬宫）。但是，一八六三年的夏季（八月十一日），由于后宫起火而把整个宫殿烧得荡然无存。于是，托普卡普萨拉伊的名称就由山丘上的新王宫继承了下来。接着，土耳其帝国于一九一八年消亡，成立了共和国。山丘上的托普卡普萨拉伊（从前的新王宫）就成了博物馆，它的名字从此永远保存。

就这样，宫殿里收藏着的大量陈设和珍宝，即在此展览。这中间，尤其是豪华富丽的宝石类陈列橱窗，曾使多少女观众目眩心迷。

中国陶瓷的收藏

陶瓷也是当年宫殿收藏品的一部分。今天的托普卡普萨拉伊博物馆，其所收藏的陶瓷器，种类遍及世界各国，总数据说达到一万，而其中有八千件是东亚的陶瓷器。在这些东亚陶瓷中，大部分都是中国的制品，此外不过是泰国和日本的若干件而已。这里的中国陶瓷，收藏丰富，式样齐全，真可谓集其大成。

根据波普氏调查的结果，这里收藏的中国陶瓷，其种类和时代约如下述。

按种类说，最显眼的首先是青瓷，共有一千三百件。其中十三世纪即宋朝的很少，几乎全是十四世纪初期，即元、明时代的制品，而且盘子、盆、碗等类具有极好的质量，其中还有花瓶状的大壶，在日本称为天龙寺手或七官手。其外观形状均称，色泽甚佳，而且富丽堂皇。



托普卡普萨拉伊博物馆的元代青釉瓷器

除了青瓷以外，元末和明朝的瓷器约有二千六百件，其余的四千多件则是清朝的制品。

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初期，即从元末到明朝，主要是青瓷和青釉瓷器。前面已经提及，这中间包括八十多件举世稀罕的元朝青釉瓷器。元朝的青釉瓷器，是用流畅的笔调，把牵牛花、菊花和牡丹花等花卉，松、竹、芭蕉、瓜类等草木，山水、人物以及池鱼、麒麟、凤凰、龙等动物，

组合起来描绘在白皙的白瓷大盘或大碗上，大方而壮严，确实引人入胜。时至今日，只要有一只这样的大盘，就已经价值连城了。所以，若能把收藏中的这些元朝青釉瓷器全部整理出来，就是一宗骇人听闻的财富。

明朝初期，即十四世纪后期到十五世纪前期的青釉瓷器，也有很多优质品。此外，还有明朝的白瓷、黄地红彩瓷或赤绘以及金襕手等许多种类，不胜枚举。下面且举出几种形式与众不同的瓷器，作为对明朝陶瓷的总结。

这里有这样一种瓷器，即在中国输入的白瓷、青瓷、青釉瓷器或赤绘的大碗、盘子、杯子等上面，由土耳其的艺人，用一种称为镶嵌的方法，嵌入很多黄金或宝石，精制成一种华贵的式样，显得光彩夺目。这些都是十六世纪奥斯曼帝国全盛时期苏里曼大帝时代前后的制品。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这个时代能够精制出如此豪华的宫廷用品。其时正当中国明朝后期文化成熟的嘉靖、万历年代。

看到这种中国和土耳其的合作制品，就不禁联想到其他国家在中国陶瓷上的精心加工。前面已经提到，早在十一世纪到十二世纪的埃及法蒂玛王朝时代，就已在中国输入的漂亮的德化窑白瓷上，用鲜艳的色彩，画上伊斯兰式的花纹，从

而精制成独特的合作陶瓷。这就说明，在伊斯兰地区，曾有利用输入的材料来表达其独特风格的习惯。

以后直到十七、八世纪时，欧洲各国的人们，从中国或日本输入陶瓷，然后在碗或杯子上用银或黄铜加以装饰，使之符合于他们自己的兴趣，情况与上述伊斯兰地区相同。

明朝的陶瓷就赘述至此。至于清朝的陶瓷，在康熙（一六六二——七二三年）、雍正（一七二三——七三六年）、乾隆（一七三六——七九五年）等各个时代，也有出色的青釉瓷器和赤绘，但详情不拟再叙，需要提及一下的是，在清朝的中国白瓷上，也有添绘土耳其风格的鲜艳花纹的合作陶瓷。

收 藏 史

对于托普卡普萨拉伊，还有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即是这个王室是怎样获得他们如此巨大的收藏的。因为为了掌握陶瓷贸易的实际情况，这个问题是大家都想探索的。可是对此实在很难获得端倪。

幸而，在新宫殿建造前后，宫廷在置备用具方面，有一本详细的收藏目录，借此可以窥见一斑。兹以波普氏的研究为主，略述其情况如下。

在收藏目录中涉及中国陶瓷的情况，似在一四九五年的第二号目录中，但对中国陶瓷有确切记载的，则为一五〇一年的第三号目录。由此可见，托普卡普萨拉伊开始搜集中国陶瓷，为时当在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与埃及、东非以及下面将要提到的美索不达米亚、伊朗等地相比较，事实说明，这里已为时颇晚了。

当然，上面所述的只是宫廷中开始搜集的年次，并不能说明拜占廷时代住在君士坦丁堡或小亚细亚的商人们，他们在当时有没有搜集过中国陶瓷？

遗憾的是，在土耳其，从年代比这更早的遗迹中，并未发现中国陶瓷，但将来如能进行调查，想必还会获得许多资料的。

现在让我们再说上述宫廷中的收藏目录。有关中国陶瓷的记载，随着目录的页数而增加。据一五一四年的目录，由于土耳其军队战胜了伊朗大不里士的伊斯迈尔王的结果，又增加了六十二件中国陶瓷，这大概是战利品吧。

事情可能稍有出入，在十六世纪初期到过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赛义德·阿利·埃克巴尔，在他所著的《中国故事》（一五一六年）中说，明朝武宗正德帝（一五〇六——一五二一年）赠送给萨利姆一世（一五一二——一五二〇年）二件以阿拉

伯文字为装饰的中国陶瓷，事情虽然未必确实，但这陶瓷似乎也收藏在这个宫殿里。

而且，被称为大王的苏里曼一世（一五二〇——一五六六年），在其席上的餐具中，据说也曾有中国陶瓷。所以在这段时期中，宫廷中收藏的中国陶瓷，数量确实有所增加，这是毋庸置疑的。

只是在一五七四年，由于厨房失火，烧掉了以前的收藏。但以后又得到了迅速的补充，所以在一六八一年的收藏目录上，又登记着数百件中国陶瓷。不过，收藏数目超过万件，却是出现在从一七六二年起到一七九二年之间的事。遗憾的是，为什么在短短三十年之间能增加如此大量的收藏，却无法探索清楚。

在十八世纪后半期增加的收藏中，如果包括许多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的中国陶瓷，那末，这种增加决不是贸易或贡献的结果。因为当时曾有许多珍贵的物品，从其属领叙利亚和埃及运到伊斯坦布尔。则这些古代的优质陶瓷，或许是从收藏着许多优质中国陶瓷的开罗所运来。

总之，在土耳其以宫廷为中心所搜集的许多中国陶瓷，其中有购买而得的，有馈赠而得的，有贡献而得的，也有从其他收藏者那里掠夺而得的。于是，收藏就这样逐渐庞大起来。假使宫廷

是这样获得他们的收藏的，那末，其他贵族、朝臣和富人们，也会仿效朝廷而从事中国陶瓷的搜集。至于这些陶瓷的来路，那当然是由出入于伊斯坦布尔的船舶运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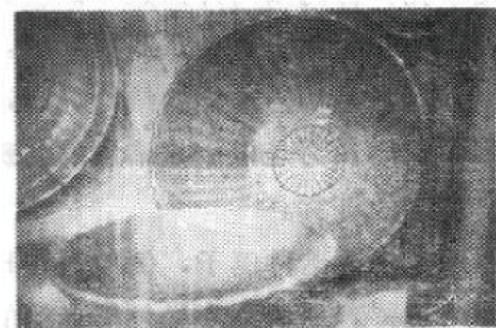
托普卡普萨拉伊所收藏的全部陶瓷，在阿布杜勒迈齐特一世（一八三九——一八八一年）时，是收藏在宝库里的。后来才移交给博物馆收管，这就是如今展览在我们眼前的。

以上是我不嫌其烦而叙述的这个具有特色的博物馆，以及举世珍奇的中国陶瓷在那里的收藏情况。

由于在这个博物馆里，还收藏着形式非常雅致的青瓷，所以下面还要顺便介绍一下青瓷的情况。

贴花青瓷

在托普卡普萨拉伊展出的十三世纪末叶到十四世纪前半期的龙泉窑青瓷，其中有装饰着奇特图案的大盆和大碗。在盆碗内侧的正中，紧紧地粘贴着并状的大菊花图案，作为一种装饰。这种盆不仅有上述特征，而且在菊花图案的反面，即高脚边围着的底部中央有一个孔眼。而粘贴在中央的菊花图案，在形式上正好塞住了这个孔眼。这类青瓷的品质一般极佳。



托普卡普萨拉伊博物馆的贴花纹青瓷

这种式样的元代青瓷碎片，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迹中也颇有发现，而且当时埃及本地也烧制形状和色彩都和这一模一样的仿制品，所以这种式样一定颇受埃及人们的欢迎。同行的和久井路子君，曾检点了数量，约有五十六个。但陈列在高处只能见到侧面部分的展品中，好像也有同样类型的，故其数目还将增加，则总数必当很大。

下面还将提到，在伊朗德黑兰考古博物馆的阿尔德比勒收藏中，也陈列着若干这类制品，波斯湾南岸的巴林岛，伊拉克的瓦吉特遗迹以及叙利亚的哈马遗迹中，也都发现这种碎片。

可是，不可思议的是，在土耳其、埃及和伊朗所看到的如此大量的贴花装饰的青瓷，在青瓷原产地的中国和中国中世纪青瓷大批输入国的日本、菲律宾、爪哇等东亚地方，却完全未能看到。偶然看到在碗内中央贴着小花图案的，但底

部却并无小孔。曾向国内外研究中国陶瓷的专家们请教过，他们也都没有在东亚见到过。

我经过思考，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类陶瓷器归根到底只能认为是应中东诸国的特殊要求而在龙泉窑烧制的订货。

其他地方也有这种例子，例如，在日本和东南亚诸国，遗留着许多称为吴须③赤绘的制品，这是一种花彩稍多的赤绘瓷器，由于它们全是为了输出而烧制，所以在中国本土也并无存在，而且大概也不曾在中东遗迹中发现过，说明这类制品只限于输往日本和东南亚。

把范围再缩小一点来看，在日本，讲究茶道的人，非常重视青釉瓷器中一种称为祥瑞手的瓷器，这种瓷器产于十七世纪前半期，是一种用调和的吴须色，精心地描绘着细小的装饰花纹、山水和人物图案之类的青釉瓷器，这是日本特别向江西省景德镇订货而烧制的，为其他国家所无，连中国自己也并不存在。

按这些例子推测，回溯到十三、四世纪时，中国的窑场曾经烧制外国特别订货的商品，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情况，既是了解中国窑场生产结构的一种线索，也是了解阿拉伯和中国双方的贸易关系及其影响等方面的线索。并且还可以了解中东人民对各种陶瓷器爱好的情况。

那末，中东人民为什么要订制这种特异形式的瓷器呢？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一番研究，倒是颇有兴趣的事。

订货者的爱好

大体而论，无论东方或西方，在陶瓷器制造过程中，看来都有过这样一个阶段，即是把陶瓷器作为金属容器或石制容器的代用品，从而发展了陶瓷业。在日本，人们不知为什么总不太喜欢金属容器，结果是用漆器来代替。无论是东方的中国或西方的中东地区，显而易见，初期的陶器制造是努力忠实地模仿金属容器或石制容器的。在中国，战国时代和汉朝时代的陶器，甚至像把手那样的零件，也精心地模仿着金属容器。特别是中世纪伊斯兰陶器（波斯陶器）的发展，是因为哈里发禁止制造奢侈的金属制品，因而作为代用品忽然兴起的。所以难怪其形状以至于细枝末节，很多都和金属制品一样。在伊朗陶器中，最富于特色的是发光陶器。这种陶器，拿到明亮处看，画在表面上的阿拉伯花纹，就闪闪地发出七彩的金属色泽，所以名闻远近。这类制品，从形状、色彩到设计，都表现出模拟着高贵的金属制品的幻想。

既然如此，那末他们如果到中国去订制陶

瓷，必然也要求迎合土耳其、埃及和伊朗等地的人们的爱好，而需要与金属制品相似的东西。

根据这样的联系来观察一下这个地区的金属制品，就可以发现一种球形、也就是略呈圆形的金属碗或盆。其碗底内侧的中央部分膨大，简直是像肚脐那样地凸着。为什么要制造这种形状的碗和盆呢？据说是为了宗教上的某种特殊的用途。但是这种解释看来并不恰当。在土耳其，从很古老的赫梯人④时代（公元前一千年前半期）起，就已经使用这种形状的金属碗了，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使用，所以这是他们非常喜爱的一种形状。

对于上述在器皿底部中央有花形凸起的这种形式，与中国的青瓷盆、碗有相同之处，此事颇有研究价值。中东人民要求制造像金属盆、碗那样底部凸出的陶瓷盆、碗，这不正是以后出现的底部隆起着井状花纹的陶瓷器吗？要使陶瓷器也像金属器那样让底部凸起来，这在技术上显然是困难的。所以不得已代之以隆起的井状花纹，然后在上面贴上习俗常见的图案。对于这样一种形状奇特而有趣的青瓷器的来由，也只能作如此解释吧。这种形状的青瓷器输入中东以后，当然迎合当地人民的爱好。因此到后来，形状完全相同的仿制品就在埃及和其他地方大量制造并销售

了。

另外还有一种设想，即认为中国在十二—十三世纪时，原来就有这样一种碗底中央贴花的青瓷制品，中东人民也许知道了中国有这样的青瓷器，因为它恰恰适合自己的爱好，所以扩大了对中国的订货。

对上面这种青瓷器继续根究下去，还会遇到另一个更为有趣的问题。即为什么在高脚边围着的碗底中央，要开上一个小孔呢？面对着这样的青瓷器，一边观察，一边思索，真是陶瓷研究中的一种乐趣。

这当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非一般常识所能判断。不过，假使将贴上花纹图案的青瓷器，模拟为底部凸出的金属碗，那末，对于底部为何要开小孔的问题，看来也可找到进行解释的线索了。

因为若把底部凸出的金属碗，翻过来看看它的反面。就可以发现，在正面圆圆地凸出之处，其反面却是圆圆地向内凹入。则青瓷碗碗底的这个小孔，不正是为了要想产生这个凹入的感觉吗？陶瓷不同于金属，要真的做到底部凹入，这在技术上是有困难的，但开凿一个小小的孔洞，却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另外，开了小孔以后，既能使底部厚度均

匀，在烧制过程中还有助于使底部得到适宜的火候。并且由于小孔的开通，底部正面的并状装饰能附着得更为坚牢。

最后还可以增加一个经济上的理由。如果这

的中世纪建筑物和遗迹中，有中世纪中国陶瓷发现的记载。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像托普卡普萨拉伊博物馆那样，能象征性地证明，十三世纪以前的中国陶瓷，在那里确实存在。

那末，在十一十二世纪时期，安纳托利亚真的没有输入中国陶瓷吗？或者是在伊斯坦布尔以外的地方，确实没有使用过中国陶瓷吗？果然如此的话，那末，这倒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标志，它如实地告诉我们安纳托利亚在中世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情况。当然，现在尚不能对此作出任何断言，因为尽管土耳其正在进行古代遗迹的研究，但是对于中世纪的遗迹，研究得还很不够。而且，这个地区的研究者，缺乏有关中国陶瓷的知识。

将来还要再度来此，探索中国陶瓷在土耳其的遗迹，这是我需要进行的一项科研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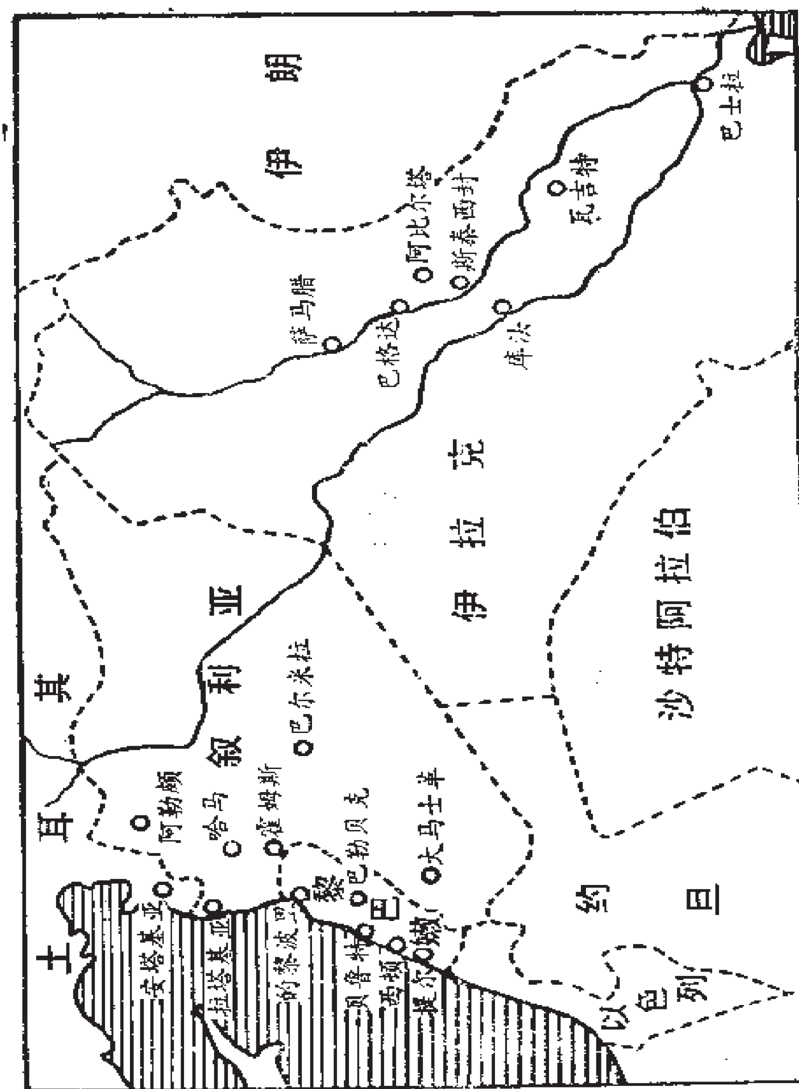
译　注

① 萨拉伊（Sarai），土耳其语意谓宫殿。
——译者

② 狄奥多西（Theodosius Ⅰ，在位379—395），东罗马帝国的第一代皇帝。——译者

③ 吴须，是作为陶瓷器釉彩用的蓝色颜料。过去多用中国出产的本吴须（唐吴须），是一种含有大量钴、锰、铁的黑褐色黏土，近来已使用人造吴须。
——译者

④ 赫梯人（Hittite），公元前二千年进入小亚细亚的雅利安族，以赫梯为首府，公元前十六世纪征服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各一部分，公元前十四至十二世纪在埃及与亚述之间建立大帝国，至公元前十二世纪迅速衰亡。 ——译者



五　从东地中海到美索不达米亚

——与中国陶瓷相遇

东西方贸易道路与东地中海沿岸

东地中海的碧绿海水，使得眼神为之一爽。而且它很深，似乎让人们真实地领略绀碧这一词汇所赋予的一种享受。在这种碧绿色逐渐转呈青白色而色调变淡的地方，自南而北，出现了漫长延伸的海岸线，富饶的沿海地区，就沿着这海岸线作带状伸展。这个地区东端的极限是顶巅白雪皑皑的黎巴嫩山脉。在过去，这片山脉的山麓地带，曾为挺拔的黎巴嫩杉所被复。这些杉木向四方输出，现在连砍伐的残迹也已罕见。但它却是黎巴嫩共和国的国徽，由此可以理解，当地人们对这种树木是如何地怀念。

东地中海海岸，它既是从东方的遥远之处，越过重山、穿过沙漠，去到西方的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的终点，也是从地中海这边，远往东亚的中国或南亚的印度的贸易道路的起点。所以在这沿海一带，由北而南，恰到好处地分布着许多港

口，如萨尔乌基亚、拉塔基亚、塔尔图斯、的黎波里、比布鲁斯、贝鲁特、西顿、提尔等。港口的四周尽是麦田，其间还夹着葡萄、橄榄和无花果树等，郁郁葱葱，非常繁茂。一到春天，野生的银莲花红得灼眼。这些港口都很热闹，充斥着西方的人群和东方的商品。这种商品是通过开往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和埃及等地的来往船只运来的。自古以来，这一带景况繁盛，中国的丝绸必然也是经此运往罗马和埃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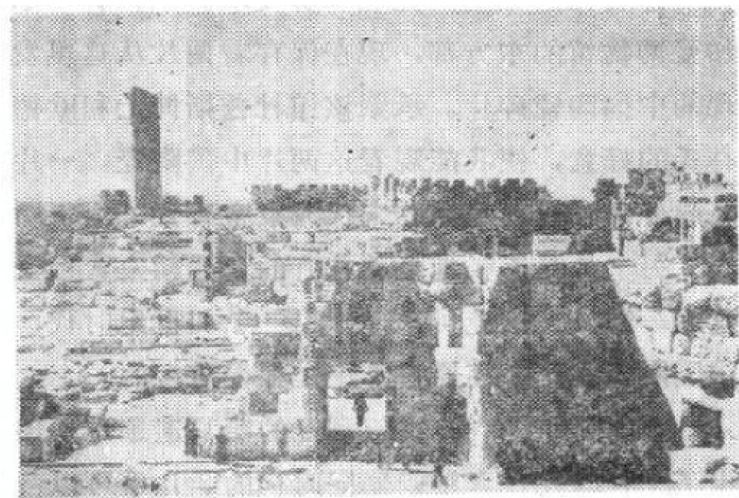
东地中海沿岸地带，即古代叙利亚（今属叙利亚、黎巴嫩两国，另一部分属土耳其和以色列）的西部，其情况我看就是如此。

黎巴嫩的巴勒贝克

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到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车行仅两小时，其间必须翻越两座高山，即黎巴嫩山脉和后黎巴嫩山脉。在这两座顶巅积雪的山脉之间，有一处称为贝加的高原地带，高原上的巴勒贝克，有一个罗马时代的遗迹。

罗马人实际上是热中于建造城市和修筑城堡的，他们所征服的地方，即使是多么偏僻，也都会处处建起以巨大的石造神殿为中心的城市。也许他们曾在这些城市中往来踯躅，狂饮葡萄酒，过着愉快的生活。从另一面看，如果没有这种用

坚固城墙围起来的场所，那么，他们也许就无法安心入睡吧。



巴勒贝克风景

巴勒贝克也是罗马人所建的这类城市之一。至今不仅还残存着雄伟的丘辟特神殿、伯加斯神殿和维纳斯神殿①，而且还残存着政府机关和法院的遗迹。这些豪华壮丽的建筑，简直令人瞠目。最近发掘出来的建筑用石料，据说一块有重达二百吨的。真想问问古人，这样巨大的石块，是如何搬运到这里来的呢？在法院的正面，还竖立着从尼罗河上游阿斯旺运来的高大的红色花岗石圆柱。罗马时代的这个巴勒贝克城，在罗马放弃东地中海地方时，它也顿时成了废墟。但到了中世纪的伊斯兰时代，它似乎又复苏作为从叙利

亚内地到海岸的中途要地，因而受到了重视。

我所探索的中世纪中国陶瓷，在这个以古老和宏伟自豪的巴勒贝克也有所发现。东柏林巴尔加曼博物馆的东方部，现在保存着两片从这里发现的中国陶瓷碎片。承蒙该馆杜兹斯博士和欧德林氏的好意，使我能观看这两片中国陶瓷。一片是内外都画有莲花瓣的宋代龙泉窑青瓷盆的断片，另一片是流畅地画着花卉的元代精致青釉瓷盆的一部分。由此可知，十二—十四世纪时代，中国陶瓷在这个高原古都中是很受重视的。

下面还将提到，在叙利亚的哈马遗迹中，出土了一种与元代青釉瓷器同时代的、几乎可以乱真的仿制陶器。这些仿中国制的陶器，一定是以中国的青釉瓷器为模式而制成的。所以，元代的青釉瓷器已经输入叙利亚，这是显而易见的了。如此看来，一切就都可理解。当我们在大马士革的博物馆里发现了这种仿青釉瓷器制作的陶器时，真是高兴得如获至宝。

引为遗憾的是，对于巴勒贝克的出土物是从哪几个地方和什么样情况下被发现的，却仍然不得而知。但是无论如何，通过这个以罗马时代的遗迹而名显一时的古都中所发现的陶瓷器，从而证明了在中世纪时代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仅此一端，也就足以大书而特书了。

叙利亚的哈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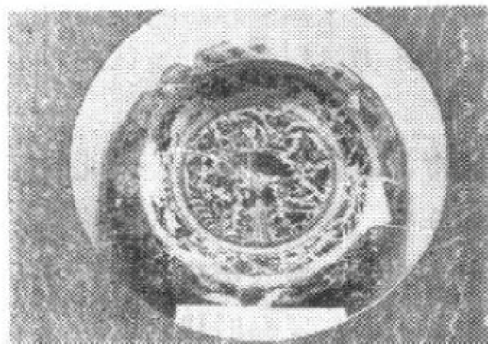
从巴勒贝克所在地的贝加高原，往东再翻越后黎巴嫩山脉，就是叙利亚的大草原。在后黎巴嫩山脉及其延伸部分的山脉东麓，是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等城市，自古以来，它们在东方的历史上，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即使在今天，它们也还仍然作为各个地区的中心而繁荣发展着。

这些城市都沿着从大马士革向北的阿勒颇的道路上直线分布，它们都是令人深感兴趣的。因为这些城市各有各的漫长历史，而且各有各的特色。大马士革不仅从罗马时代起就是一个著名的城市，在萨拉逊帝国的倭马亚王朝时代也曾经作为首都。霍姆斯是扼住通向巴尔米拉之路的军事要冲。此外，位于大马士革和巴尔米拉中间偏北的哈马，它面向阿西河，自古以来就是政治、经济和交通上的要地。至于阿勒颇，从罗马时代以后，它就是各国争取的重要城市。耸立在市中心的雄伟而坚固的城堡，严密地睥睨着四周。

中国陶瓷就是在这些城市之中的哈马遗迹里发现的。

哈马是个很奇特的城市，它的重重叠叠的街道，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几经毁坏和重建。今天，

房屋就在十几米高的丘陵上层层排列着。人们居住在丘陵上，那就必须打水上去。因此，直径七、八米的特殊结构的大水车，唧唧嘎嘎地把阿西河水送入高高的水管。从“哈马的水车”这个出名的名称之中，可知这种大水车，自古以来就一直世世代代地在这里转动着。



哈马遗迹出土的元代青釉瓷器仿制品

这个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日积月累地堆积起来的丘陵，其中的一部分，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八年间，在丹麦国立博物馆调查团的努力之下，才发掘了出来。遗迹的年代，是从新石器时代直到十五世纪。

在可能推断的九百五十年到一千四百年的最上层中，发现了青瓷、白瓷、青釉瓷器等中国陶瓷的碎片。它们是在帖木儿时代的宝剑的下一层中被发掘出来的，所以显然是十五世纪以前的东西。另外又发现了中国青釉瓷器的仿制品，即白

地蓝釉彩画的波斯陶器。

一九六四年三月，我访问了保存着这些陶瓷碎片的哥本哈根。参观了银光闪闪的洁白的国立博物馆。承蒙发掘者* 里斯博士夫妇和普尔森博士的好意，让我鉴赏了中国陶瓷碎片。

在这个博物馆中，既有南宋时代的浮牡丹花纹的精致陶瓷盆碎片，也有内侧中央（碗底）贴花的元代青瓷盆的一部分。这种元代青瓷的特征，与在开罗的福斯塔特遗迹、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普萨拉伊博物馆或伊朗的阿尔德比勒等处所看到的相同。

此外，这里还非常显目地藏着宋代德化窑白瓷的白色碎片。还有外侧是很美的辰砂、内侧是带青色的白瓷碗的一部分。后者即辰砂白瓷，在这个遗迹之中，也许是年代最晚近的东西了。

这里除了藏有中国陶瓷以外，还藏有东南亚的陶瓷，如泰国的宋加洛府窑的陶瓷盆碎片。十四—十五世纪的泰国陶瓷，在埃及的福斯塔特或东非沿岸的遗迹中都有所发现，下面还将提到，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国也都很多。大批输往西亚的这些泰国陶瓷，可能都是作为中

* P.J里斯，V.普尔森：《中世纪的玻璃器和陶瓷器》，载《哈马发掘和研究1931—1938》，第四卷，第二期，哥本哈根，1957年。

国陶瓷的代用品，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由于对中国陶瓷的殷切需求，甚至因此而波及到了泰国。

牧歌式的大水车和异国情调的丘陵城市哈马的故事，都成了与中国陶瓷息息相关的内容。

关于叙利亚的叙述就到此结束，下面还得赶紧转往去到东方的美索不达米亚之路。

从叙利亚到美索不达米亚

离开叙利亚，向东就到伊拉克。这是嵌在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之间的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的地区。所谓伊拉克，这个词汇据说也是“水边”或“沿岸”之意，所以这个国家是和“水边”或“沿岸”有联系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狭长而肥沃，它与埃及并列，是最早享受文明之果的地方。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到伊拉克的巴格达，航空路程仅一小时十分，汽车路程则必须横穿沙漠，得花费十三、四个小时的时间。现在看来，这两地之间的交通已很方便，但是这不过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在过去，两地之间的往来是并不这样容易的。因为在这两地之间，横亘着一片辽阔的沙漠，加上在沙漠中还有以掠夺为生的慓悍的贝都因人[2]在那里伺机抢劫。

所以在过去，一般的旅行者，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他们从叙利亚北上，到达幼发拉底河上游，由此再往东南迂回旅行，然后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从大马士革到巴格达，如果乘坐骆驼摇晃前进，就得经过二十天以上的长途跋涉。叙利亚和伊拉克互相毗连，看上去似乎近在咫尺，但路程却是意外地遥远。从叙利亚到伊拉克之间的这个弯曲的大弧形，是一片曾被过去的东方学家普拉斯塔[3]特命名为肥沃的新月形地带的复新地区，从这个地区中可以发现，这两个国家是具有共同性的。

美索不达米亚是个富庶的地方，而且它也有世界文明创始地的一种传统。因此，这里在任何时代，都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即使在被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桑王朝征服的时代，也仍然是个重要的地区。尤其是萨桑王朝时代，巴格达以南的斯泰西封，曾被兴建为首都之一。

到了伊斯兰时代，当强盛的阿拔斯王朝[4]（七五〇—一〇五五年）建立之时，也仍是选择美索不达米亚的地方作为首都，起初是幼发拉底河畔库法，继之以底格里斯河畔的巴格达和上游的萨马腊等地。特别是七六二年哈里发阿尔曼苏尔所建立的巴格达，几乎成为萨拉逊帝国繁荣的

象征。

贸易是萨拉逊帝国最重视的经济活动，因此，珍奇的物资和昂贵的商品，都从四面八方云集于此，再从这里销售到各地，这就增加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财富。不仅如此，而且还从远方招聘工人，从事出色的工艺生产。早在八世纪中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库法，已经有了来自中国的工人。现在，让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在这方面提供证明的重要资料。

八世纪中期，在中亚的怛罗斯[5]，曾经发生过一次由中国高仙芝率领的唐朝军队与阿拉伯军队的大战，结果是唐军溃败，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被虏，造成了凄凉地死于异国的悲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怛罗斯战役（七五一年）。

当时有一个被俘的中国人名叫杜环，他被带到了幼发拉底河畔的库法，后来获准返回唐朝，八世纪末曾出任唐朝的宰相[6]。杜环回国以后，把当时被羁留在萨拉逊帝国期间的所见所闻，整理成文章发表，至今还残存着他当时记录的一部分，称为《经行记》。这种情况，很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扣留在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内陆的日本人，也和《马可·波罗行记》所经历的故事相似。

《经行记》中有这样一段，它很生动而又趣

味横生地描绘了当时作为首都的“亚俱罗”，也就是库法的情况。书中写道：

> “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山西方面）人乐隈、吕礼。”[7]

这说明在那里确有中国人，他们或许和杜环一样，是被俘而来的，也说不定是随着贸易商船来此的工人。但是无论如何，事实是在这样早的年代里，中国人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定居，以绘画和纺织营生，这就引起人们难以形容的兴趣。杜环当年在库法和本国人相遇，想来是百感交集的场面吧。

如果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则中国陶瓷的知识已传播到这一地区，也就毫不为奇了。因此，如果搜寻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国陶瓷，则从各处的中世纪遗迹中都会有所出土，而其中萨马腊遗迹当是很重要的一处。

萨马腊遗迹和中国陶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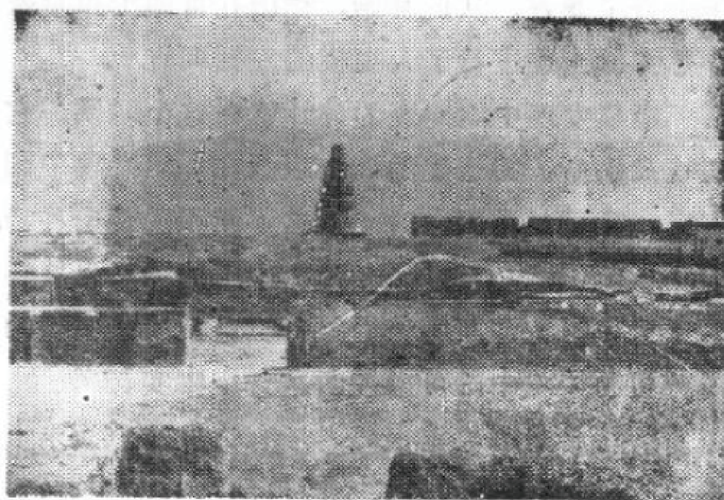
提到巴格达，这是谁都知道的，可是提到萨马腊的名字，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萨马腊是横卧在距巴格达北面约一百二十公里的底格里斯河畔的大遗迹。九世纪中期，它是作为萨拉逊帝国阿拔斯王朝的首都之一而建筑起来的。从历史和考

古学的角度来看，其重要性仅次于巴格达。

已经有了巴格达这样一个漂亮的城市，可是却又放弃了它，而在萨马腊兴建起新的首都，这中间是有其原委的。在哈里发哈隆·阿尔·拉斯特显赫的阿拔斯王朝的初期，首都巴格达是很繁华的，似乎给人以万事大吉的印象。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自从九世纪初期以后，哈里发（教王）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和禁卫军的叛乱接踵地发生了。

第八代的哈里发阿尔·穆塔西姆（八三三—八四二年），为了逃离这种血腥的环境，以偶然发生的底格里斯河泛滥之灾为借口，作出决定，把首都迁到巴格达以北一百二十公里的萨马腊，于是就在八三八年（一说八三六年）建起了这个大城市。

底格里斯河畔的萨马腊，位于南、北美索不达米亚之间，显得比巴格达干燥而爽朗。遗迹分散在东西两岸，方圆三十余公里，这中间发现了宫殿、官署、门、清真寺、邸宅和跑马场等等遗迹，都是些半倒塌的宏大的废墟，它们使人缅怀当时这个城市规模的雄伟、和壮丽。其中尤其是南、北两个大清真寺，各都有伞形塔那样的大尖顶（北为阿普塔拉清真寺，南为迈尔韦亚清真寺），还保留着阿拔斯王朝时代的浓厚色彩，给



萨马腊风景（采自伊拉克政府发行的书籍）

人以深刻的印象。

经过这样大兴土木而建造起来的萨马腊，到了四十五年以后的八八三年（一说八八二年），在第十五代哈里发阿尔·穆塔米特（八七〇—八九二年）时代，却又被废弃，迁都到瓦吉特，接着又再次迁回巴格达，从此以后，萨马腊就不再作为首都了。只有南郊的圣伊马姆陵庙，它的黄金圆屋顶闪闪发光，至今还一直受到伊斯兰教什叶派的重视，所以历来一直有人到此巡礼。

因为萨马腊都城建于八三八年而废于八八三年，所以这个遗迹是九世纪中期伊斯兰文化遗留下来的最好资料。它必然要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本世纪初期，法国建筑学家维沃勒特在一九一〇

年进行了调查。从此开始，德国扎雷博士和哈兹费尔特博士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调查*。

最早发现中国陶瓷的碎片就在这个时候，它和埃及福斯塔特遗迹的调查以及在那里发现中国陶瓷，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从此，萨马腊这个名称和中国的关系也就知名于世了。从前面所谈论的萨拉逊帝国和中国的各种贸易情况中，可以证明这一个事实。

萨马腊遗迹范围很广，还有许多地方尚未调查。因此，以后又由伊拉克政府的考古局人员，进行了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之间**和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之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发掘调查，发现了种种新的情况。对于中国陶瓷的问题，当然了解得更为清楚了。

现在终于谈到了中国陶瓷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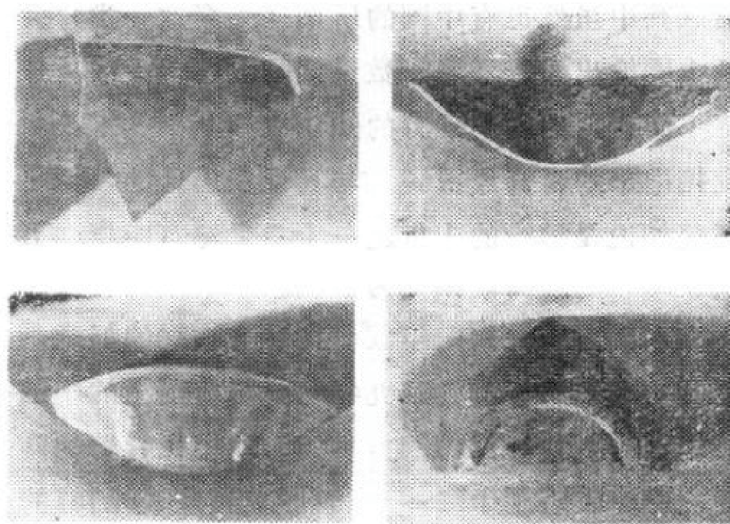
首先，我们想知道中国陶瓷运抵这里的种类。第一次所发掘的中国陶瓷，根据前述扎雷氏的报告***，是从耶乌萨克宫殿紧邻的仓库中发现的唐三彩式的大碗和盘子、绿釉及黄釉罐的破片、白瓷和青瓷片；穆塔瓦基尔大清真寺庭院的

---

* 《萨马拉发掘报告》第五卷。

** 伊拉克政府考古局，《萨马腊的发掘1936—1939》，巴格达，1940年。

*** 福林德里希·扎雷，《萨马腊的陶瓷器》，柏林，1925年。



萨马腊出土的中国白瓷片

井口边出土的是青瓷片；从阿西克宫殿地下室出土的是白瓷片。由于出土了如此多种多样的中国陶瓷片，当然引起了轰动。

从这样一个据说仅在九世纪中期一度使用过的遗迹的特殊性质来看，扎雷氏认为发掘所得的全是中国唐代的制品。但从现在的知识来判断，却很难说它们全部都是中国陶瓷。最有疑问的特别是三彩系陶器、绿釉和黄釉陶器等等，都很难说是中国制造的。一九六四年，我曾被允许调查阿巴希德王宫博物馆仓库里收藏着的、从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调查时出土的中国陶瓷片。那里的绿釉系、三彩系和黄褐釉系的软陶，大部分是伊斯兰模仿唐三彩的多彩陶器和多彩刻线纹陶

器（其中虽然也有中国的所谓辽三彩这一类）。从中国输出的唐三彩，数量实际上是极少的。

而且，以我们现有的知识来判断，扎雷氏所发掘出来的青瓷或白瓷，与其说是唐代的，似乎还莫如说是稍晚的十世纪—十二世纪（晚唐、五代、宋）的瓷器，则更为恰当。

当我于一九六四年蒙伊拉克考古局的好意，鉴赏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从萨马腊出土的中国陶瓷时，曾在阿巴希德博物馆仓库中保管着的陶瓷片中，发现了十二—十三世纪(南宋、元初)的青瓷和青白瓷。此外，在巴格达汉马詹的阿拉伯博物馆的萨马腊出土物中，也发现了南宋时代画有镐形花纹的龙泉窑盆的一部分。

因为是专程调查，所以再略作赘述。在同年即一九六四年参观西柏林的塔雷姆博物馆时，那里展出的萨马腊出土物中，也发现了十二—十三世纪（南宋、元初）的龙泉窑青瓷片。

虽然我现在匆匆地论述了这个遗迹中出土的宋代中国陶瓷，但是这并不是说这里完全没有发现九世纪的陶瓷。事实上，巴格达的阿拉伯博物馆里也有九世纪—十世纪（唐末、五代）的越州窑瓷，西柏林的塔雷姆博物馆里也同样有九—十世纪的越州窑瓷和白瓷碗的碎片。

所以，在九世纪中期，当这里是首都的时候，

曾有大量中国陶瓷的输入，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要是这个首都在公元八八三年以后，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完全放弃了，那末就不可能出土贵重的舶来品——中国的青瓷、青白瓷和白瓷等。如果这样，那就和以往一直相信的事实发生了牴牾，在失去了作为首都的地位以后，萨马腊是否仍然居住着相当多的贵族或商人？另外，若是以后来到这里的只是一些到圣伊马姆陵庙的巡礼者，则他们是不可能把如此昂贵的陶瓷器留在这个荒废了的庙宇里的。把这种事实作出明确的证实，当然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如果由于中国陶瓷在这里的出土的资料，竟至改变对萨马腊的固有概念，那末，中国陶瓷将起到双重的、甚至更为重要的作用了。

伊拉克诸遗迹中的中国陶瓷

阿拔斯王朝时代的繁荣城市，还不仅是萨马腊一处，当然比较重要的城市，更有巴格达和建立在两河河口的、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海港巴士拉等。在这些地方，当然一定曾经运来过许多陶瓷，但是由于不断地被洪水深埋于地下，所以直到今天，还不曾知道有关这方面发现的消息。联系到在更小的城市里也发现了中国陶瓷的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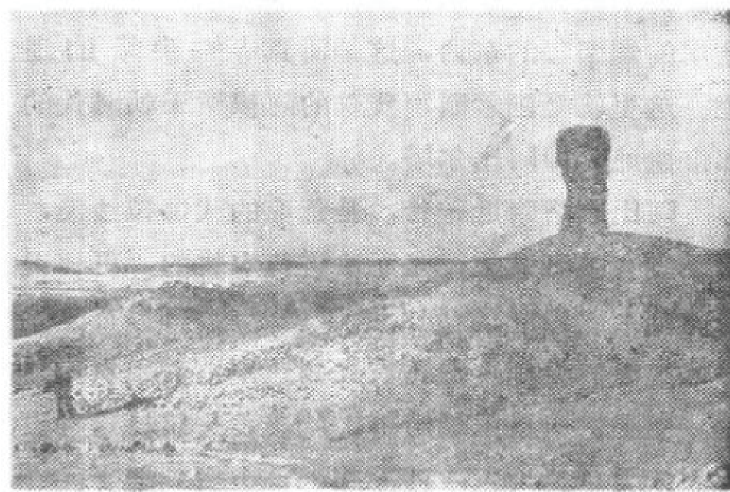
那末，在上述大城市中以后也可能在什么时候有大量的发现吧。这里的所谓更小的城市，是指瓦吉特、斯泰西封和阿比尔塔等。

〔瓦吉特〕　瓦吉特位于伊拉克南卡特东南七十公里左右处，这里有伊斯兰时代的城市遗迹。当首都从上述萨马腊再次迁移到巴格达时，其间有好多年，瓦吉特也曾经作过阿拔斯王朝的首都，所以这里也并不完全是个乡村式的城镇。

从这里发掘出来的遗物，也有保管在巴格达的阿巴希德王宫博物馆的仓库里，也有陈列在阿拉伯博物馆里。其中有外侧用镐形花纹装饰的十二—十三世纪（南宋时代）的龙泉窑青瓷盆子，它们大体完整，而且非常精致。另外也有内部中央（碗底）贴有菊花图案的元代龙泉窑青瓷盆的破片。这种碗底贴着菊花图案，与碗底相对的外侧底部开有小孔的青瓷盆子，是只能在东方，例如埃及的福斯塔特、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叙利亚的哈马和伊朗的阿尔德比勒等地才能看到的一种特殊的青瓷盆子。这大概是应这些地方的人们的需要而定货生产的吧。这样的瓷器也被运到了瓦吉特，这个事实难能可贵地给我们揭示了这个地区的居民爱好的共同性。

〔斯泰西封〕　其次是靠近巴格达的斯泰西封，它位于巴格达以南约三十五公里处，它以波

斯萨桑王朝的首都之一而闻名。这个遗迹分布在稍感阴暗的灰色原野上，其中一部分已为德国调查队所发掘。这里至今还残留着崇高而雄伟的宫殿附属建筑物大厅的一部分，招徕着追溯历史的游客们。以后，即使在伊斯兰时代，这个城市也并未消失，因为在附近的田野里，到处散扔着伊斯兰时代的陶瓷破片。其中发现有十二—十三世纪（宋代）的龙泉青瓷片，这些遗弃的文物被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一九六四年，当我得到一小片这种青瓷加以鉴赏时，它在我脑海里迅速扩大，成为当年斯泰西封的富豪家庭使用时的一种形状。在这里，到处都是这种中国的陶瓷片。



阿比尔塔遗迹

最后来看：阿比尔塔和中国陶瓷的关系。

〔阿比尔塔〕对于阿比尔塔这个陌生的遗迹，我是从日本大使馆驻开罗的奈良参事官那里听到的，据他所说，那里出土了中国陶瓷。

一九六四年二月的清晨，我们一行（八木正男大使夫妇、松见守道、杉村栋诸氏和我），决定前去参观阿比尔塔，它位于巴格达东南约十公里处。在往斯泰西封的公路途中，向东拐弯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坦的红褐色冲积地，地面荡然无物。稍向前，就发现了大运河的痕迹，在阿拔斯王朝时代，它是为了供水而在这荒野里开掘出来的。在这附近，发现了被沙覆盖的小型废墟，但离开阿比尔塔还有一半路程。车辆按响导的指引在沙漠中行驶，不久，在地平线上出现了一支像倒塌的烟囱似的东西，这是清真寺的尖塔的遗迹。这里就是围着断垣残壁的阿拔斯王朝时代的都市遗址，即阿比尔塔。

阿比尔塔附近一带，是荒凉的代耶拉沙漠，如果没有灌溉设施，是无法进行农耕的，更何况兴建都市。因此，当强大的王朝建成之时，首先就得修建灌溉设施，派遣农民到这里，着手农田建设。但是，一旦王朝衰落，就会丧失维持这种设施的能力，耕地再次沙漠化，都市遭到遗弃。在中东地方，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在伊斯兰时代，可能是倭马亚王朝的第十代哈里发希沙姆（七二四—七四三年）修建了这里的灌溉设施。于是，居民移来定居，从八世纪后半期起到九世纪，土地肥沃，收获也随着增加，阿比尔塔就作为这个地区的中心而繁荣起来。但是到了九三七年，巴基加姆麾下的土耳其军队，开始向巴格达进袭，阿拔斯王朝第二十代哈里发雷迪（九三四—九四〇年），为了对这里进行守御，命令破坏了灌溉渠道，这里于是又再次成为荒野*。

这个被遗弃的悲惨城市阿比尔塔，到十世纪初期就成为废墟。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芝加哥大学曾经调查了这个地方，在五、六百米方圆的土城内，倒塌的清真寺和房屋遗迹重重叠叠，遍地都散扔着伊斯兰初期的陶片。我所见到的这些陶片，正如历史所叙述的，确实都是些伊斯兰初期的制品。

我们争着采集陶片，终于也在这里发现了九—十世纪烧制的褐色越州窑瓷和华南白瓷的破片。今天展出在东京出光美术馆陶片室里的，就是这些陶片。

中国陶瓷，从九世纪到十世纪起，真是像流水似地渗透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各个城市。

---

* 拙著《关于中国陶瓷与伊斯兰陶器的关系的若干问题》，载《西南亚研究》第十四号，第6—7页，1965年。

译　　注

①　丘辟特（Jupiter），罗马神话中的最高神；伯加斯（Bacchus），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维纳斯（Venus），罗马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　　　——译者

②　贝都因人（Bedouins），阿拉伯沙漠中游牧民的总称。“贝都因”在阿拉伯语中意谓“住帐幕的游牧民”。　　　——译者

③普拉斯塔（James Heury Breasted，1865—1935），美国历史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曾主持对埃及勒克苏尔和巴勒斯坦马齐特等古都的发掘，著作有《埃及史》等。　　　——译者

④　阿拔斯王朝，阿拉伯人所建的伊斯兰封建王朝，即我国新、旧《唐书》所称的黑衣大食，自七五〇年阿布尔·阿拔斯（Abu—l—Abbas al Saffah）创建，到一〇五五年为塞尔柱所灭，历时三百余年。其全盛时期，领土横跨欧、亚、非三洲。　　　——译者

⑤　怛罗斯（Talass），今译塔拉斯，在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西北。杜环，《经行记》和贾耽，《四夷路程》均作怛罗斯，《新唐书》作怛逻斯，《元史》作答剌速。　　　——译者

⑥　杜环，新旧《唐书》均无传，其出任宰相事，无不见史籍记载。　　　——译者

⑦　所引据王国维《古行记校录》本。其中“刘泚”，王国维注：“《寰宇记》引作泚”；“乐隰”，王国维注：“《寰宇记》引作还”。又括号内“山西方面”四字是作者所加，非《经行记》原文。　　　——译者



六　带往波斯的中国陶瓷

——东西文化的接触点和中国陶瓷

波斯这一词汇的反响

波斯这一词汇，对我来说，长期以来一直在心底里充满了余音缭绕的反响。在这个遥远的西方之地，其文化是何等丰富多采，与居鲁士①和大流士②等名字一起流传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其首都珀塞波利斯③是何等的壮丽，而亚历山大又是如何激底地破坏了它。光明之神阿胡拉·马兹达和黑暗之神安拉·马伊尼（阿里蒙）④相交错的琐罗亚斯德教，波斯萨桑王朝⑤的银器和正仓院⑥收藏的波斯制多角形玻璃碗，在中国首都长安翩翩起舞的波斯舞姬，以及后来伊斯兰时代的波斯陶器和细密画⑦等等。这些情况，长期来不断地进入我的知识领域，因此，波斯这个名字，一直亲切地盘旋在我的耳际，最后终于成为代表西亚的重要名称。其实，这并非我一个人的想法，对日本人民来说，大概都是有同感的。

波斯在中东的地位，无论在文化、政治或

经济等各个方面，自古代以至中世纪，实际上都极为重要。而且通过东西方两个世界的陆路和水路的沟通，大量贸易商品运抵波斯地区，促使了它的富裕。加上从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传来的文化，为这个地区的昌盛文化奠定了基础，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波斯文化。

事实是，自从公元前七世纪米堤亚帝国[8]（公元前六二五—五五〇年）在伊朗西北部崛起以后，这个波斯，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已经成了西亚的中心实体。

继米堤亚帝国以后的世界大帝国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五五九—三三〇年），此后，帕提亚帝国[9]（公元前二四七—公元二二六年）和波斯萨桑王朝帝国（二二六—六四二年）成了西亚的代表。即使到了七世纪初期被阿拉伯军队征服以后，这里也仍然保持着他作为中东文化代表者的矜持。等到倭马亚王朝（六六一—七五〇年）下台，阿拔斯王朝（七五〇—一二五八年）兴起时，萨拉逊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移到了波斯地方。另一方面，波斯想要摆脱萨拉逊帝国的羁绊而独立出来的倾向极为强烈，结果是从九世纪以后，在东北部的霍腊散[10]地区早已建立起来的独立政权一直延绵不断。诸如塔希尔王朝（八二〇—八七二年）、萨法尔王朝（八六七—九〇三年）和萨曼王朝（八七四—九九九年）等，都是以伊朗的西北部作为根据地的地方王朝。

以后直到土耳其人的塞尔柱帝国（一〇五五——一九四年）、蒙古人的伊儿汗国（一二五八—一三九三年）和帖木儿帝国（一三六九——一五〇〇年）时代，波斯也仍然是西亚的中心。这几个王朝的统治者虽然都是其他外来民族，可是这里的文化却一直保持着阿契美尼德王朝以后的波斯文化的传统，并没有被外来征服者的文化所取代。

十六世纪初期兴起的波斯人的萨法维王朝（一五〇五——七三六年），终于把自从七世纪以来一直为异族所有的统治权，又夺回到波斯人自己手中，建立了繁荣的帝国。这个王朝持续了二百数十年，于十八世纪前半期下台，继之而起的是阿夫希尔王朝（一七三六——七九四年）和加吉尔王朝（一七七九——一九二三年）。从一九二五年以后是当今的巴列维王朝[11]，从那时起，就一直由波斯人自己管理自己了。而且也没有帝国主义各国的入侵，一直保持着独立，不愧为具有古老传统的西亚国家这一称号。

如上所述，可以说明，波斯这个古老的国家，长期来一直保持着它自己的特色。

日本与波斯的接触很早，说起来也是出人意外的。波斯的工艺品早在五一六世纪已经运来日本。在奈良县飞鸟地方，五世纪末、六世纪初的古墓群之一（新泽千塚一二六号墓），其中出土了西亚制造的一组雕花薄玻璃的小壶和蓝色的玻璃花托。此外，从安闲天皇[12]的皇陵中发现了与收藏在正仓院一样的六世纪前期的波斯萨桑王朝的多角形厚碗。从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出，日本和波斯在五一六世纪就有了交往。

另外，在朝鲜海峡离岸甚远的孤岛中，在冲岛[13]的祭祀遗迹中以及京都上贺茂神社中，都同样地发现了萨桑王朝时代的波斯雕花玻璃的残片。

据黑川真赖翁的记录，明治五年九月七日，仁德天皇[14]陵墓的攀登口被暴风雨毁坏，因而暴露出石室和石棺，当时发现在殉葬品中，有蓝玻璃的壶状器皿和透明的玻璃碟子（这些东西后来又埋回去了），按今天的知识来判断，一定是一组西亚制造的玻璃器皿。* 假使如此，则在五世纪前半期，珍贵的西方玻璃器皿，当也已运入日本，这就比正仓院时代更早三百年了。

---

* 三上：《西亚的工艺与日本》，载三上、山边知行、冈田让合编《东洋美术》第六卷（工艺），朝日新闻社，昭和44年。

如果日本和波斯及西亚的接触是如此之早，那么，理所当然地，波斯作为优秀文明的发祥地这一概念，也就早已深深地印在我们日本人的心目之中了。

如此波斯，我们今天即使是偶作访问，它也不会辜负我们的期望，必将仍然是个令人眷恋的愉快地方。

东西方世界的接触点——波斯

飞机一接近首都德黑兰，白雪皑皑的厄尔布尔士山脉使视野为之扩大。这座幅度很广的山脉，从东向西延伸于伊朗高原的西北部，其中央屹立着更为高峻的主峰德马万德峰。这是一座美丽的火山锥，高达海拔5671米。

厄尔布尔士山脉的北侧，雨量充沛，有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和肥沃的农田，这就是风平浪静的里海沿岸地区（马赞德兰省）。山脉的南侧与北侧相反，是非常干燥的地带，越往南越干燥。中部是岩石和沙构成的卡维尔沙漠。在同一条山脉的两侧，风土却如此悬殊，几乎令人感到惊骇。

不过，即使是在厄尔布尔士山脉的南侧，也到处有高山冰雪融化而流贯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就成为绿洲。随着绿洲的大小，就出现了城邑和

村落。像东部的马什哈德和内沙布尔，中部的沙赫鲁德，西部的德黑兰和加兹温等，都是沿着厄尔布尔士山脉以及与之相连的东北部的一些复杂山脉南麓的大城市。在古代，从中亚或阿富汗穿过伊朗高原到达美索不达米亚的骆驼商队，就是这样伴随着骆驼铃声，通过这些山脉南麓的绿洲而旅行的。

沟通东西方两个世界的贸易道路，在厄尔布尔士山脉以北当然也有。从中亚土库曼共和国通向伊朗北部的道路，经过马鲁和阿什哈巴德以后，进入伊朗北部的戈尔甘，由此往西，穿过伸展在厄尔布尔士山脉北侧和里海之间的富庶的马赞德兰地区，然后到达高加索地方以及伊朗西北部的草原和山地。从此可以前往高加索和黑海方面，或安纳托里亚（土耳其）和底格里斯河上游。东西方的各种商品，也是通过这条草原之路而进行频繁地交易的。

伊朗高原上还有一条称为扎格罗斯的山脉，它自北向东南延伸。这条幅员广阔的山脉，从厄尔布尔士西端的伊朗西北部开始，向东南通往与美索不达米亚接壤的地带。此山形状极为奇特，在波斯湾北侧继续再往东南延伸，一直到达俾路支斯坦。

在这山脉之间和山麓之下，也可以看到星罗

棋布的绿洲。从伊朗西北沿着这些绿洲前进，随即越过伊朗东南的锡斯坦和俾路支斯坦，就能到达巴基斯坦的印度河下游地方。公元前四世纪末叶，世界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从他的最终到达地印度河流域把军队撤回时，所走的也正是这条道路。从南亚印度方面运去的某些货物，也是经过这条道路到伊朗西北部，然后再往西翻越札格罗斯山脉，运到美索不达米亚。

现在再论述一下沟通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海路的情况。

我在前面已经说明，札格罗斯山脉在地形上是沿波斯湾走向东南的。这片山地的南麓，是闪耀着波斯蓝⑮色彩的波斯湾海洋。从天空鸟瞰，波斯湾的颜色实在美得难以形容。沿岸的海水是浅绿色的，离岸渐远，就像是欣赏一组蓝色的颜料盒似的，逐渐逐渐地加深，终于成为清澈得深不见底的波斯蓝色，渲染着这个波斯湾。这种水色恬静、深沉而引人入胜。渡越这个海湾的时候，如果你聚精汇神地对海凝思，那就可能会情不自禁地纵身入海。

但是，一到岸上，情况就十分不妙，酷暑和湿气，会像恶魔似地欺凌你。波斯湾的炎热确实难挡，这里，夏季温度在摄氏四十度以上，五十度的高温也是常事。加上很高的湿度，人们的精

神和肉体都备受折磨。

这就使我想起了近数年来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的同行们，他们对波斯湾沿岸在中世纪兴旺过的港口城市希拉夫遗迹进行了调查，他们慨叹地说，在这里能进行工作的时间，充其量也只有一月和二月这两个月份。

可是，就是在这气候如此严酷的波斯湾沿岸，却处处残留着繁荣的古代港口遗迹。上述英国调查队所发掘的希拉夫和控制波斯湾入口的霍尔木兹岛，以及至今仍然很重要的沙特阿拉伯河口[19]的巴士拉等，都是自古以来波斯湾沿岸的著名港口，此外，还有许多小港口。所有这些，都是自古以来作为东西方贸易的基地而繁荣一时的地方。

正和前已提及的红海沿岸的阿伊扎布废墟一样，对于那些谋财求利的人来说，地理条件上的困难是算不了什么的，只要能够通过这个地区，就是他们唯一的目的。

在上述沟通东西方的绿洲古城之中，以及接纳海运物资的波斯湾沿岸的古港口之中，都保藏着许多古代和中世纪的遗迹，这里已经发掘出各种富有意义的遗物，其中也包括我们所探求的中国陶瓷。

以下就将在伊朗各地发现中国陶瓷的古迹加

以探讨。

波斯湾沿岸诸遗迹

古代和中世纪时代，从海上进入波斯湾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横断印度洋的航路，它从南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出发，越过阿拉伯海，首先到达阿拉伯南岸的亚丁附近，再由此沿南岸折往东北，经阿曼入波斯湾，巡航于湾岸各港口。乍一看来，这似乎是一条迂回的航路，但是从印度方向驶来的船支走这条航线的，正如家岛彦一氏所证实的，却是意外的多＊。

第二条是沿岸航路，从印度西南的马拉巴尔海岸出发的船只，沿印度西海岸北上，到巴基斯坦的印度河口。下面第七章中将要提到，在今卡拉奇东南，有一个旁浦尔港口城市的遗迹，这些地方曾经应该是重要的停泊港口之一。

从这里出发的船只，随即循海岸进入波斯湾，于是，一面把货物卸落在波斯湾北岸的各个港口，一面途往湾底行驶，在霍尔木兹和希拉夫顺路停泊以后，就可到达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河口。从前，当亚历山大的军队从印度河河口

＊ 家岛彦一：《有关印度洋通商史的一次考察》，载《东方》第十卷，第一、二期。又家岛彦一：《唐末中国、大食间的印度洋商路》，载《历史教育》第十五卷，第五、六期。

撤回时，其将领纳亚尔古斯所率领的一支军队取海道西返，也就是这一条沿海航路。

从东方去的船只，是通过上述两条海路进入波斯湾港口的。凡这些船只停泊之地，处处都发现了中世纪的中国陶瓷。

这一带的遗迹从东面开始计有：与巴基斯坦接壤处附近的提兹，提兹以北的但巴古及其附近的瓜拉提·詹希德，进入内陆后则有哈利勒河谷地中的吉拉夫特及其附近的谢里·达吉亚努斯等等。

在极度荒凉的沙漠海岸和内陆，从这些被抛弃的遗迹中捡到了中国陶瓷而踌躇满志的，是著名的印度学学者、考古学家和中亚探险家奥雷尔·斯坦因⑰。据查看过这些陶片的霍布逊说，在但巴古发现的中国陶瓷是十五世纪，即明代初期的青釉瓷器，在谢里·达吉亚努斯出土的是九—十世纪的越州窑系陶瓷，另外还有可能是十世纪烧制的青瓷和青白瓷等。这样看来，从唐末到宋初，中国陶瓷已由骆驼商队运到札格罗斯山脉北麓的谢里·达吉亚努斯一带了。* 另外，在瓜拉提·詹希德发现的，是很多冰裂的白瓷，斯坦因

---

* R.L.霍布逊：《波斯南部与旁遮普北部的陶器碎片》；A，斯坦因，《印度西北部和伊朗东南部的考古踏勘》，附录A，伦敦，1937年。

认为，大概也是来自中国的输入品。*

此外，波斯湾入口处的一个著名的贸易港霍尔木兹岛的对岸，在靠近米纳布沿海一带的喀拉登，发现了许多宋代的优质陶瓷碎片，其中混杂着一枚宋代铜钱。这也是斯坦因发现的。据他说，这枚铜钱是一一一一——一一一九年的东西。** 这个年代涉及北宋徽宗的政和及重和二代，但重和从一一一八年至一一一九年，前后只不过两年，因此，这枚铜钱极可能是政和通宝。总之，这里发现的中国陶瓷，看来也可以认为是十二世纪，即南宋时代的东西。

循波斯湾继续西进是希拉夫港，从九世纪中期到十二世纪，这里由于船舶的往来而得到繁荣。现在，它只不过一个在塔黑里沿海一带的小村落近旁残留着的静寂遗迹而已。但是就在这个遗迹中，却发现了显然是中国制造的几个陶瓷片***。

由于英国伊朗考古学研究所从一九六五年开始，持续了好几年的希拉夫遗迹的发掘，发现了许多中国陶瓷片，从而更加证实了这里出土的中

---

* 斯坦因：《印度西北部和伊朗东南部的考古踏勘》，第86页。

** 同上，第183页。

*** 同上，第184页。

国陶瓷的性质。我在一九六六年访问该研究所时，得以见到了在希拉夫采集的许多中国陶瓷片。在大英博物馆的本达·威尔逊氏所搜集的箱子中，有中国的越州窑瓷和白瓷。不过奇怪的是，在我的印象中，并未发现青瓷。

关于在波斯湾沿岸发现中国青瓷的问题，中国的陈万里氏曾经指出[18]，从波斯湾沿岸的巴士拉、其附近的商港乌索拉（从前的阿帕罗古斯）、幼发拉底河口的喜拉，以及霍尔木兹一带的小岛上的吉许等等遗迹中，也发现了龙泉窑青瓷*。遗憾的是不知道他的说法有什么根据。

以上我已把波斯湾沿岸的许多实际上发现中国陶瓷的城市或遗迹作了介绍，通过对中世纪历史记载的研究，有关这方面的事实，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明确。

控制波斯湾入口的要港霍尔木兹，自古以来一直是波斯湾航路的重要据点。但这个地名在中国史料上的出现却为时稍晚，一直要到十五世纪初期，当提督郑和（在前面非洲一章中已经提及）率领的明朝强大海军远征印度时，才提及这个地名。这支海军远征南洋共七次，其中第四次（一四一三——一四一五年，永乐十一——十三年）、

* 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第54页，上海，1956年。

第五次（一四一七——一四一九年，永乐十五——十七年）和第六次（一四二一——一四二二年，永乐十九——二十年）共三次，都是以忽鲁谟斯为最终目的地。由此可见霍尔木兹在历史上曾经多么重要。

另外，随军参加这一壮举的费信，在他所著的《星槎胜览》一书上，在记述了十五世纪初期霍尔木兹的风土和居民习俗以后，又叙述了在这个港口进行贸易的商品种类。其中提到五彩的丝绸、各种香料、香辛料，以及和上述商品相并列的青白花瓷器[19]。随文还附有一诗，诗中把青白花瓷器写作青花瓷器[20]。所指当然是白瓷青花，即青釉瓷器。运抵霍尔木兹的青釉瓷器，其数量可能是很大的。虽然没有看到青瓷这个名称，但肯定也会随着运到那里的。

另外是关于希拉夫的情况，它与中国的关系为时更早。早在十二—十三世纪的南宋时代，中国已对它有所介绍。在南宋岳珂著的《桯史》一书（卷十一）中出现的尸罗围[21]和南宋赵汝适所著的《诸蕃志》上卷记载的施那帏[22]，据桑原隲藏氏的考证，两书所记，都是希拉夫的情况，而尸罗围和施那帏，均是希拉夫的音译*。

* 桑原隲藏：《蒲寿庚的事迹》，第141—142页，岩波书店。

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商船在希拉夫的活动，也像希拉夫商人在东方的活动一样，是一直深入到波斯湾的内部港口。而中国陶瓷也可能就是这样被带到那里的。从当时海上贸易的巨大规模来看，其数量必然也相当巨大。

丝绸之路沿途诸城市

现在且把注意力从散扔着中国陶瓷的海岸废墟转向内陆地方，这里也有许多中国陶瓷的出土地。

这样，就先循着从中亚和阿富汗到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东西方贸易道路的干线，自东向西地走一趟吧。

在阿富汗北部向西的交通路线上，经过西部国境附近的要地赫拉特以后，随即就到达与伊朗接壤的国境，越过国境，再前进一程，就到达伊朗东北部的大城市马什哈德（麦什特）。这里既是交通要冲，同时又是伊朗东北部的经济中心之一。城市中央有一个金碧辉煌的清真寺，它的黄金圆顶，闪闪发光，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伊朗的伊斯兰教是属于什叶派的，这里就是什叶派的两大圣地之一。这里并且是个恬静的绿洲城市，中亚的凉风，吹拂着落叶松的叶子，瑟瑟作响。但在那个金碧辉煌的清真寺的四周，因为有来自

四方的巡礼者，所以显得十分繁嚣。这里大商店林立，经营着地毯、谷物、纺织品和宝石之类的买卖。什叶派的圣地戒律很严，所以当然不准异教徒进入清真寺，即连拍摄照片，原则上也是不允许的。在这样的气氛之下，不禁感到异常地紧张。

在这雄伟华丽的清真寺旁，有一个相当出色的博物馆。一进入博物馆，映入眼帘的，尽是伊斯兰时代的形形色色的工艺美术品，其中有一区，陈列着漂亮的中国陶瓷。

这里的中国陶瓷器，真是气势不凡。其中有元朝龙泉窑青瓷大盆，以及明初的天龙寺手和明中期的七官手等龙泉窑青瓷。此外还陈列着明朝至清朝初期的白瓷青花（青釉瓷器）等等。总的说来，这些陶瓷器十分精致，给人的印象很深。特别美丽的是在碗底贴有龙纹的明初青瓷，以及别具特色的、画有鱼藻纹的同时代青釉瓷器。还有十六——十七世纪的、画有灵兽蔓草花纹的青釉瓷器大盘，又有涂满茂盛的西式花草的十七世纪柏叶形大盘，也非常引人注目。

这个创设于一九四三年的博物馆，大概是为了展出驻麦什特的王侯所搜集的、收藏在阿斯坦内·哥兹·拉扎维的东西。也一定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其中展出的中国陶瓷都很精致。由此也可以说明，中国陶瓷是如何地受人重视。

内沙布尔的中国陶瓷

内沙布尔在出土中国陶瓷方面居有重要的地位。以内沙布尔和马什哈德为中心的伊朗东北地方，现在是伊朗的领土，但从历史上看，包括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哈尔夫以及北面的土库曼共和国的马鲁等，都同属一个地区，即历史上的霍腊散地方。

从中亚细亚或阿富汗通过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道路，自古以来就经常通过霍腊散地方，所以这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非常活跃，但是正因为这样，所以常常遭受侵略的战火。例如这里的中心城市内沙布尔，就是多次遭受这种残酷命运的代表性城市之一。

现在我们决定去内沙布尔访问。位于伊朗和阿富汗接壤处附近的马什哈德，是伊斯兰教的圣地，由此往西一百二十公里左右，就是内沙布尔城。在这两地之间，沿途所见只不过七、八个村落，视野所及，几乎全是沙砾的荒野，但北面有一片顶巅积雪的山脉，却显得非常美丽。

我们所到达的这个内沙布尔，真不愧是伊朗东北的要地。大街两侧，排列着形形色色的作坊和店铺，街道的宽度，一如中世纪的情况，在里面静悄悄地做着买卖。除了伊朗人以外，还有土





内沙布尔遗迹的盗掘状况和中国陶瓷片

耳其人，也很引人注目。街上出售着土耳其风味的地毯，在大红的底色上织出了黑色的几何图形。四月的和风，吹拂着这个称得上是绿洲之城的宽广城市。

现在很热闹的这个市区，其实是十四—十五世纪以后的市区，而历史上著名的旧城，位于今市区东南五、六公里之处，已经成为废墟。由于遭到了成吉思汗军队的蹂躏，加上后来的大地震破坏，终至成为这个荒凉的遗迹。

关于这个古城内沙布尔的情况，现在已经

知道，在公元四三〇年的王朝时代已经存在，可能是谢布尔一世或二世[23]所建。七世纪时，当阿拉伯军队占领以后，这里成了霍腊散总督的驻地。到九世纪塔希尔王朝（八二〇—八七二年）和萨法尔王朝（八六七—九〇三年）在这里建立独立政权的年代，内沙布尔成为首都，因而留下了许多美丽的建筑物。后来，到十世纪萨曼王朝（八七四—九九九年）成立时，这里又成为总督的驻地，据当时到过这里的伊本·哈乌克尔[24]等的记载，城市面积达三平方英里，筑有城墙和四座城门。城内分为四十二个区，郊外也有许多房舍，常能听到骆驼商队经过的铃声。

到了一〇三七年，塞尔柱帝国的缔造者特古利尔贝伊占领了内沙布尔，并且定都于此。于是，这里就成为经济和文化的一大中心地，修建了许多宏大的学校和图书馆。据目前所知，仅图书馆就有十三所之多。在中世纪，称得上世界之冠的数学家、诗人兼哲学家的莪默·伽亚姆[25]，即出生于此，并在此完成了他的伟大事业。在他的墓地上建筑了一座清真寺，清真寺的圆顶上，贴着色彩鲜艳的几何图形瓷砖，它们发出闪铄的光芒，显得十分美丽。

可是，自从十二世纪中期以后，如此繁荣的内沙布尔，却屡次遭到敌人的攻击，到了十三世

纪，终于为成吉思汗所蹂躏，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一二二一年）。后来虽然历尽艰辛，勉强恢复，但又因为同一世纪的后半期，一再地遭受大地震的破坏（一二六七年、一二八〇年），一切建筑都成了瓦砾。

因此，延续很久的旧市区终遭废弃。伊斯兰时代的城塞、商场、大清真寺以及贵族的邸宅等，至今都成了遗迹，横卧在旧市区的废墟之上。至于萨桑王朝时代的遗迹究竟如何，更完全不得而知。

因为内沙布尔是如此重要的一个遗迹，所以美国的米特罗波里坦博物馆曾于一九三六、一九三七、一九三九年三次进行了极有意义的发掘调查。调查集中在伊斯兰时代的遗迹上，发掘九世纪到十三世纪的城塞、商场、清真寺、学校、邸宅、商队旅店和窑址等。特别精心细致地调查了九—十世纪的塔希尔王朝和萨曼王朝时代的遗迹，探明内沙布尔当年的许多房屋，它们都是用壁画装饰，窗子嵌有玻璃的。还探究出主要建筑物都装有涂成红色或蓝青色的地板，在公共浴室里有以娴熟的笔法绘画的人物像。更引起人们兴趣的是，当时除了伊斯兰教徒外，还有不少聂斯脱利派的基督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同时又明确了那个时代在内沙布尔使用的陶器和圆顶形窑的性

质，并且一举查清了以图样生动、色彩美丽为特色的伊斯兰初期陶瓷器的实际情况。*

通过米特罗波里坦博物馆的发掘，才知道这个遗迹是伊斯兰时代遗物的宝库，于是，当地的农民就进行连年累月地盗掘。这样一来，从这里发掘出来的遗物，竟充斥了德黑兰的古董市场。当我于一九六四年到达那里时，盗掘仍然十分频繁，市场遗迹上全是洞穴。农民挖掘的洞穴很深，宛如四、五米的深井。当他们找到地板以后，接着就可以检集被弃置的陶器和玻璃器皿。这种盗掘的现象，在我脑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这些由米特罗波里坦博物馆发掘的和农民们所盗掘的遗物中，发现了九世纪唐代到十三世纪宋代的中国陶瓷。

从内沙布尔发掘的中国陶瓷，现在保藏在纽约米特罗波里坦博物馆的仓库里。在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七年，我两次参观了这个博物馆，荣幸地承蒙发掘负责人威尔金森和当时伊朗美术馆的格鲁伯博士（Ernst T. Grube）以及阿纳维氏和詹金斯小姐等人的好意，两次都到仓库里实地

* C.K.威尔金森：《伊朗的考察》，1936年，《内沙布尔的发掘》，米特罗波里坦美术博物馆公报，第三十二卷，第二期，1937年，C.K.威尔金森：《内沙布尔早期概况》，B.M.M.A.第九卷，第二期，1950年。

观察和摄影，此中详情，以后将以出版报告书的形式发表。主要的陶瓷计有下列：邢州白瓷壶的一个碎片，看来是唐代万年壶的残余部分；所谓唐朝长沙窑壶的一截残余上部，是在画有黑褐色和彩绿色大花斑纹及贴附花纹上覆以黄釉的一种（见插图）；晚唐越州窑深形大碗的残余部分，在白底上用篦雕成普通花纹或几何图案，类似德化窑或广东窑的白瓷大盆和盘子的残余部分；外侧用篦深雕成莲花瓣纹装饰的盆的碎片；还有弧状梳痕花纹的青白瓷和青瓷的碎片等。

这中间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收藏，那就是陶制高脚小碗碎片，它与唐代白瓷一样白净，而在纹理细致的素地上，覆以闪光绿釉。在埃及的福斯塔特，也发现了与此完全相同的碎片。无论从器形、釉色和素地各方面来看，都完全是中国式的。实际上，这种绿釉陶器，从来没有在伊斯兰陶器中发现过，据此推测，我认为这是晚唐至宋初的中国绿釉陶器。

此外还有一片朴素的元朝早期青釉瓷器碗的碎片，在我的印象中，这似乎是内沙布尔末期输入的东西。

如上所述，在内沙布尔遗迹的调查中，发掘所得的实际上都是一些碎片，其数量也并不很多，但其种类却一应俱全，有越州窑、长沙窑、

青瓷、白瓷、青白瓷和元代的青釉瓷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有以贴附花纹装饰的长沙窑细颈壶上部和绘有鸟类的盘子残器的出土。后面还将提到，这类长沙窑陶瓷，就连中国本土也极为罕见，却从埃及的福斯塔特遗迹、巴基斯坦的旁浦尔遗迹和东方的爪哇岛出土了不少，这个事实的原因值得深思。对于中国在当时是为了输出而制造的这种想法，也许是可以成立的。

从内沙布尔出土而被保存下来的完整品有好几个，它们是在德黑兰的古董市场上发现的。它们之中被带到日本的，已经知道的就有三件。

第一件是越州窑瓷大碗，无论从它的左右宽宽分开的胴形、从异常宽的高脚、或是从独特的青褐色釉彩来看，毫无疑问地可以肯定是九世纪后期到十世纪前半期即晚唐的制品。它是小山富士夫氏从德黑兰购买的。据德黑兰方面说，这是内沙布尔的出土物。

第二件是长沙窑小盘，这是石黑孝次郎从德黑兰带来的，据传是内沙布尔的出土物。碗底用铁釉绘着平淡无奇的单花纹，碗口边上绘有铁釉的弧形花纹，其上又覆以淡黄釉。坯子是用细密的灰褐色陶土，这与上述内沙布尔遗迹出土的细颈壶的头部和盆的破片同属一类，可以肯定是九一十世纪的遗物。

第三件是小山富士夫氏所收藏的白瓷深罐，它饰有锋利的篦雕镐纹，坯土也是白色的，质地很好，沿罐口外缘的一圈，形状也很整齐。按照小山氏的看法，认为这是宋代广东省西窑的制品。

现在出土的这些陶瓷碎片，说明了中世纪内沙布尔人民爱好中国陶瓷的情况。这种爱好情况，穆罕默德·伊本·巴伊哈基在一〇五九年曾有一段有意义的记载。

“霍腊散总督阿里·伊本·伊萨向哈里发哈隆·阿尔·拉吉德㉘进贡了二十件精美的中国官窑陶瓷和二千件普通的中国陶瓷。在哈里发的宫廷里，这样大量的陶瓷，过去是从未有人进贡过的。”

读到这里，真像亲手接触过这些陶瓷一样，它生动地告诉我们，有如此之多的中国陶瓷被运到了内沙布尔，而且又是多么地受到人们的珍视。这就是阿拔斯王朝全盛时期的情况，在霍腊散中心的内沙布尔，竟运来过如此大量的、而且质量特优的中国陶瓷。

在德黑兰的国立考古博物馆里，陈列着近十件南宋、元、明初等各个时代的龙泉窑青瓷盆和盘子的完器，这些据说明是在霍腊散地方发现的。其中南宋时代绘有镐纹的大盆和篦雕牡丹花

纹的青瓷盆特别精致。第五次国际伊朗美术、考古学会于一九六八年在德黑兰召开时，我曾经借来了这个青瓷盆，一面让听众观看，一面讲述了中国陶瓷与伊朗陶瓷在制作上的类同性问题，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虽然还不清楚这些陶瓷是从霍腊散地区的什么地方发现的，但是，只要它们是在伊朗发现的，那末就可能是在内沙布尔、特乌斯或马什哈德等地方的出土物。

厄尔布尔士山脉南麓诸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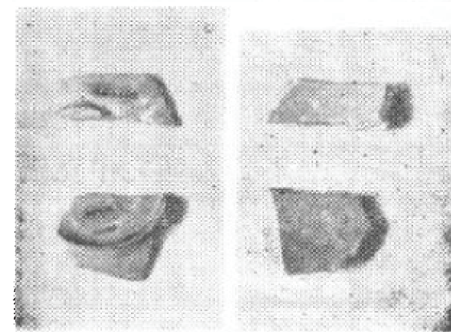
内沙布尔的情况说得稍稍长了一些，现在，让我们赶快走上翻越厄尔布尔士山脉南北麓的商队之路，往西再去探索中国的陶瓷吧。

位于厄尔布尔士山脉南麓的德黑兰，是当今伊朗的首都。在这里建起城市，成为伊朗的中心，已是十八世纪加亚尔王朝（一七七九—一九二三年）以后的事了。在这以前，这一带的繁荣城市，则是南面的、距此十公里左右的雷伊。

因为雷伊自古以来就是东西、南北的交通干线，所以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已经形成了很大的聚落。到了历史时代，米堤亚于公元前七世纪第一个在这高原上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公元前六二五—五五〇年），并在这里修建了都城，因而形成了东西方的要冲。

以后，虽然世事变迁，出现了王朝的兴替，但是这里却在任何时代都依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公元前三世纪兴起的帕提亚帝国在这里建筑都城阿萨西亚。到了萨桑王朝时代和阿拔斯王朝时代，这里也都和以前一样，仍然是一处要地。伊本·哈乌克尔在阿拔斯王朝时代行将结束之时，曾经到过这里，他指出，除了巴格达以外，雷伊是东方最美丽的都市。事实确实如此。





雷伊遗迹和中国陶瓷片

在十一世纪塞尔柱帝国时代，这里也是繁华的都市之一。当时，这里称为拉吉斯，它在东西方名闻远近。

但是一到十三世纪，这里就恶运临头。蒙古军队入侵，成吉思汗的部下恰布，他于一二二一年对此进行了残酷的蹂躏。到了十四世纪后半期，这里又遭到来自中亚的帖木儿帝国军队的最后一次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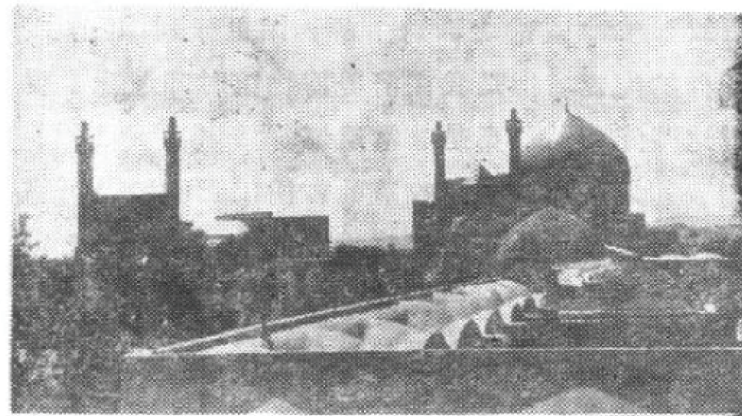
现在，这里的遗迹只留下了一个约摸二十米高的丘阜（遗迹丘），它的最上层是毁于当年的帖木儿军队的巨大城市废墟。丘阜上散扔着房屋的地板、断垣残壁和伊斯兰时代的陶片。

在废墟以西，与废墟相连接的查希马·阿利岩山附近，有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在那里，可以享受一下拾到彩纹陶器破片的乐趣，这是一种在红底或淡黄底上面画着黑线或巧格力色花纹的彩纹陶器破片。

从岩山南下，地有涌泉，清冽的泉水从岩石之间潺潺流出，柳叶似的小鱼，在洋溢着泉水的池面上银鳞翻滚。想不到废墟之中竟还有这么清幽拔俗的环境。雷伊地方之所以能够长期来作为重要的都邑继续存在，是和这种舒适的涌泉密切相关的。在涌泉附近的岩壁上，以古老的方式雕刻着后世加亚尔王朝（一七七九—一九二三年）

帝王的浮雕，这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在一九三四和一九三五两年中，美国的波士顿美术馆和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共同对这个遗迹进行了发掘，结果发现，在许多伊斯兰陶器中混杂着若干中国陶瓷。



伊斯法罕的阿拔斯大帝清真寺

遗迹的发掘报告虽然尚未出版，但承蒙波士顿美术馆的好意，让我在一九六四年观看了雷伊出土的中国陶瓷片．其中有底脚很宽阔的唐代后期的越州窑瓷盆的破片（碗底内侧有线条流畅的草花纹）和元代龙泉窑青瓷的破片。此外，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也收藏着雷伊出土的南宋和元初的龙泉窑青瓷片。

据小山富士夫氏说，在巴黎的济美博物馆有一橱瓷器，收藏着“据传是雷伊出土的菱形花纹的唐代白瓷盘、邢州窑配有铁绘的浮雕蝶形花纹

瓷匣、可能是北宋东窑的河浜形盆和明初青釉瓷器的优质品等。”* 他又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收藏着雷伊出土的青白瓷盆子。** 三杉隆敏氏的著作中也说，在济美博物馆收藏着据传是雷伊出土的“唐代长杯形的白瓷，上面有浮雕的鱼纹”***。总之，这个博物馆里陈列着各式各样的陶瓷，但是我在济美博物馆时却遗漏了观看这些陈列品，真是非常遗憾。

如果济美博物馆收藏的雷伊出土物全是可靠的，那末雷伊除了曾经使用唐代的越州窑瓷以外，还曾使用邢州白瓷的盘子、匣子和杯子等，这说明中国陶瓷在九世纪以前已经运到了伊朗中部，这是令人极感兴趣的。

宋代的青瓷、青白瓷和明初的青釉瓷器受到中东人们的喜爱，如上所述，是十分明显的。则中东地区对中国陶瓷的巨大需要量，也就愈益清楚了。

现在看看雷伊周围的情况。从雷伊出发往西南行一百五十公里左右，有一个萨韦城，这里也

---

* 小山富士夫：《济美博物馆的元代琉璃釉白龙纹梅瓶》，载《大和文华》第39期，第28页。

** 小山富士夫：《美国杂感之二》，东京博物馆通讯，第126期。

*** 三杉隆敏：《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创元社，昭和43年。

发现了明代的青釉瓷器破片。这是我们一行人于一九六四年去萨韦南部中世纪伊斯兰陶窑旧址和著名的马斯吉德·贾姆清真寺时的收获。

自从十二世纪以来，萨韦不仅是一个著名的地方都市，而且还以优质陶土烧制的优美伊斯兰陶器产地而闻名。所以，这里即使有中国陶器运来，事情也并不奇怪。

对中国的陶瓷进行追索，这是没有止境的。在伊朗高原中部的美丽旧都伊斯法罕，也收藏着精致的中国陶瓷。

伊斯法罕是光荣的近世伊朗帝国萨法维王朝（一五〇二——一七三六年）的首都，以谢·阿拔斯大王时代（一五八七——一六二九年）为中心，相继建造了壮丽的宫殿和寺院。由各种色彩的阿拉伯图案装饰的清真寺圆顶和墙壁，其瑰丽是难以用文字和语言形容的。“没有看到过伊斯法罕，就不要谈论伊朗”。这一句旅游指南中的话，似乎并不夸大。

在萨法维王朝时代，这个王朝的财富和权力，曾被喻为：“伊斯法罕顶半个世界。”而这里的所有宫殿和寺院，正是在这种背景中建造起来的。现在残存的旧宫殿之一查希尔斯顿宫殿（四十四柱宫殿）里，发现了中国明代的青釉瓷器和青瓷的优质品，根据三杉隆敏氏的调查，共

有四十二件。*

从前，这里是一个小博物馆，所以其中的一部分是经常陈列着的。这中间，波斯式形状的青釉瓷器水注、扁壶以及随笔绘画出欣欣向荣的莲花瓣的青釉瓷器大盘等，在参观时都令人留连忘返。

这些都是谢·阿拔斯的搜集品，它们原来被供奉在后面将要提到的伊朗西北部的阿尔德比勒灵庙里。在现今的王朝又迁都回德黑兰以后，其中一部分据说再度移到伊斯法罕，重返故里。

阿拔斯大王从中国明朝招来了三百名陶工，要他们制作模仿中国的青釉陶瓷器。这个不愧为艺术之国的波斯，阿拔斯大王的收藏，如实地反映了他的鉴赏能力是多么高明。

现在我们暂且离开厄尔布尔士山脉南麓地带，去到波斯湾北侧的札格罗斯山脉北麓，寻访一下中国陶瓷，在那里也发现了好几处出土中国陶瓷的遗迹。

第一处是靠近伊朗西南设拉子城的加斯里·阿布·纳斯尔，它是以中世纪的大诗人萨迪和法菲兹的故乡而出名的[27]。第二处是设拉子以南的菲鲁兹阿巴德。第三处是埃拉姆地方的古都苏

* 三杉隆敏：《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第152页。

萨。

加斯里·阿布·纳斯尔是米特罗波里坦博物馆所调查过的遗迹，看了前面伊朗美术馆的格鲁伯氏赠送的照片，这里出土的六世纪中国陶瓷，似乎都属于宋元时代的青瓷和白瓷两种。第二处菲鲁兹阿巴德，按设拉子亚洲研究所的扎格拉克氏的见闻记录，那里散扔着不少宋元和明初的各种陶瓷片。第三处苏萨的陶瓷片，是法国考古队发掘该遗迹时所发现的，据科克林氏所说，是在素坯上用铁绘画上花草纹的陶片，*他认为这是唯一的一片唐代陶瓷。但是恐怕很难作出这样的判断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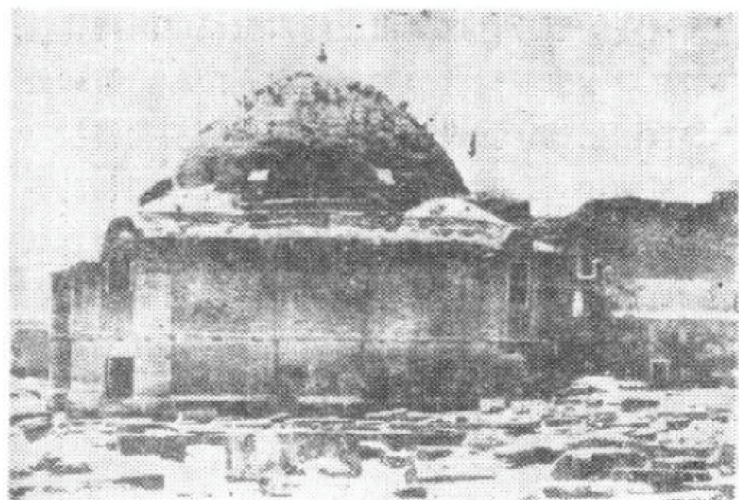
阿尔德比勒的陶瓷

关于伊朗，已经讲得相当多了。因此，现在打算探索一下厄尔布尔士山脉和札格罗斯山脉汇集而形成的重叠山区，即伊朗的西北部和中国陶瓷的关系，以便结束中国陶瓷在伊朗的情况。

伊朗西北部，是一片草原、山地、溪谷和湖泊等纵横交错的高原地带。经过北部的阿塞拜疆地方[28]就是高加索，翻越西北的札格罗斯山脉就能到达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正是由于这

* R·科克林，《苏萨博物馆的伊斯兰陶瓷》，叙利亚，1928年。

样的地理条件，所以自古以来移入了各种各样的民族和不断地更换统治者，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创造了独特的文化。



阿尔德比勒的灵庙
（采自波普氏的著作）

这中间包括公元前一千年前后，在这里北部发展起来的乌拉尔图青铜器文化，札格罗斯山中的勒利斯坦的动物图案文化，在里海西南山区地带发现的阿姆拉希初期金属文化等。当时的工艺以动物图案为主，都有令人惊异的新奇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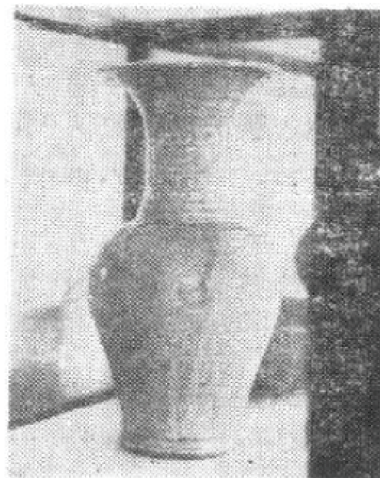
在伊朗西北部的一个大湖乌米亚湖（雷扎耶湖）以南，有一个叫做塔克梯·苏来曼的部落。这里虽然是个非常崎岖的山谷地方，但是因为有一处从帕提亚时代到萨桑时代的遗迹，所以德国中东考古研究所的努曼博士一行，进行了连年的发

掘，这个部落的重要性，似乎还超越伊朗时代。

在一九六八年的德黑兰第五次国际伊朗美术、考古学会议中，努曼氏在报告中指出，从这个遗迹中出土了中国的、外侧有镐纹的青瓷片，大概是南宋到元朝的青瓷。如果这样，则中国青瓷在当时竟已运到了伊朗西北部的这个边境地带。其渗透程度之深广，真是令人咋舌。

更令人惊异的是，在与苏联接壤的国境附近的阿尔德比勒灵庙中，也收藏着无数的中国陶瓷名器。

阿尔德比勒是伫立在伊朗西北部高原上的一个小城市，从阿塞拜疆的首邑大不里士向里海沿岸的边境城市阿斯塔腊的路线上东行，在接近里





阿尔德比勒的青瓷（上）和青釉瓷器（下）

海的途中，就能看到这个阿尔德比勒城。这是一条穿行在高原、山地、溪谷之间的崎岖山路，但是到阿尔德比勒，高原从此结束，从这里开始，是直下里海沿岸的十分曲折的坡道。

这个城市始于萨桑王朝时代，在倭马亚时代，曾作过阿塞拜疆的首邑，而且也是伊朗在近世建立起强大的波斯人国家的萨法维王朝的祖先——希克·伊斯哈克·萨菲·爱德丁（简称希克·萨菲，？—一三三四年）诞生的圣地。

好像是为了显耀这种由来似的，在这个城市的广场上，有希克·萨菲的灵庙，以他的陵墓为中心，兴建了一座堂皇的清真寺。

萨法维王朝（一五〇二—一七三六年）结束以后，这个灵庙就作为祖先的灵地而受到尊崇，尤其是在著名的阿拔斯大王（一五八七—一六二九年）时代，不仅大大地加以扩建，而且还捐献了一千一百六十余件当时最受珍重的中国陶瓷，收藏在建于清真寺一隅的中国陶瓷搜集室之中。

经过了大约三百年以后，阿尔德比勒的声誉，也和希克·萨菲的灵庙里所收藏的精致中国陶瓷一样，广泛地为世人所熟知，因而成了许多外国游客的来访之地。但是需要担忧的是，这个地方接近俄罗斯的国境，这里的收藏有遭到侵略

或掠夺的危险。为了防止这种危险于未然，同时又由于灵庙位于这样的偏僻之地，为了使收藏的珍品免致丢失，所以到了今王朝以后，除了数百件破损特甚的以外，其余的都转移到了德黑兰的考古博物馆里，特地为它们开辟了专室。

这的确是个妥善的措施，不仅确保了各种珍品的安全，而且还让人们可以在德黑兰欣赏它们，不必像以前那样地要赶到边境地区的阿尔德比勒去了。

阿尔德比勒灵庙的中国陶瓷，毕竟是阿拔斯大王的收藏物，所以极其精湛。只要看看陈列在德黑兰考古博物馆专室内的东西，也会使你流连忘返。这些陈列品的年代从南宋开始，经元朝到明朝前期为止，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谢·阿拔斯的捐献是在一六一一年。

这些陶瓷器的种类计有：元代的龙泉窑青瓷，南方白瓷，元代的枢府窑和蓝釉瓷，贵重的元代青釉瓷器和明初青釉瓷器，以及元代、明初的脱白青釉瓷器、古赤绘（五彩）直至金襕手等。器皿的形状计有：水注、梅瓶、大壶、小壶、扁壶、大碗、大盘等等，种类非常繁多。尤其是胴部透珑镂刻的金襕手水注和两耳成角形的高壶，以及瓢形水注和号称御用的、瓶口呈乳房形的水注等等。其形状真是千奇百怪，别出心裁。

大件的元代青釉瓷器珍品在这里陈列的达三十七件，件件都十分珍贵，真是无价之宝。

总之，这里的陶瓷器名符其实的是阿拔斯大王的收藏，形状堂皇，姿态端正，颜色与花纹也很绚丽，的确价值连城，真不愧为王者搜集的典范。其中有些花样是中东以外所罕见的，在这方面可与托普卡普萨拉伊博物馆的收藏媲美，但在质量方面，阿尔德比勒似乎更高出一筹。这里也有在伊斯坦布尔那一章中作为问题讨论过的、即那种在碗底贴花纹的大碗。不过那种在福建省、广东省附近的窑里烧制的、专供外销的粗制盘碗之类，却一件不见。

但遗憾的是，虽然是如此精致的珍藏品，却不知是什么缘故，其中的许多件，都带有缺口或明显的擦损等瑕疵。从这些破损的情况来看，这些陶瓷器中已经被使用过的，可能为数不少。

这里所收藏的印章也颇饶兴趣。许多印章是用阿拉伯文把阿拔斯的名字连缀成纤细的小点，一小点一小点地雕刻在上面，文字精巧地组合成方形，宛如印章的形状。其中也有一些大概是作为装饰品使用的。

每一件展品，现在都价值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元，这也说明了，这些展品是值得一看的。

在这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展品真是气象万

千，从十三世纪到十五世纪，输入到这里的中国陶瓷，竟是如此的丰富多采！

关于阿尔德比勒灵庙里的中国陶瓷，宜参阅华盛顿菲利亚美术馆的波普先生所著、于一九五六年在华盛顿出版的《在阿尔德比勒灵庙中的中国陶瓷》一书中的卓越研究。

此外，在大不里士的阿塞拜疆博物馆中，也陈列着伊朗西北部出土的中国陶瓷，包括青釉瓷器、白瓷、赤绘、青瓷以及釉里红等，其中以元末和明初的青釉瓷器大盘、梅瓶、大碗等特别显眼。

这些想必是收藏在阿塞拜疆的清真寺或豪族邸宅里的东西，如果情况确实这样，那末，今后也还会陆续有所发现，让我们愉快地等待着吧。

另外据说，与伊朗的阿塞拜疆接壤的苏联的阿塞拜疆地方，在那里的许多遗迹中，诸如卡巴顿、阿兰、卡拉、古格养希城、巴库等，也出土了精美的中国陶瓷。其中据说还出土了统称为马尔塔本的浅绿色瓷器，这可能是明代的龙泉窑青瓷。这些遗迹是根据发表在中国发行的《历史研究》（一九五八年第二期）中寇瑟氏所著《中世纪阿塞拜疆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的中文译本。遗憾的是，根据那篇文章，只知道滨临里海的巴库一地，至于其他那些遗迹的具体地点，却

就不得而知了。

总而言之，在高加索山脉以南的苏联阿塞拜疆各遗迹中发现中国明代青瓷这个事实，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还有，在永贵《回疆志》卷四及椿园七十一《西域见闻录》卷三的哈萨克这一条中，都清楚地记载着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清朝的瓷器大量输入中亚诸国的情况。在佐口透氏所著的《俄罗斯与亚细亚草原》（昭和四十一年，吉川弘文馆出版）一书中，也有不少地方涉及到这类记载。

译注

① 居鲁士（Kyros，在位公元前559—529），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开国皇帝。——译者

② 大流士（Darius，在位公元前522？—486），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名君，曾确立中央政权，远征印度，扩大版图，是王朝的全盛时期。——译者

③ 珀塞波利斯（Persepolis），大流士创建的阿契美尼德王朝首都，在今伊朗西南部法尔斯省境内，于公元前三三一年为亚历山大大帝所毁灭，今遗迹仍存。——译者

④ 阿胡拉·马兹达（Abura Mazda），古代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最高神，是一切善良、正义、慈悲、光明的泉源，而阿里蒙（Ormazd）则是一切黑暗、邪恶、虚伪的源泉。——译者

⑤ 萨桑王朝（Sassanidae），为波斯阿尔达希一世（Ardashir Ⅰ）所建立，以他的祖先萨桑（Sassan）

而得名，从二二六年建立起，到六五一年为阿拉伯人倾覆止，长达四百余年。——译者

⑥ 正仓院，日本奈良东大寺大佛殿西北的木造大仓库，库内收藏圣武天皇（七二四—七四九年）的御用遗物和东大寺文物等公元七、八世纪的东方珍贵文物共九千余件。——译者

⑦ 细密画（Miniature），也称袖珍画，特别是指绘制在象牙、陶器之类上的小型图画。——译者

⑧ 米提亚帝国（Media），米堤亚人于公元前七世纪在伊朗建立的国家，到公元前五五〇年为波斯帝国所并吞。——译者

⑨ 帕提亚帝国（Parthia），即我国史籍上所称的安息，领土占有今伊朗高原全部和两河流域。——译者

⑩ 霍腊散（Khurasan），即我国史籍上所称的呼罗珊，其范围包括伊朗东北部，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地区。——译者

⑪ 巴列维王朝（Pahlavi）由礼萨·汗·巴列维于一九二五年建立，一九四一年，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任。一九七九年，伊朗发生革命，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巴列维王朝已经结束。——译者

⑫ 安闲天皇，日本第二十七代天皇，在位于公元五世纪初，约当中国东晋末叶。——译者

⑬ 冲岛，在日本有两处，一处在近畿琵琶湖南岸，属滋贺县；另一处在九洲、四国间的丰后水道东南部，属高知县。本书所指不详。——译者

⑭ 仁德天皇，日本第十六代天皇，在位于公元三世纪中叶以后，约当中国三国时代。——译者

⑮ 波斯蓝（Persian blue），一种较通常深蓝色稍浅而略带微红的浅蓝色。——译者

⑯ 沙特阿拉伯河（Shatt—al—Arab R.），指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汇合以后，从巴士拉到河口的一段。——译者

⑰ 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参阅一九七九年版《辞海》下卷第三三八五页。

——译者

⑱ 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中有关这一段记载的原文是："如印度好多地方以及波斯湾沿岸巴斯拉（Basra）、乌孛拉（Ubolla）、喜拉（Hira）、吉许（Kish）、西拉夫（Siraf）等地，都有龙泉青瓷碎片发现"。 ——译者

⑲ 《星槎胜览》（冯承钧校注本）前集，忽鲁谟斯国："货用金银、青白花瓷器、五色段绢、木香、金银香、檀香、胡椒之属"。

⑳ 《星槎胜览》（冯承钧校注本）前集，忽鲁谟斯国下所附诗："忽鲁谟斯国，边城旁海居，盐山高崒嵂，酋长富盈余，原隰唯收麦，牛羊总食鱼，女缠珠珞索，男坐翠氍毹，玛瑙珊瑚广，龙涎宝石珠，蛮邦成绝域，历览壮怀舒"。故诗中并无"青花瓷器"字样。但《纪录汇编》本《星槎胜览》忽鲁谟斯国有"货用金银、青花瓷器……"之文，不知作者所据何本。

——译者

㉑ 《桯史》（《津逮秘书》本）卷十一，番禺海獠："亦有舶獠曰尸罗围"。 ——译者

㉒ 《诸蕃志》（《学津讨原》本）卷上，大食国："有番商曰，施那帏，大食人也，跰寓泉南，轻财乐施"。 ——译者

㉓ 谢布尔一世（Shapur Ⅰ，在位241—272），萨桑王朝的第二代皇帝，王朝的重要奠基人；谢布尔二世（Snapur Ⅱ，在位309—379），萨桑王朝的第十代皇帝。 ——译者

㉔ 伊本·哈乌克尔（Ibn Hauqal），公元十世纪前后阿拔斯王朝的地理学家，曾遍游伊斯兰世界及西班牙、印度等地，著作有《道程和各国记》等。

——译者

㉕ 莪默·伽亚谟（Umar Khayyām，约1038—

约1123），波斯的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和诗人，四行诗集《鲁拜集》（Rubaiyat）是他的名著。

——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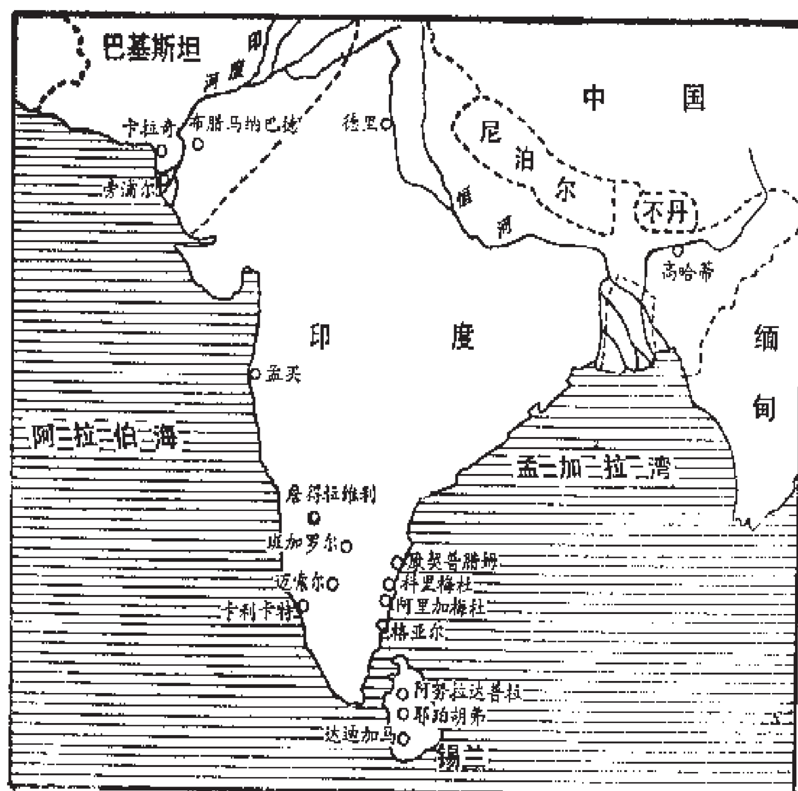
㉖ 哈隆·阿尔·拉吉德（Harun Al—Rashid，在位786—809），阿拔斯王朝的第五代哈里发，其在位当王朝势力的极盛时期，宫廷收藏丰富，一度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科学与艺术中心。 ——译者

㉗ 均为伊朗中世纪的著名诗人，而萨迪（Musharrif-ud-Din Saddi，1184—1291）尤负盛名，他的名著有《果树园》、《蔷薇园》等，长寿达一百零七岁。

——译者

㉘ 指伊朗西北部的阿塞拜疆地方，分东、西阿塞拜疆二省，并非苏联的阿塞拜疆共和国。

——译者



＊原著绘制此图时，尚无孟加拉国；锡兰尚未改名斯里兰卡。

七　印度河河口的废港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交通与文明的十字路口

阿富汗没有出海口，而且多山。它的北半部是终年积雪的兴都库什山，深深的溪谷，纵横地蜿蜒其间，闪耀着五颜六色的岩石，与水面相掩映，极为美观。它的南半部则到处是连绵的沙漠和草原。沟通东西方世界和南北地区的贸易道路，就四通八达地穿越着这个起伏剧烈的地区。

这条通过阿富汗的贸易道路，是从何方来，而又是去向哪里的呢？这条道路从伊朗东部穿越国境进入阿富汗以后，又分为两条，一条通过阿富汗北部，再往东北去中亚细亚；一条从东南通向巴基斯坦。前一条通向中亚细亚的道路可穿越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山麓到达中国；后一条，即通过苏来曼山脉到达巴基斯坦的道路，可直达南亚的宝库——印度。另外，如果从伊朗往东南，也可到达阿富汗南部，接着可以穿过沿阿拉伯海的俾路支斯坦而到达印度河下游地带。

与上述方向相反，从中国或印度方面到西方伊朗或地中海沿岸去的旅行者，多数是先进入阿富汗，然后继续去到西方。

阿富汗这个地区，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着内陆国家的苦衷。但在过去，这里却是沟通东西贸易的道路，是骆驼商队熙熙攘攘和物资通畅的地方。而且还因此而出现了别具特色的文化。有人把古代和中世纪的阿富汗称为“文明的十字路口”，理由就在这里。从中国到印度的人，例如前去寻求佛法的僧侣，像四世纪的法显或七世纪的玄奘三藏等，都是通过阿富汗进入天竺的。

许多考古学方面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情况，即中国的各种物资，很早就是经过这里而运往南方或西方的。在首都喀布尔以北，有一个叫做帕格曼的遗迹，这里是二世纪克兴王朝时代的夏季离宫遗址，也是与犍陀罗艺术①和大乘佛教之类有密切关系的迦腻色迦王（一四四年左右——七三年左右）等的避暑胜地。从这王宫的宝库中发现了许多称得上是当时印度工艺的精华——精巧的印度象牙工艺品，品质优良而豪华的罗马玻璃器皿和青铜像，还发现了有中国汉代的漆器混杂其间。顺便提及，在克兴王朝时代的都市遗迹之旁，即巴基斯坦的塔克希拉，同样也出土了中国汉朝时代的玉制佩刀之类。

因为汉朝以后，中国与中亚细亚的往来逐年增加，所以可以断言，许多中国产品，也已运到了这个地区。中世纪以后的中国陶瓷，可以肯定已在这个地区的王族和豪富邸宅内广泛使用。遗憾的是，还没有正式的论文作这方面的报导。

在此且举一、二个证明这个地方与中国陶瓷有关的事实。其一是谢利·戈尔戈拉废址，其二是首都喀布尔的见闻。

谢利·戈尔戈拉是一个奇妙的遗址，它位于阿富汗中部兴都库什山脉之间的巴米安盆地上。

提到巴米安，人人都会马上联想到雕凿在盆地北侧断崖上的无数石窟寺院，以及耸立在这寺院群东西两旁的巨大的大佛立像。贯穿岩壁而凿成的大佛，西边的一尊高五十三米，东边的一尊高三十五米，对于如此出乎意料的高度，人们不禁叹为观止。以我的身材高度，还不及大佛衣襟的下摆。大佛的脸部，由于遭到后来征服该地的伊斯兰教徒的破坏，所以显得很凄惨，可是留在顶棚上的依稀可辨的佛像、菩萨和太阳神的壁画，却比法隆寺②的为时更早。善男信女们感染于这里的完美境界，发出了不绝的赞叹之声。

处身于这样的环境里，要想到更为遥远的地方去继续旅行和访问的心愿就会油然而生。《大唐西域记》的作者唐僧玄奘，在跋涉四方以后，

也来此朝拜这尊大佛。按照他的记载，大佛在当时是装金的，佛身闪耀着灿烂的光芒[3]。

以这尊大佛和石窟寺院闻名于世的巴米安盆地，在山岳重叠的兴都库什山中显得特别广阔，盆地中央，有微微隆起的圆锥形小山岗。山岗的所有斜面全都为倒坍的废屋所覆盖，山岗顶上的清真寺，颤颤巍巍地残留着它的圆顶尖塔。走上环山的小道，发现了在废墟中散扔着的波斯陶器破片，间或有小片白骨混杂其中。说得过分一点，这里是阴气逼人，响导之所以不愿来此，大概也是因为这种不吉利的东西吧。

事情是有它的原委的。这个遗迹本是巴米安王的都城，它在一二二一——一二二二年遭到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的彻底破坏，连一只小猫都未曾幸存。当时的巴米安国甚为富裕，兵力也强大，所以巴米安王竭力抵抗来犯的蒙古军队，成吉思汗的孙子即是在此被击殒命的。成吉思汗得此消息后大为震怒，亲自率领军队，对巴米安王都进行了屠城，使这里成为一个谢利·戈尔戈拉，意思就是鬼魅之城。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直到今天，也还使人心有余悸。

我于一九五六年五月，曾在废屋的地板上捡到了散扔着的波斯陶器。这中间，有用阿拉伯式图案的美丽绿彩刻线花纹装饰的漂亮陶片，但遗

憾的是没有能够找到中国陶瓷。后来，在六十年代初期，访问过这个遗迹的菊池三郎氏，在他所搜集的陶片中，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碎片，但却是一个青瓷片，它是十二—十三世纪时的龙泉窑青瓷片。阿富汗也有青瓷的存在，这是使我引以为慰的。

记得当我访问阿富汗时，从这个国家有权威的考古学家科柴德氏处获悉，在巴米安附近，同样也是被成吉思汗毁灭的谢利·卓哈克废城中，也有中国陶瓷的出土，却不知道它的品种和年代，当时我是参差半信的，但既然从谢利·戈尔戈拉出土了青瓷，则谢利·卓哈克出土的中国陶瓷，也就可以理解了。

现在，我又想起了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主要大街上的一家商店。

喀布尔的大街多穿插着狭窄而曲折的小巷，两侧排列着泥墙厚实的两层楼房子，其中行人稀少，踯躅街头，真是形影相吊。在比较热闹的地方，职工们在面向街道的小房子里，边工作边看闲。这样的城市，使人感到强烈的中世纪风味。但在沿喀布尔河的一个区域中，却有现代化的街道，可以欣赏陈列着外国制造的高档商品的橱窗。

在这条街道的拐角处，有一家大的地毯商

店，进店一看，在以红色为主的豪华的阿富汗地毯后面，陈列着几只十四—十五世纪，即明代初期的青瓷大盘子。这是一种带枯叶色的深色青绿盘子，在高脚的反面，用小点连缀而成的阿拉伯文雕刻着持有人的姓名。它与收藏在伊朗阿尔德比勒的中国陶瓷上的雕刻，属于同一类型的印章式文字。阿富汗的持有者也把自己的姓名雕在上面，可见中国陶瓷是多么受人重视。这家商店里的青瓷大盘，想来总是喀布尔或其附近的清真寺和豪富人家的东西吧。由此推测，则十四—十五世纪的青瓷，也已运来这里，大概不致有讹。

当时，我因为还要继续漫长的旅行，对于这些青瓷盘，即使十分喜爱，却也难以购买，左思右想，计无所出，最后还是由住在喀布尔的斋藤积年氏买了下来。至今事隔十三年，这些青瓷盘应该已在日本平安地落户了吧，我真想再次看看它们。

在阿富汗，也许还有不少遗迹，秘藏着大量中国陶瓷，我衷心祝愿它们，能早日重见天日。

从阿富汗去巴基斯坦

清晨驱车离开喀布尔，翻越拉塔本德山口，从此驱车下高原，不久就到达萨鲁比坝，水流从狭小的的萨鲁比溪谷奔流而下，终于汇成了喀布

尔河，其景观实在值得欣赏。从岩崖上的道路上眺望冲击着岩石的激流，竟会使人忘却时间，忘却危险。不久就进入低地，河流和田野的景色都骤然宁静，河谷宽广，绿茵遍野。这地区有一个哈达遗迹，它以发现了许多魅人的塑造佛像而闻名于世。不过哈达离公路很远，必须从贾拉勒阿巴特南行，才能到达那里。这个国境要城贾拉勒阿巴特的夏季，其酷暑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竟被人们喻为与死人为邻的城市。这话虽然有些言之过甚，但一般总是风影全无，无疑是个酷热的地方。其附近的哈达，情况大概也是一样，在夏季是难以居住的吧。

通过广阔的贾勒拉阿巴特盆地略向前行，是一条上坡路，不久就到达开伯尔山口，这是一个历史上著名的山口。在古代，当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前后，从中亚细亚迁移到印度河流域的印度雅利安人，公元前四世纪末的东方远征者亚历山大，以及在现代十九世纪中期阿富汗战争中侵入这个地区的英国军队等，都是通过这个山口的。山口顶巅的西侧是阿富汗，东侧是巴基斯坦大平原。

巴基斯坦的中国陶瓷

巴基斯坦，这个国家的土地在过去原和印度

共和国构成一体，一九四七年与印度分开以后，建立了伊斯兰教国家。东、西两个巴基斯坦之间，相隔甚为遥远④。由于印度河的灌溉，土地肥沃，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之一（印度河文明）。

提到巴基斯坦，首先就会联想到它的一般概况。总的说来，在它的南部，有面临阿拉伯海的干燥的卡拉奇地区，在北部，则有历史上显露过头角的、草原性的白沙瓦—塔克西拉地区和喀拉昆仑山环抱的吉尔吉特等好几个中心。这是一个在地理上和历史上都变化多端的南北狭长的国家。

它是从南亚去往西亚的通道，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从公元前三千年的印度河文明时代开始，南亚地区的各种物资即以这里为中转基地，然后一直运往西方，例如棉布、宝石、香辛料等等。中世纪以后，又加上了中国的陶瓷。

面临阿拉伯海的卡拉奇，是巴基斯坦的南大门。这个港口虽然为不毛之地的沙漠所环绕，可是远渡印度洋的物资，却从东西两方汇集于此，然后再转运到内陆地区或波斯湾的各个港口。

卡拉奇是近代才繁荣起来的。在中世纪时代，起过作用的是旁浦尔废港，它同样面临阿拉伯海，离卡拉奇不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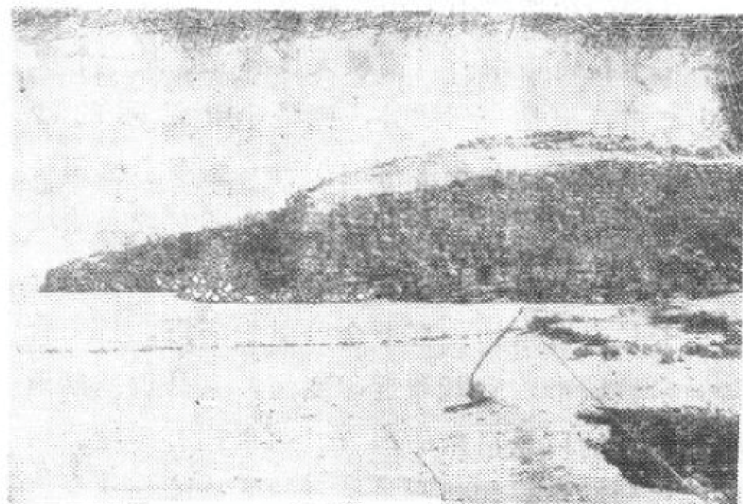
〔旁浦尔遗迹中的中国陶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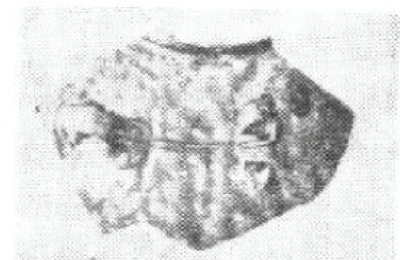
在卡拉奇市中心，高楼大厦林立，是一个现代化都市，但是一到郊外，则是一望无际的沙土，土地荒芜，疏疏落落地长着一些灌木丛和矮草之类。村庄栉比，在一定间距中还有较大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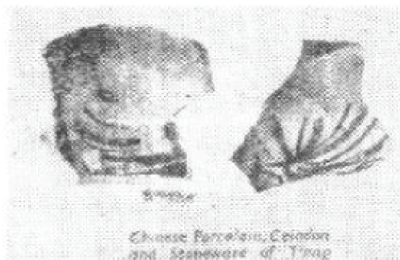
卡拉奇以东约一百十余公里的塔塔，是个有名的宗教城市，它既靠近印度河，又是巴基斯坦南部少见的风景清幽的地方。这里还有印度、阿富汗式的清真寺和伊斯兰圣者的豪华陵庙之类，因而有很多的巡礼者。

在连接这个都市的卡拉奇——塔塔公路的中途，其南面有旁浦尔的都市遗迹。相去虽不远，但离开卡拉奇却也有六十四公里路程。其所以不觉得远，也许是因为用大陆的标准来衡量这种距离吧。

站在遗迹中央稍稍隆起的小丘上眺望四周，其南面有一个沟通阿拉伯海的加洛小港湾，越过这个小港湾对面的湿地，蓝色的阿拉伯海在遥远处隐约可见。在这样一个没有人烟的废墟中，使人感到，历史的变化是何等剧烈。而仰望穹苍，又常常觉得人生的空虚。废墟的中央部分略形隆起，这是因为长期以来这一部分曾经多次重建的缘故。







本博雷遗迹和出土的中国陶瓷片

在公元前后的克兴王朝时代，这个城市作为濒阿拉伯海的海港而繁荣起来，在发掘中央部分的小丘时，发现克兴时代的文化层很厚，这是参加发掘的人众所共见的。

八世纪初期，这里被东征的伊斯兰军队所占领，作为他们的据点。根据记载，在公元七一四年，伊斯兰教徒穆罕默德·宾·贾西姆夺取了印

度河河口的重要海港德巴尔，于是，这里就沦为伊斯兰统治下的城市。其废墟正是说明了这个经过。

到了萨拉逊帝国时代，随着波斯湾和印度洋贸易的发达，这个港口控制了阿拉伯海的入口，因而就成为商业上的重要都市。

前面提及的这个废墟的中央小丘，它是由石头城墙严密加固的。城墙上有向外建筑的连续雉堞，城墙内残留着许多清真寺和其他大小建筑物遗迹。城墙四周的城门是正方形的，防御工程甚为坚固，面向海口的城门能直通船舶停泊的码头。

市街为城墙所围绕，停泊船只的海湾，一直伸入市街近旁。面向街道的一区有染坊的遗址，排列着许多染缸。这就说明，输往东西方的特产棉织品，是在这里加工染色的。往来于南方海上的阿拉伯船员们，大概总是在这个港口卸货，然后到市区热闹场所稍事游乐，又随即装载新的商品，启碇往东方或西方而去。一个如此繁荣的都市，却在十三世纪以后迅速地衰落，这也许是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可能是印度河河口位置发生了变迁的缘故。

巴基斯坦是个伊斯兰教国家，正因为此，所以在萨拉逊帝国时代，像上述遗迹是具有重要作

用的，它在当时必然受到很大的重视。巴基斯坦独立以后，随着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蓬勃发展，一九五八年以来，就开始了对旁浦尔遗迹的发掘调查。发掘工作是由以亨博士为首的巴基斯坦考古局的学者们所承担的*。

发掘的结果明确了都市的规模和历史陈迹，以及当时的经济活动等情况。能够说明这些情况的出土物中，正如作者所意料的，发现了一批中国陶瓷。

从这里出土的一批中国陶瓷，令人极感兴趣。首先是晚唐的越州窑瓷水注。这说明在九世纪时，中国陶瓷就早已运到这个地区了。

更为珍奇的是，这里还发现了同时期湖南省烧制的大碗破片（见插图下方）。这是一种黄褐釉瓷，而在上面绘着绿色花朵。在产地中国，长沙窑是很不受重视的一种陶瓷**，但在中国以外的印度尼西亚以及遥远的埃及和伊朗却发现了它们。现在从旁浦尔又发现了这种陶瓷的出土，这就说明，在九世纪时代，有一条把印度尼西亚和伊朗相连接的陶瓷之路，这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发

* F.A.亨：《旁浦尔近代考古发掘的初步报告》，考古局，修订本，1963年。

** 《长沙瓦渣坪唐代窑址调查记》，载《文物》，1960年第三期；《中国二千年之美》展览会目录，1965年。

现。而且由此不难推测，长沙窑的颜色和图案之所以和一般的中国陶瓷不同，正是因为它是用来外销的商品。

其次是十一十三世纪的宋代陶瓷，在这里也毫不例外地有所发现。不仅数量很多，而且种类也不少。此外还发现了宋代初期线雕花纹的越州窑瓷破片，又有清晰地浮凸着雕有莲花瓣的华南白瓷片，以及宋末元初的龙泉窑青瓷片。这类瓷器在中东的任何一个遗迹中都有出土，所以十分普遍。并且又发现了可以肯定是广东省方面烧制的饴釉四耳罐的破片之类，我曾在红海沿岸的阿伊扎布遗迹中发现与此同类的陶瓷，所以对此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之感。

这些出土的文物，现在陈列在卡拉奇国立博物馆和旁浦尔遗迹博物馆之中，这些似乎无用的陶瓷碎片，实际上向我们说明了，自从九世纪起直到这个都市消亡为止，这里曾陆续不断地有中国陶瓷的输入。并且可以设想，中国陶瓷在运抵这个靠近印度河河口的港口的旅程中，必然发生过种种颠顿曲折。如今每一张稍有损伤的陶瓷片上，像记录卡那样地刻划着这种颠顿的经历，使人无限感慨。

运抵旁浦尔的东亚商品，接着还要溯印度河而上，运到内陆地区，或是沿海运送，到阿拉伯

海岸的各处地方。

〔布腊马纳巴德〕

我们已经知道旁浦尔是靠近印度河河口的，而印度河则是巴基斯坦的生命。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印度河文明，曾是以这条河流为中心而孕育出来的，而这条河流此后又世世代代地为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不可数计的人民提供赖以为生的水源。它同时又是沟通印度西部内陆与阿拉伯海的一条宽广的通道。

循着印度河，从河口溯流而上，在下游信德省的一隅是纳瓦布舍赫县，这里有个布腊马纳巴德都市遗迹。它位于信德省政府官署所在地海得拉巴东北约八十公里的地方，是个真正的边境地区。它过去在印度河的旧河道沿岸，从七世纪到十一世纪，这里作为印度河的商业中心而获得繁荣，但是由于一〇二〇年发生的一次大地震，这个都市遭到彻底的毁灭。据说地震以后只残存了一个小小的村落。根据这样的情况，那末，从这个都市遗迹中出土的文物，当然是十一世纪前半期的东西。

由于这个遗迹具有如此特殊的性质，所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早在上个世纪的一八五四年，就已由贝拉西斯氏和理查森氏作了调查，从这里发现的许多陶瓷片，后来被送到大英博物馆，经

过当时中国陶瓷的所谓最高权威霍布逊氏的鉴定，发现其中有中国的青瓷、白瓷和褐釉陶瓷的破片，曾为当时的学术界提供了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

对于这些陶瓷片，霍布逊氏从其器形、釉彩和质地等方面分成六种类型*，但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其分类方法还是颇可商榷的。看了他刊载在论文上的照片，似乎还有九世纪的越州窑瓷的破片在内。总之，在年代问题上，其幅度似乎应该是九—十世纪的唐末、五代以至十一世纪前叶的宋初。

我没有目睹这里出土的陶瓷片，所以不能确切论定。但是总的说来，中国陶瓷被运到如此远离海岸的都市，这一情况是很重要的，它告诉我们，中国陶瓷深入内陆地区的途径。布腊马纳巴德的中国陶瓷，想来必有不少是以旁浦尔港为中转地而运到那里的。

〔旁遮普和莫克兰地方的中国陶瓷〕

在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的旁遮普地方，有好几处地方发现了十五世纪前后的明代青釉瓷器碎片，它们是由斯坦因博士所采集的**。这些碎片

* R.L.霍布逊，《布腊马纳巴德出土的陶瓷》，载《东方陶瓷学会学报》，1928—30年。

** R.L.霍布逊，《波斯南部和旁遮普北部的陶瓷碎片》引自A.斯坦因，《印度西北和伊朗东南的考古调查》，附录A，伦敦，1937年。

分布在印度河河口附近以及溯河而上的布腊马纳巴德和上游的旁遮普地方。

除了上述沿印度河向北伸展的一线外，对于运抵巴基斯坦西部俾路支和面向阿拉伯海的莫克兰的中国陶瓷，看来也还必须交代一下。斯坦因博士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间，曾到过这个地方。据他所说，在莫克兰山区的科尔瓦地区的巴克遗迹中，曾发现了一片中国陶瓷片*。又说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的调查旅行中，从莫克兰地区的好几个地方发现了十世纪时代的青白瓷**。由此可见，中国陶瓷是沿着阿拉伯海西运，然后再到达伊朗各港口和内陆地区的。

然而，以旁浦尔为枢纽而运抵巴基斯坦的中国陶瓷，在它们运抵旁浦尔以前，其经过路线又是怎样的呢？为此，下面还拟把印度和锡兰的情况稍作探讨。

译　注

① 犍陀罗艺术，是佛教艺术的一个流派。犍陀罗(Gāndhāra)是古代印度国名，其位置相当于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遣人到此传布佛教，逐渐形成了犍陀罗式的佛教艺术；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时代，是犍陀罗艺术的全盛时期。 ——译者

② 法隆寺，在日本奈良县圣驹郡斑鸠町，是日本南都七大寺之一，相传系公元六〇七年圣德太子所建造。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物之一。

——译者

③ 《大唐西域记》卷一，梵衍那国大佛像："王城东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四百五十尺，金色晃耀，宝饰焕烂。东有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也。伽蓝东有鍮石释迦佛立像，高百余尺，分身别铸，总合成之。"

——译者

④ 作者所说系一九七二年以前情况。一九七二年，原东巴基斯坦地区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东巴基斯坦已不复存在。 ——译者

* A.斯坦因：《格德罗细亚的一次考古旅行》，载《印度考古调查报告》第四十三期，加尔各答，1931年。

** R.L.霍布逊：《波斯南部和旁遮普北部的陶瓷碎片》。

八　南海的青瓷

——从印度到斯里兰卡

在迈索尔邦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来到印度南部有丰富历史遗迹和美术珍藏的、美丽的迈索尔邦。①这里的宁静风物，实在使人感到心情舒畅。自从十月初离开德里以后，一直往南到了拉贾普那他邦、孟买邦、海得拉巴邦等地。②在这期间，印度社会的神秘而浓厚的阴影，曾经多次引起我的惊奇，深深感到生活在印度的人们的多样性、种姓的复杂以及大自然的雄伟和苛烈。这里深深地刻划着历史上无穷无尽的变迁，回响着芸芸众生为了生存而发出的呻吟。

毫无疑问，印度的形象，不仅由扎根在这里的印度人所构成，同时也是四周各地区各种人的血缘交错的奇异组合。人们不难窥及，在这个巨大的形像之中，有着波斯、中亚、阿拉伯、欧洲、以及西藏、蒙古、印度尼西亚甚至中国等的深刻烙印。整个社会，简直是个可怕的大杂烩。但假

使能深入根究下去，却又可能是个饶有兴趣的社会，因为从它身上能够获得一些东西，正像瓦砾堆中会意想不到地出现珠玉一样。印度社会也许恰恰就是这样。

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只身的旅行者来说，处在这样一个渊深莫测的国家里，迎来的每一天，都是反复和无限的期待以及连续和高度的紧张。经过白天的整日紧张工作，到了恬静的夜晚，当临睡之时，我总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担心着翌日将出现的难以逆料的情况。这种思想，在我休息的时候，常常情不自禁地从内心深处流露出来。

恰巧在这时候，我幸运地从德干高原的海得拉巴来到迈索尔邦的首府班加罗尔。

至于说为什么在这里感到心情舒适，这是一言难尽的。首先，南部印度的迈索尔邦与北部印度或德干高原的风光相比较，自然界显得郁郁葱葱，稻田遍野，使人有一种柔和的感觉。其次也许就是班加罗尔这个城市了，在这里，仿佛是处身于充满着恬静的环境之中，加上提供给我们下榻的蒂布·斯卢坦故宫，它具有一种古代建筑所特有的使人安宁的感觉。但是更使我铭感腑内的是，我在这以后一个多星期的历史和考古旅行中，印度政府考古局驻班加罗尔的督察官纳泰

拉·詹氏对我的盛情接待。

我之所以不远千里来到迈索尔邦，其目的之一，当然是为了访问许多有名的历史古迹和博物馆之类，此外还拟探究一下当时我极感兴趣的、南部印度的巨石建筑物——石屋形坟墓、石楼、石柱以及称为詹得拉维利的大规模新石器时代遗迹。

我离开班加罗尔，先向西到达当时乏人问津的贝卢尔和赫莱比德。它们从十一世纪到十四世纪，曾是印度南部非常繁荣的霍伊萨拉国的京城遗址。在这穷乡僻壤的原野上，现在散布着许多废墟，废墟上静寂地横卧着星形结构的僧侣寺院，寺院壁上密密地装饰着栩栩如生的神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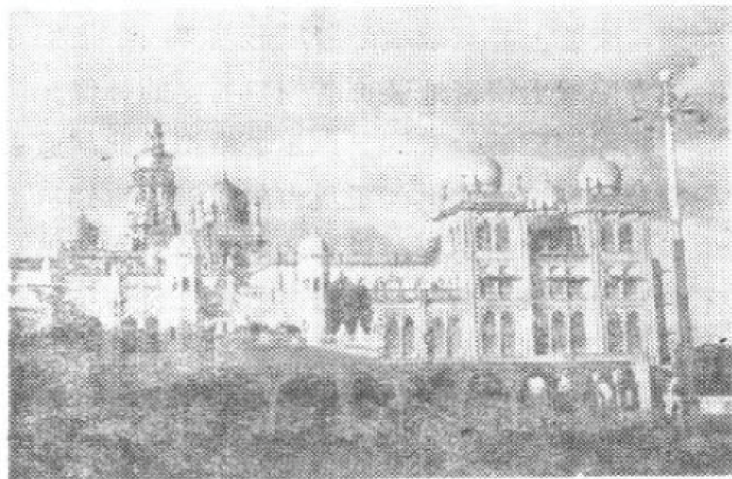
我溯洄辗转地来到贝卢尔，原拟由此转道去詹得拉维利遗迹，但到了贝卢尔以后，方知这里位于迈索尔邦和海得拉巴邦的交界处，交通极为不便，加上纳泰拉·詹氏事务倥偬，以致未克前往。

于是就来到迈索尔，这个古都正如事前所预料的，是一个风文尔雅的宁静城市，它是按照印度人自己的习俗而建成的繁荣都市。往昔的迈索尔王宫，今天成了故宫博物馆，陈列着王宫所收藏的各种各样令人瞠目的豪华物品。在陈列品中有一件日本铠甲，它是由绯色皮条穿缀起来的，

这当然不错；但插在腰上的却不是刀而是枪，对日本情况的无知竟至于此，真使人暗暗发笑。

詹得拉维利的中国陶瓷

迈索尔城内现有博物馆一处，即邦立考古学博物馆。这里保藏着詹得拉维利遗迹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这就是我所盼望一睹的。当我正在观看那些石器和陶器时，却发现了几个粘贴在肮脏的硬纸板上的陶片和古币，被漫不经心地扔在阴暗角落里，不禁使人发生了亲切之感。



迈索尔邦的马哈拉奇故宫博物馆

到近处一看，果然是两个宋代的龙泉窑青瓷破片、一个白瓷片（当时骤看颇像磁州窑，实际上可能是华南闽广一带的窑所烧制的白瓷）和一个

看来是中国南方制品的黑褐釉陶的破片，它们和可能是北宋神宗（一〇六八—一〇八六年）时的“元丰通宝”钱币等钉缀在一起。这个博物馆居然不知这些遗物是什么，竟把它们加上“不详”的标记而加以弃置。

定神细看其出土地点，写的是詹得拉维利遗迹。后来又知道，在詹得拉维利的出土物中，还有罗马时代的货币。如此看来，詹得拉维利不仅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遗迹，在古罗马时代和十世纪以后的中世纪时代，也都是个很重要的地方。这里附近出产松绿石之类的优质宝石，以致在这样的偏僻地区，也能运入罗马、中国的来自远方的珍贵物品。

詹得拉维利的中国陶瓷，正像我们盼望已久的朋友，能在意料不到的地方邂逅，这种喜悦，使我感到无比的激动。这的确是个有价值的发掘物，而且是和北宋元丰年号（一〇七八—一〇八五年）的货币一起发掘出来的，说明它一定是在宋代运来印度，再辗转运到迈索尔内陆地区的。

由此可知，萨拉逊帝国的商人曾经走遍东中国海、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三个海洋，从事贸易活动。他们把龙泉的青瓷、华南诸窑的白瓷和黑褐釉陶器从杭州或泉州诸港口装货出航，运到南方诸国销售。

在迈索尔看到了中世纪的中国陶瓷，使我心情为之一振。在遥远的埃及和东非海岸的各个都市以及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的遗迹中，都已经发现了古代九—十世纪的越州窑瓷系青瓷和白地褐釉的长沙窑瓷，也发现了十一—十三世纪的宋代青瓷、白瓷和青白瓷等。然而，我以前在印度旅行时，在孟买和海得拉巴的博物馆中，只见到过十四、五世纪以后的青瓷和青釉瓷器，却未能接触到年代比这更早的，此事使我颇感纳闷，殊不料此行竟遇见了寻求已久的十四、五世纪以前的中国陶瓷，不禁使人喜出望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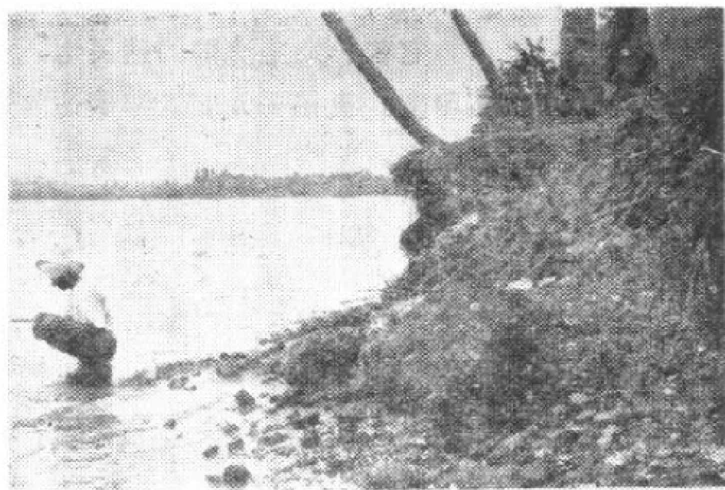
此后，在南部印度的继续旅行中，当我们到了科罗曼德耳海岸的本地治里地方时，这种喜悦之情得到了又一次的增加，这就是下面所要叙述的。

科罗曼德耳海岸的中国青瓷

大家知道，在南部印度的科罗曼德耳海岸，有一个叫做马德拉斯的城市。这个城市非常宁静，完全是英国式的，鳞次栉比地排列着庄严的红砖建筑。它过去曾是印度洋上有名的海港，现在由于航空发达，这里已不甚重要。但在印度，它仍不失为一个屈指可数的城市。

从马德拉斯往南，火车沿海运行六小时，就到达本地治里市。它曾长期是法国的殖民地，一九五四年才归还印度。我在一九五五年底访问这里时，这里还有一半戴着法国式帽子的警察，他们和印度警察一起在街头巡逻。幽静的街道非常漂亮，恰像是熏染了法国的香气一样。这个城市和坚固得像仓库一样的马德拉斯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站在茫茫的印度洋海岸上，浪花飞溅着白沫席卷而来，法国人真会满怀乡愁地联想起故国的比斯开湾呢。

再从此往南二十公里，就是滨海的阿里加梅杜村，它是个冲积而成的贫穷村落，从公元前一世纪后半期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公元前二十七—公元十四年）时开始直到二世纪末，这里是罗马人居住过的地方，其遗迹至今还残留在椰子林之中。当时，这个城镇似乎叫做波都基，现在沿河还静寂地残留着当时的许多房屋遗迹，河畔沟间，尚能见到地板或墙垣的残骸。二千年前，人们在通商上的冒险精神，似乎还凝结在这个遗迹的四周，至今犹使人感觉到这种气氛。云集在这里的罗马人，把铜、锡、玻璃和罗马特有的阿雷丁陶器以及葡萄酒等带来印度，从印度购买宝石、珍珠、象牙、鳖甲、胡椒、木棉等，运销到罗马所属的东方或波斯去。



阿里加梅杜村河边的遗迹

因此，在这个遗迹上可以发现处处散扔着的罗马玻璃器皿和装饰品，绿釉陶片到处狼藉，还残留着加工出口木棉的染料残渍。我们一面捡拾这些遗物，一面不禁再一次信服，当时印度洋面上的贸易，曾是多么的兴隆。

在罗马人离去以后，一直到十二、三世纪，这个城市还仍然作为港口而继续繁荣，到以后才告衰落。

到了本世纪，这个遗迹所具有的独特重要性引起了讨论。从三十年代起，本地治里的法国考古研究所成员在这里进行了发掘* 。战后，穆尔提

* P.Z.巴他比拉明：《阿里加梅杜村的发掘》，本地治里，1946年。

梅尔·惠勒博士等又于一九四五年在这里进行大规模的调查。*

果然，除了罗马时代的遗物以外，从这个奇异的遗迹最上层，还发现了完整的宋代龙泉窑的砧手青瓷大碗，这是法国调查队发掘出来的。可惜这只大碗已送往德里的国立博物馆，这里未曾见到。

在附属于法国图书馆的小巧精致的本地治里博物馆中，有许多收藏在抽屉里的中国陶瓷破片。承蒙亲切的巴他比拉明氏的好意，得以观看了这些破片，发现了外侧有镐形花纹的龙泉窑青瓷碗的破片和小罐的一部分、青白瓷盘的破片以及年代更为久远的九—十世纪的越州窑瓷盘碎片等（见插图），更难能可贵的是，其中还杂有北宋末年徽宗宣和（一一一九——一一二五年）铸造的“宣和通宝”。由此可以判断，这些东西大致上是北宋到南宋时期，即十二、三世纪时代被运送到这里的。

根据报导，当惠勒博士在一九四五年进行发掘时，从上层和地表也发现了十四片宋瓷，据说系越州窑瓷、龙泉窑青瓷的破片和磁州窑陶片。

* R.E.M.惠勒，A.戈什，克里希纳·戴瓦：《阿里加梅杜，印度东部沿海的印度—罗马贸易站》，载《古代印度》第二期，1946年。

而这些都是与十一、二世纪的铜币混在一起出土的*。由此可知，这些器皿的输入使用，大概也在这个时期，情况与法国调查队的调查结果吻合，令人欣喜。



本地治里博物馆藏阿里加梅杜村的中国陶瓷片

陶片与宋代钱币一起出土，其情况与迈索尔邦的詹得拉维利遗迹完全相同。阿里加梅杜可能是由于过去的罗马人在此居住而繁荣起来的贸易港，所以其存在一直持续到中世纪，中国商品也就络绎不绝地在这里卸货。

在科里梅杜的收获

在本地治里附近发现中国陶瓷的地方，还不

* R.E.M.惠勒：《阿里加梅杜》，第91-92页。

仅上述阿里加梅杜一处。此外，在本地治里西北约十公里的地方有一处科里梅杜遗迹，其中也有中国陶瓷的分布。

科里梅杜是离海岸不远的新石器时代遗迹，这里由暗红色土壤构成的台地，被渊深而宽阔的侵蚀沟纵横切割。走上台地一看，处处都有用蛤刃磨制的石器和红褐色的陶器，以及火石质或玉髓质的细石器，一起散扔在那里。

在接近一九五五年底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由上述法国博物馆的巴他比拉明氏陪同，参观了这个地方。我一面检收石器和陶器，一面在红土台地上徘徊溜跶，蓦地看到了散扔着的宋、元时代的陶瓷破片，不禁欣喜欢呼。捡起来观察以后，知道是十二、三世纪南宋时代浙闽二省窑的烧制品，是表面有珠光的枇杷色青瓷碗破片，以及涂有淡青白釉的、粗壮的壶的颈部（里面呈蛇腹形），另外还有十四世纪以来在闽广二省烧制的朴素青釉瓷器破片（按拙著《中东及南亚的中国中世纪陶瓷》——载《东方》第六卷、第四期——，关于这三个陶瓷片，曾说明："涂有青灰色釉的越州窑系统的壶口缘部，珠光青瓷碗的断片和宋胡绿的青釉瓷器断片。"—第六页—但后来调查的结果，拟作如上的更改）

科里梅杜在今天是个极其荒凉的遗迹，从散

扔着的古代铁器来看，这里在中世纪似曾存在过村落。

在这样的地方，竟也使用过中国宋、元时代的陶瓷，则中国陶瓷的广泛散布，真是出人意料。

此外，在马德拉斯邦③南端，有一条流经提鲁佛利县的坦拉巴尼河，其河口的格亚尔地方，据说也有宋、元时代的陶瓷出土＊。

在印度，有十四世纪以前的中国陶瓷出土之处，虽然并不很多，可是，既然偏僻如南部印度也到处有所发现，所以如能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则其他许多地方还会有所发现的。

十四世纪以后的中国陶瓷

在印度也看到了许多十四世纪以后的中国陶瓷。印度东端的阿萨姆邦，在其首府高哈蒂的邦立博物馆里，陈列着好几只破碎的十四—十五世纪的龙泉窑青瓷大平碗，那是在建设市区时从住宅下面发掘出来的。

关于这个时代的东西，除了发掘出土的以外，其他还有世代相传的文物。据大英博物馆东方部负责人巴兹尔·格雷氏的报告，在印度当铁

＊ R.E.M.惠勒：《阿里加梅杜》，第91页。

路技师的加拿大人威廉姆·加明兹氏，曾从一八六四年到一八八三年间收集了六百多件十四世纪中期至十七世纪的中国陶瓷（主要是青瓷和青釉瓷器），其中有许多据说是奥德（今北方邦东部）的某一个地方长官的收藏物。格雷氏的论文中还提到，在加尔各答当律师的威廉姆氏，曾在印度搜集了一百数十件中国陶瓷，也大都是穆尔西达巴特（今孟买邦北部）的地方长官的收藏物。＊

在印度旅行时，可以发现莫卧儿帝国时代的帝王或地方长官所居住的城堡，现在处处都充当着作为博物馆的新角色。而在这些博物馆里，几乎可以说一定陈列着几件十四、五世纪至十七、八世纪的中国陶瓷。这些可能都是过去城堡主人的部分收藏物。例如在德干高原的海得拉巴的尼扎姆故宫博物馆里，这种陶瓷塞满了一个陈列室，几乎多得令人发腻。

除了那些故宫博物馆以外，威尔斯王子博物馆也建造得非常宏伟。这是一座十分魅人的英国式建筑，耸立在海滨花坛纵横的宽广地中间。这个博物馆因它藏有莫卧儿时代孟买派印度绘画和南亚的织物而特别闻名。其中有一个陈列室，橱

＊ 巴兹尔·格雷，《中国陶瓷对印度的输出》，载《东方陶瓷学会学报》1967年12月。



在印度收藏的中国陶瓷器
（采自巴兹尔·格雷氏的论文）

窗里塞满了以中国陶瓷为主的许多陶瓷器皿。并且还有在粟田口④一带烧制的、颜色耀眼而称为萨摩的日本陶瓷。这里的中国陶瓷，主要是十五世纪以后到十七世纪前半期的明代青瓷和青釉瓷器两种。

作为东西方海上贸易的一大中转地，印度自古以来一直在这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这种事实从前已叙述的阿里加梅杜遗迹中也能看得出来，而且其重要性随着时间而增加。西面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利卡特和卡伦，也就是这样，因为东来的中国商人和西来的萨拉逊商人而得到繁荣。据到过这个港口的伊斯兰教大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在其著作《纪行》上的叙述，这里的繁荣情况历历可见。《纪行》中记载着航行到此的中国船舶，可以乘坐千人，并且进行着中国陶瓷的贸易等

等。在马拉巴尔海岸，据传说经常能捡到中国铜钱，* 这可能也与上述记载有关。

与此同时，中国出版的《岛夷志略》上，也记载着卡利卡特和卡伦的繁荣景象和陶瓷器的贸易情况⑤。到十五世纪初期，当郑和的强大海军到达印度的港口以后，这种实况，就更为详细地传达到了中国。

据此，十五世纪以后印度与中国在陶瓷上的关系就更为清楚了。中国的贸易商运来了迎合印度各个王侯们爱好的陶瓷器。

在印度发现的十四——十五世纪以后的中国陶瓷，几乎全是青瓷和青釉瓷器，这显然反映了当时印度贵族们的需要。在这些青釉瓷器中，有在中国所未见的那种杂乱无章的特殊图案，这又说明了印度人的癖好。

由于这方面的收获，使我的印度旅行，又平添了许多乐趣。

斯里兰卡（锡兰）——从科伦坡到达迪加马

印度洋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作为贸易上的大中转基地和中国陶瓷的出土地，这个地方是

* 耶鲁与科迪埃：《马可·波罗》，第二卷，第337页。

系人心怀的，它就是锡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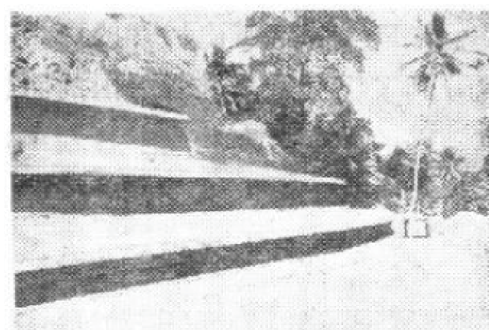
在印度拥有阿里加梅杜等遗迹的科罗曼德耳海岸的彼方，横卧着这个绿色的锡兰岛，中国人在古代称它为狮子国。以前，当阿育王时代，它是联系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枢纽。从东西两方驶来的船舶，都在这里停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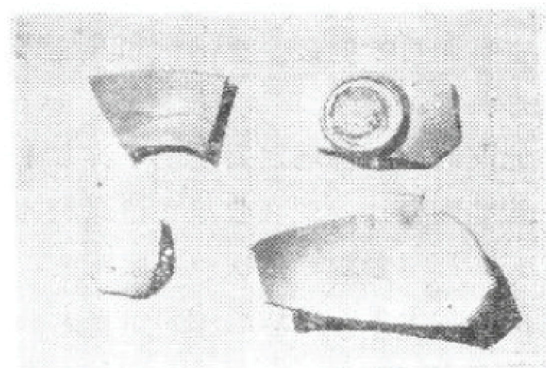
这种情况直到中世纪尚无改变，所以在锡兰发现十世纪以来的中国陶瓷，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在锡兰曾调查到下列几个出土中国陶瓷的地方。

锡兰的首都科伦坡，遍地都是繁茂的椰子林、芭蕉和红花[6]。这是一个物产富裕的南国，但可能是由于土地低洼，所以湿度很大，异常炎热。即使是最凉爽的十二月份和一月份，被褥也几乎被汗水所潲湿。

我们所关心的目的地科伦坡博物馆，面积甚广，建筑也很高大，里面陈列着中国陶瓷和形形色色的文物，令人兴致勃勃。这里还建有一块汉语碑碣，它是为了记念十五世纪初期的郑和而建立的。当时，他率领中国明朝的海军，战胜了锡兰国王，并且俘虏了他。这是一块珍奇的碑碣，但文字磨损，已经不能辨认了[7]。

后来到了该岛中央幅员广阔的高原地带，这里凉风习习，从茂密的原始森林吹拂而来，酷热之苦顿有所减。科伦坡的锡兰政府机关，在夏季





达迪加马的佛塔及其周围出土的中国陶瓷片

所以要迁到位于高原地方的康提，也正是为此。我们发现中国陶瓷的遗迹，就在这高原地带。

从科伦坡到康提的道路，当其进入高原的入口处的地方，有一个叫做克加拉的城市。由此城南折，其间道路崎岖，田园和森林相接，行驶八到十公里后，就能看见一个名叫达迪加马的小村落。人们看到这样一个几百年不变的古老村庄，却不知这里还有一座砖砌的大窣堵波（佛塔）[8]，荒凉颓废地耸立着。据传说这是十一、二世纪所

建造的，恰像日本的偏僻山村旁的巨刹。仅此一端，也就看到了锡兰这个佛教之国的面貌。

这座佛塔的建造时期相当于日本平安朝③的中期，在悠悠岁月之中，由于风吹雨打，受到了严重的剥蚀。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四年，经过连年的发掘调查和修理，结果获悉其内部分为十室（上面一室，下面九室），发掘出水晶制的舍利壶、古拙而可爱的镀金小佛像和其他风格高雅的青铜灯具等。

与此同时，在佛塔四周发现了许多中国宋代瓷片，这些陶瓷片，现在收藏在该遗迹的附属陈列馆里。到那里参观，依次映入眼帘的，首先是最古老的一批十世纪以后的越州窑系大碗破片，其次是几个十二—十三世纪的美丽砧手龙泉窑青瓷碗破片，清秀可爱的青白瓷柑子形小壶和四脚小香炉的一部分。此外还有中国南部闽广一带的窑烧制的饴釉四耳罐断片。* 这简直是意外的收获，当时，照相机也觉得应接不暇了。

这些十一十三世纪的中国陶瓷，大概都是奉献给佛塔的。在锡兰山区的佛塔之前看到了这些

* 1955年12月19日笔者所亲见。又发掘报告书计有：S·帕拉纳维塔纳：《锡兰考古调查报告1947、48、49、50、51、52、53、54年》，《锡兰达迪加马考古调查报告》第七卷，1955年。

美丽的青瓷片，与在埃及尼罗河畔遇到中国陶瓷有着不同的亲切之感。但不知奉献这些中国陶瓷的，是锡兰的信徒呢，或者也有中国的佛教徒商人呢？

耶珀胡弗的遗物

我在达迪加马增长了见识以后，接着又往高原深处，去考查从耶珀胡弗发现的中国中世纪陶瓷。

耶珀胡弗位于锡兰北部的重要城市阿努拉达普拉以南约八十余公里，其附近有座坚固的马霍城堡。耶珀胡弗都市遗迹在此以东四、五公里，其中央有巨大的岩山，周围由堡垒宽广地包围着。在锡兰，这种形式的中世纪城市很多，在陡峭的岩壁上凿有美丽的壁画因而闻名的希格里亚城市遗迹，也与此相同。这种岩山和堡垒，可能是为了在敌人袭击时进行防卫而用的。

对于这个耶珀胡弗遗迹，曾在战前一九一一年和战后一九四九年进行了两次考古学方面的调查，结果在这里发现了精致的中国宋、元时代的陶瓷和同时代的一千三百六十四枚中国铜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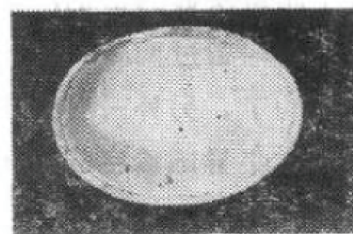
关于中国铜钱，在一九一一年首次调查时，

* D·T·戴万德拉，《耶珀胡弗导游》，科伦坡，1951年。

曾从南门的遗迹中发现了十二个北宋和南宋的钱币，后来在一九四九年调查时，在僧院前面和东门又发现了数量惊人的一千三百五十二个中国钱币。在东亚其他地方，能从一处发现这么多中国钱币是没有先例的。何况这里并非海港城市而只是一个山区城市呢。据我所见，其中除了几个唐朝的开元通宝和一个元朝的至元通宝（一二六四——一二九四年）以外，它们几乎全是两宋时代的货币。这些钱币被带到这里的年代，可以推测，大致当在十二、三世纪。

从耶珀胡弗出土的中国陶瓷和铜钱，后来送到上述阿努拉达普拉博物馆。在十一世纪以前，阿努拉达普拉曾是统治锡兰岛的大都城，所以壮丽的佛教遗迹鳞次栉比，而博物馆里陈列品也都非常精美。如果想学习锡兰的艺术，尤其是佛教艺术，则这个博物馆是不可失之交臂的。

观看收藏在这里的耶珀胡弗出土的中国陶瓷，最显眼的首先是外侧镐形花纹很鲜艳的龙泉窑青瓷的完整大碗，口径二十一公分，高九·三公分，大小适中，无疑是南宋时代即十二世纪的东西。这可以说确是日本人喜爱的稀物。我虽然走遍亚洲各地，所见龙泉窑青瓷系统的出土物已经不少，但像这样无论在形状、色调等各方面都如此舒畅的完整品，实属罕见。因为长时期埋在

耶珀胡弗的中国陶瓷器

地下，所以略受风化，但尽管如此，却仍然很逗人喜爱。

其次要算两只大小青白瓷碗，虽然两只都是拚合起来的破器，但却各具完整的形状。大的一只口径二十三公分，高七公分，是质地很细薄的上等品，当系宋代的青白瓷。

更引人入胜的是橄榄色的青瓷制品小狛犬[10]的头部，其表情很生动，颇类日本古代的陶瓷狛犬，仅在眼珠部分涂有黑色铁釉，姿态逼真，新型别致。

究竟是什么地方的何许人物，奉献这种狛犬给耶珀胡弗的呢？对于这样的问题，心头就会涌现起一系列的联想。是不是经过颠沛流离，终于成功地移居到锡兰来的中国人？抑或是到这里朝拜佛教遗迹的巡礼者？据说在六世纪初期，中国

有个叫做法显的僧侣，曾因寻求佛法而到阿努拉达普拉滞留过两年，因此，上述联想就不是没有依据的了。另外一种设想是，这个狛犬有没有可能是收集异国珍宝的耶珀胡弗贵族和大商人们的收藏呢？

这里还收藏着福建省一带的窑里烧制出来的白瓷片和宋三彩的完整绿釉长壶等。

这些陶瓷全是十二、三世纪的东西，它们与前已叙述的中国古钱具有相同的时代。我们旅行到达迪加马，又到耶珀胡弗，对于从十世纪到十二、三世纪曾有中国陶瓷运抵锡兰，然后再从海港转运到内陆高原地区的情况，已经调查明白。如果联系到与这些中国陶瓷一起出土的许多中国钱币，那就不难推断，这些中国货币是作为财富被收藏着的。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它具体说明了当时中国贸易蓬勃发展的情况。

这种发达的贸易，以后仍继续不断地进行。

因为在十五世纪初期，中国明朝的大海军进行了印度洋的七次航行，即所谓郑和远征。当时，锡兰想必是个重要的停泊地，有时也还可能作为战场。于是就大量地输入了中国商品，其中当然包括陶瓷器在内。现在集中在科伦坡博物馆一室内所陈列着的十五世纪以来的青瓷和青釉瓷器，想必也是这个时期的东西。不过对此还没有

作过详细的调查。

在锡兰好像还深藏着我们所要探索的大量东西。像科伦坡博物馆里收藏的越州窑瓷之类，如果能考查出它们的确切出土地点，这当然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仍拟和锡兰人共同探索这些历史上的宝藏。

译　注

① 迈索尔邦，今卡纳塔克邦。　——译者

② 拉贾普那他邦，今拉贾斯坦邦；孟买邦，今马哈拉施特拉邦；海得拉巴邦，今安得拉邦。——译者

③ 马德拉斯邦，今安得拉、泰米尔纳德、喀拉拉等邦。　——译者

④ 粟田口，属于日本东京都东山区，该地及其附近的五条坂一带，出产以黏土为原料的陶瓷器，产品多呈卵色，表面有裂痕。　——译者

⑤ 《岛夷志略》（藤田丰八校注本）小唄喃，“货用金银、青白花器、八丹布、五色缎、铁器之属。”藤田丰八注，“所谓唄喃者，乃Kaulam之对音。”则唄喃即是卡伦。又同书古里佛：“当巨海之要冲，去僧加剌密迩，亦西洋诸马头也，……海滨为市，以通贸易”。　——译者

⑥ 红花（Carthumas tinctorius），菊科、红花属，一年生草本，原产埃及，果实可榨油，花可作染料。　——译者

⑦ 明巩珍《西洋番国志》（向达校注本）附录二刊载了此碑全文，“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曰，仰惟慈尊，圆明广大，道臻玄妙，法济群伦。历劫河沙，悉归弘化，能仁慧力，妙应无方。惟锡兰山介乎海南，言言梵刹，灵感翕彰。比者，遣使诏

谕诸番，海道之开，深赖慈佑，人舟安利，往来无虞，永惟大德，礼用报施。谨以金银织金纻丝宝幡、香炉、花瓶、纻丝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总计布施锡兰山立佛等寺供养：金壹仟钱，银伍仟钱，各色纻丝伍拾匹，各色绢伍拾匹，织金纻丝宝幡肆对内红贰对黄壹对青壹对，古铜香炉伍对，戗金座全古铜花瓶伍对，戗金座全黄铜烛台伍对，戗金座全黄铜灯盏伍个，戗金座全硃红漆戗金香合伍个，金莲花陆对，香油贰仟伍佰觔，腊烛壹拾对，檀香壹拾炷。时永乐七年岁次己丑二月甲戌日谨施。” ——译者

⑧ 窣堵波（Stupa），或译窣睹波、塔婆等，省译作塔。《大唐西域记》卷一：“窣堵波，所谓浮图也。” ——译者

⑨ 日本平安朝，继奈良时代以后，镰仓时代以前，时当公元七八一至一一九二年。 ——译者

⑩ 狛，《说文解字》卷十上：“如狼，善驱羊”。 ——译者

九 东南亚的中国陶瓷

——以菲律宾的新发现为中心

在菲律宾发现的中国陶瓷

从战前调查过菲律宾群岛中世纪墓地的哈瓦那大学的詹斯博士的报告中，以及从战后发掘过马尼拉南部加洛他干半岛海岸地带的墓地的菲律宾博物馆的福克斯博士的报告中，已知菲律宾群岛也和缅甸、泰国、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婆罗洲①等一样地发现了许多中国陶瓷、泰国陶瓷和安南陶瓷。我在一九六七年八月访问美国安纳巴的密执安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时，亲眼目睹了菲律宾出土的中国陶瓷，不禁为他们的丰富收藏而惊叹不已。

当时，密执安大学正在召开第一届国际东方学家会议，参观这个博物馆，是应会议代表华盛顿菲利亚美术馆馆长约翰·波普氏的邀请。骤入博物馆，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装饰在入口走廊上的明代的精致青瓷和青釉瓷器。

颇大的壶、瓶、盘，都随意放置在好几个橱

里，其中有好些是引目的彩绘或色泽光亮的陶瓷。有些地方还陈列着很大的有盖青釉瓷器四耳瓶，上面绘有双龙图案，线条甚为刚劲有力。这些青釉瓷器上的彩绘，给人以气势磅礴的感觉，一派异国情调，是日本人所陌生的。对于这些收藏的来历，从说明书上知道，乃是菲律宾群岛的苏禄群岛、宿务岛、棉兰老岛等岛屿上的出土物。密执安大学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早已开始对菲律宾群岛进行考古学调查和陶瓷器的搜集。对于这些搜集品，真使我留连忘返。

第二天再次前去这个博物馆，而且参观了该馆四楼的艾加·奥格拉教授的研究室，在那里使我更为惊异。从元、明时代到清朝的青釉瓷器，与青瓷、白瓷、黑瓷和赤绘等等，把研究室和研究室隔壁的极大收藏室的桌上和橱窗里，都堆积得满满的。与这些宋、元、明时代的中国陶瓷混在一起的，还有许多泰国的素可泰窑② 以及安南的白瓷和赤绘等。

中国的青釉瓷器，其花纹是花鸟、禽兽、龙、花卉、蔓藤花纹以及几何图案，与我们在日本看到的古青釉瓷器的花纹，无论在图形或风格方面均绝不相类，其中大部分是在日本从未见到过的。在青瓷类方面，也与日本收藏家所重视的种类有别，至于白瓷，其坯质与日本常见的景德镇

产品也完全不同。

这里有如此众多的种类对我均非熟悉，当然很感苦恼。但是却也突然产生了一种想要开启蒙昧的欲望。承艾加·奥格拉教授慨允，凡我所需，均可任意摄影。于是我就开始把其中主要的，一一摄入镜头，这也是出于我的上述欲望。

在这次学会期间，从波普氏获悉，翌年即一九六八年三月，将在马尼拉召开东方陶瓷研究会，研究菲律宾以及东南亚各国所发现的各种类型的中国陶瓷，我接受了与会的邀请。

吕宋岛的中国陶瓷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九日，我参加了研究东方陶瓷的马尼拉会议，在吕宋岛，当着酷热如同炎夏的太阳照射之下，一长队汽车，沿着广阔伸展在马尼拉东南的拉古纳大湖西侧，向南行驶八十公里，经过圣克鲁斯城，到了比纳格巴亚南村的皮拉部落。在那里，到处是被挖掘出来的中世纪墓地，曝晒在烈日之下。塔纳扎斯氏在马尼拉有名的建筑家罗克辛氏的指导之下所发掘的地区，看来还是有条不紊地在进行调查。可是当地农民们也任意挖掘他们自己的庭院，满目是洞穴累累，状况十分杂乱。

仅在一个小小的地区，就有上百个中世纪墓

穴，在墓穴内的头骨旁，露出了菲律宾烧制的陶器，脚骨边则是十一—十四、五世纪（宋、元、明初）的中国陶瓷。在殉葬品中，还有一些泰国和安南陶瓷。陶瓷器并非单件，而是大罐、小瓶、盘、碗等配套而成，至少有五、六件。至于中国陶瓷，则是青瓷、白瓷、青白瓷、黑瓷和青釉瓷器等，各式俱全。



比纳格巴亚南遗迹出土的陶瓷器

在比纳格巴亚南村，殉葬着中国陶瓷器的墓地，也比比皆是，仅目前已知的，合计就达八公倾半，幅员甚广，其中中国陶瓷的数量极为可观。而且不久以塔纳扎斯的名义，提出了一份有关罗克辛财团所发掘的古墓和陶瓷的报告。*

这种墓地并非仅此一处，在菲律宾群岛各岛屿的沿海地带，已经发现了一百多处遗迹。在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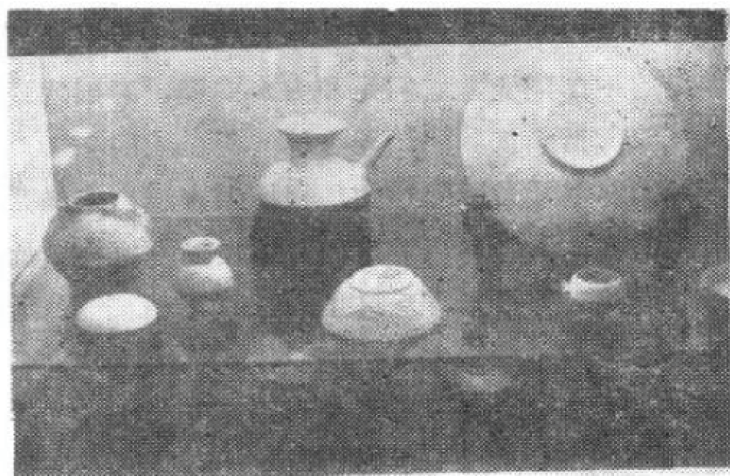
* 罗萨 C.P. 塔纳扎斯：《关于圣克鲁斯罗克辛大学对拉古纳湖的比拉的考古发掘报告》，马尼拉，1968年。

尼拉市区内修建圣塔·阿那教堂时，竟从二百零二个墓地中出土了一千五百十三件十一—十四、五世纪的中国陶瓷，它们是和安南陶瓷、泰国陶瓷及其他所谓黑褐釉的炻器③等一起出土的。

如本章开始所叙述的，根据调查过吕宋岛西南部加洛他干半岛诸遗迹的菲律宾国立博物馆的福克斯博士的报告，从这里的五百零五个墓地里，也发掘出四百十一件十四、五世纪（元末、明前期）的中国陶瓷，九十六件泰国陶瓷，九件安南陶瓷，四件来历不明的陶瓷，合计共有外国陶瓷五百二十件。*

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在菲律宾群岛上出土的中国陶瓷，均收藏于菲律宾国立博物馆、人类学研究所和菲律宾大学等处。但最近以来，马科斯总统夫人等政界显要人物或豪富们，也都开始竞相搜集。仅前面提及的建筑家罗克辛氏一人，就搜集了七千件以上，他的私宅和地下室，已成为一个很壮观的美术馆。最近出版的巨著《菲律宾发现的东方陶瓷》（一九六八年），是利用他自己的收藏写作而成的一部很真实的研究著作。此外，如桑托斯、伊利扎特、阿贝加、莱德斯

* 拙稿《菲律宾加洛他干遗迹和元末明初的中国陶瓷》，载《金关丈夫博士古稀纪念论文集》中《日本民族与南方文化》。



桑托斯氏收藏的中国越州窑陶瓷器

马、艾迪斯等诸氏，也都是很知名的收藏家。

这些收藏家所收藏的中国陶瓷，从九世纪的越州窑和越州系窑陶瓷起，包括青瓷、青白瓷、白瓷、白瓷青花（青釉瓷器）和五彩（赤绘）等，其年代直到十六、七世纪为止。其中还有日本从未见到过的福建省烧制的白瓷制品即上面散满了铁质黑褐釉小点或铜质辰砂釉小点的小壶，这大概就是所谓“铁飞白瓷”和“辰砂飞白瓷”一类的瓷器吧。其中有一种瓢形小壶，实在逗人喜爱。

要是把所有收藏家的东西全部集中起来，为数可能超过四、五万件。知道了如此洋洋大观的情况，唯有惊叹而已。英国驻马尼拉大使艾迪斯

等人，以这些收藏为基础，进行了各种出土陶瓷的研究，这种研究希望能够集其大成，结果必将大有可观。

婆罗洲和印度尼西亚的搜集品

中国陶瓷以上述情况集中在一起而被发掘出来的，还不仅菲律宾一处，菲律宾稍南的婆罗洲也是一样，而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亦复如此。

去到婆罗洲的沙捞越④，参观其首都古晋的国立博物馆，在那里，来自沙捞越河河口诸港口遗迹和考古学上著名的尼雅洞窟出土的中国陶瓷，把整座宽广的办事处二楼堆得满满的。穆勒夫人等正在对它们进行整理。这里同样也是许多从九、十世纪的越州窑瓷起，到十一世纪以后的青瓷、白瓷、青白瓷、黑釉瓷以及十四世纪以后的青釉瓷器等等，多得堆积如山。其中有一个小壶，与菲律宾出土的“铁飞白瓷”属于同一类型，引人注目。但遗憾的是这个遗迹的情况似乎还不如菲律宾那样清楚。该馆的另一室里也陈列着各种类型的中国陶瓷，并且还用模型表示出中国陶瓷从古墓中出土的情况，确实引人入胜。

在中国人的墓穴里，在其遗骸的手足之下，紧紧地垫着青釉瓷器的盘子（见插图），令人颇感诧异。从这个地区发掘出来的中国青釉瓷器

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这种情况下获得的。此外，在婆罗洲土著帝雅克人的某一部族，坟墓上还竖有巨木所作的墓标（墓柱），在这巨木的周围，密密地嵌上陶瓷盘作为装饰。陶瓷盘居然还有这个不寻常的用法，这真是人们所说的百里不同风了。

有关沙捞越出土的中国陶瓷，虽然已有各种报导，但古晋博物馆的《沙捞越博物馆杂志》却是非读不可的。



随葬在遗骸下面的中国陶瓷器
（古晋博物馆）

从印度尼西亚各岛屿发现了大量中国、泰国和安南的陶瓷，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这些陶瓷中，已有不少被带到国外。昭和十年前后，冈田繁藏氏和山尾薰明氏等人，也在日本搜集了许多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南部（加里曼丹）和西里伯斯⑤等岛屿出土的中国、泰国和安南、日本等陶瓷，仅昭和十五年在东京展览会上作过介

绍的冈野氏所搜集的陶瓷，为数就上数千件，令人叹为观止。*

除了青瓷、白瓷、青白瓷以及青釉瓷器、赤绘等一般的中国陶瓷以外，还有唐三彩的壶之类。据说曾有人怀疑过，这些陶瓷是否真正是印度尼西亚的出土物。

从印度尼西亚出土的中国陶瓷以及泰国、安南陶瓷，现在都集中在雅加达国立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们手中。至于它们的确切出土地点和发掘情况，仅知它们来自北婆罗洲。雅加达国立博物馆的收藏，是以弗利纳斯氏的数千件搜集品为基础的。其中除唐末以后的中国陶瓷以外，还陈列着二世纪（后汉）到八世纪（唐）的陶瓷。**目录上写的出土地是爪哇和苏门答腊等，但遗憾的是这些出土地绝不可信。假使真的如此，那末，在古代东亚贸易史或文化交流史上，都将发生大量的新问题。

马来半岛上出土的中国、泰国和安南陶瓷，收藏在新加坡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博物馆（前拉富尔兹博物馆）中。

---

* 冈野繁藏氏所搜《兰领东印度诸岛遗存陶瓷工艺品图谱》，昭和十五年；伊东忠太、镰仓芳太郎：《南海古陶瓷》，宝云舍出版，昭和十二年。

** 根据E.W.旺.奥尔索伊·弗利纳斯氏1949年所编目录。

对历史和文化的贡献

最近以来，从东南亚各岛上，发掘出了大量的中国、泰国和安南陶瓷以及柬埔寨陶瓷等等，其中的中国陶瓷，无论在质地、形状和描绘的花纹方面，有许多都和过去在中国、日本以及欧美等地所收藏的不同。有不少类型是迄未见过的，而且为数甚巨。

这是因为，尽管这些东西与实际生活关系密切，但它们却来自搜集家们所忽视的民窑。此外，也因为它们是专供外销的缘故。由于它们是民窑产品，而陶瓷研究界历来讲究陶瓷的身价名义，因此，这类陶瓷就很难得到他们的青睐。但实际上，它们也是很重要的文化遗产。

因此，一九六八年春季，召开了东方陶瓷研究的马尼拉会议，其目的是为了把东南亚特别是菲律宾所发掘的九世纪以后的、丰富多采的中国民窑陶瓷作为研究对象，以便把中国陶瓷史上许多莫知究竟的问题探查清楚。

这次会议上的重要议题如下：（一）在菲律宾发现中国陶瓷的实况；（二）中国陶瓷贸易的起源；（三）宋、元、明初外销陶瓷的特征及其主要种类；（四）中国南部自唐至清的窑址及其制品；（五）这些地区所发现的炻器的性质及其

产地和年代；（六）青釉瓷器的起源和发展；（七）安南陶瓷和泰国陶瓷的性质；（八）世界各地发现中国外销陶瓷的情况。

当时，就这些议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由于任何一个议题都有争论，因此，所有问题都未能作出明确的结论。虽然如此，却也大大地改变了已往的一种想法，即认为过去中国的许多外销陶瓷都是浙江省龙泉窑青瓷和江西省景德镇的青白瓷及白瓷青花。进一步明确了外销陶瓷中的大部分是闽广二省的窑所烧制的。此外，白瓷青花（青釉瓷器）的起源也不能简单地归于景德镇制品，而认为有必要更多地重视闽广二省窑的制品。并且还清楚地证实了，早在中世纪时代，中国陶瓷已从整个亚洲输出到了非洲东部。

总之，从菲律宾、婆罗洲、西里伯斯、爪哇和苏门答腊等东南亚各地所发现的为数庞大的中国陶瓷，为我们说明了中国窑业的性质及其历史发展概况。这些遗物，趣味盎然地向我们展示了陶瓷贸易的实况及其对国外的影响。如果说中国陶瓷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名品鉴赏的范畴，而是渐渐地登上了美术史和东西文化交流史的领域，并且在世界贸易史舞台上大显身手，那也并非言之过甚。对于广义的历史研究来说，中国陶瓷确是贡献巨大的。

所以我认为，对于东南亚各地区所发现的中国陶瓷、泰国陶瓷和安南陶瓷等等，今后必须引起我们的密切注意。

译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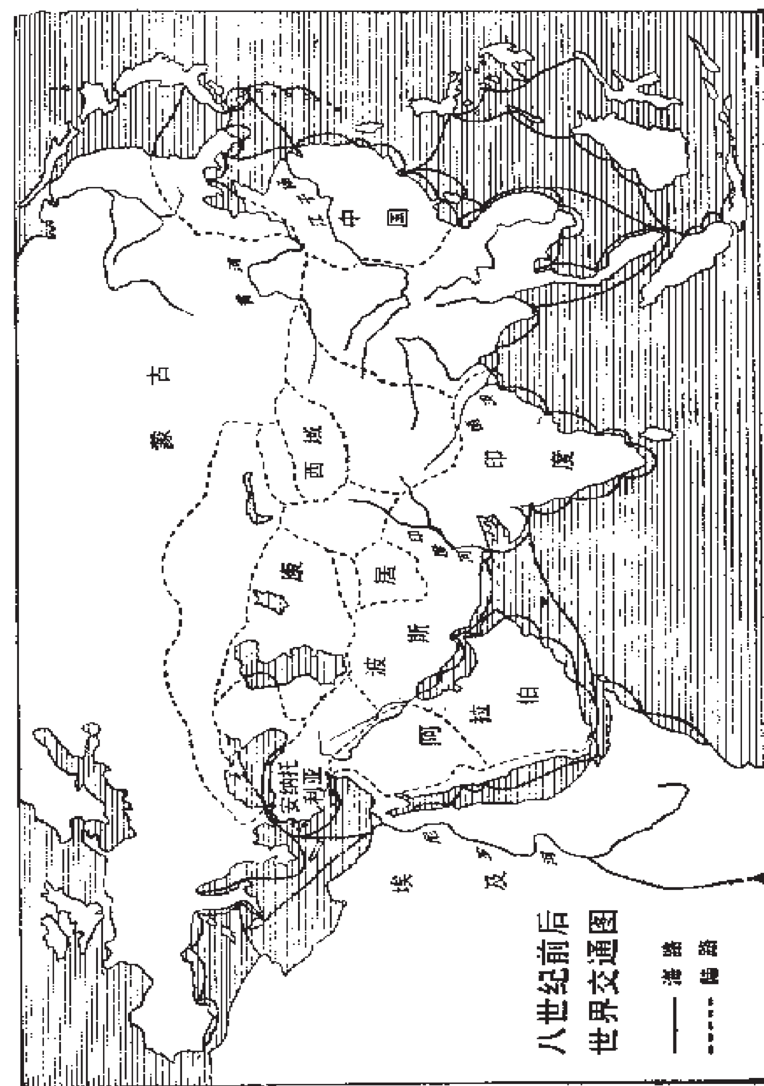
① 婆罗州，即加里曼丹岛，北部属马来西亚与文莱，南部属印度尼西亚。 ——译者

② 索可泰，即宋加洛（Sarargalok），在泰国中部宋家洛府，位于湄南河上游支流难河沿岸，自古以产陶器著名 ——译者

③ 炻器，介于陶器与瓷器之间的一种陶瓷制品，其特点是坯体坚硬，机械强度较高，砂锅即是炻器的一种。 ——译者

④ 沙捞越，原为英国保护国和直辖殖民地，一九六三年起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州 ——译者

⑤ 西里伯斯岛，今称苏拉威西岛，属印度尼西亚。 ——译者



八世紀前后世界交通图

十　陶瓷之路

——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象征

陶瓷破片正像变魔术的小铠甲片，它们彷佛进行着没有做完的梦，静寂地沉睡在中东的荒凉城市遗迹或古窑址的各个处所。凭着它们那种不加修饰的可爱模样，使人禁不住伸手去捡拾它们。在人们眼前，隐藏在这些破片之中的美妙事物，开始从里面轻快地歌唱；保留在破片之中的历史，也就轻盈地起舞了。

在中国的陶瓷破片之中，既有表面白皙光滑的白瓷，又有洋溢着淡青色的清秀的青白瓷，有时还有一种在朴素的青黄色之中刻上刚劲的线雕花纹的越州窑瓷。此外，在一种宛如静寂地凝聚着晴空的蔚兰色的青瓷堆里，还会发现混杂着一种令人有粗犷、结实之感的黑褐釉瓷。又有一种与清澈的白地和鲜明的蔚兰色图案相对照的、耀眼的白瓷青花（青釉瓷器）。偶而也还有以华丽的五彩颜色描绘的赤绘。

伊朗陶瓷的破片，那真是千变万化，色泽鲜艳，图案有趣，其丰富多采恰像是弄翻了一只当地的玩具箱。

而且，正因为是破片，所以它们不像完整品的那样傲慢和盛气凌人，每一片都很平易近人，谁都可以去捡拾它。从它的亲切之情中，我们享受到了非完整品所特有的愉快和破片的优美感。因此，当我谈论捡拾而来的破片时，它们彷佛立刻在我面前扩展起来，变成我所想像的那种极妙的、並且是尽善尽美的理想形态。像这样一种富于推理的创造性境界，在完整品中是无法获得的。说得夸大些，这种感觉与见到脸部损坏的唐招提寺木雕佛像或希腊雕的胸像一样。我之所以倾倒于陶瓷破片，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种享受吧。

不过，我对陶瓷感到兴趣，开始却並不是为了追求这种享受。二次大战以前，在中国东北（满洲）和内蒙地方，连续调查古代和中世纪的城市遗迹和人们居住的遗址，当时是作为考古学上的资料而开始搜集的。为了以它作为确定遗迹年代的资料，或者为了查明陶瓷器的性质和窑业生产的实况，因而才与中国陶瓷片发生了交往。这样，在与它们接触的过程中，才对它们发生了爱好，发现了它们的美。

随着与中国陶瓷片接触的加深，发觉这些可爱的实物，有着它们不可思议的巨大规模。当我们从中国以外的遗迹中发现中国陶瓷的时候，最容易体会到这一点。

而且在中国附近的日本、朝鲜、印度支那各国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岛屿国家，也都广泛而大量地发现了中国陶瓷。

更远一些，像南亚的印度和锡兰当然不必说，从此以西的整个西亚地区也有发现。甚至在非洲东海岸也到处有中国陶瓷的出土。阿联①首都开罗附近发现的中世纪中国陶瓷，其骇人的数量和优异的质量都使世界各国的学者们震惊，以致渴望对此进行研究，它们是怎样地被运送到如此遥远的地方来的呢？现在，虽然尚未听说中国陶瓷从欧洲的十四、五世纪以前的遗迹中出土，但寻根究底，它们是肯定能够从西西里岛或西班牙毫不费事地发现的。这些地方不仅会发现中国陶瓷，而且还会发现泰国、越南（安南）陶瓷。

在国外发现的这些中国陶瓷，当然是通过贸易方式运到那里的。虽然其中有一些，也可能是中国政府对外国国王或显贵们的馈赠，但是这种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更何况馈赠实际上也是一种贸易的形式。

如果这样，那末，研究这些中国陶瓷，就能

了解中国与亚洲各地以及地中海世界的贸易（姑且不论这种贸易是直接的抑是间接的）是如何开展的，这就涉及所谓东西方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了。

令人更感兴趣的是，这种贸易对于获得中国陶瓷的各国，在工艺技术上的刺激和美术上的影响，这就涉及到所谓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问题了。

到十九世纪末叶，终于由欧洲学者首先提出了东西方交往或东西方文化交流这个词汇。作为在这方面发展迟缓的国家，日本学者后来也同样提出了种种说法。但尽管名目繁多，而实质却並不是十分清楚的。

也许因为这个问题是欧洲学者首先提出来的，所以人们所讨论的，往往偏重于西方文物传入东亚或西方文化对东方的影响。由于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在政治力量上较东方占有优势，这就促使西方文化的东传並给予东方以很大的影响。

但是，文化交流的主流，难道确实只是“由西往东”的吗？事实显然並非如此。即使随着时代的变化其流动方向有强弱之别，但两个地区在文化和物资的交流上，绝非单向流动，而是相互交错地进行的。因此而形成的各个时代的文化交流的特点，是众所共认的。从古代到中世纪的中

国丝绸贸易和中世纪以后的陶瓷贸易，都是自东向西的文物交流的绝佳例子。

这样，贸易就成了东西方交往的纽带。但是要确切地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还得把参加贸易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贸易的性质，以及这种贸易对各国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和影响研究清楚。在近代国际贸易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诸如上述的各种探索，原是习以为常的，各国都在进行这样的研究。

但是，在研究古代或中世纪东西方交往和贸易时，却往往忽视了上述的各种研究，而多半仅仅以贸易道路、贸易品种和贸易方式作为研究的对象。当然，在东西方贸易这个课题中，贸易道路或贸易品种的研究，这是绝对必需的。但是仅仅如此，则贸易问题的研究意义就无法明确。因为，这样的研究，对于复原当时的历史情况，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所以研究古代、中世纪的东西方贸易，常易被理解为各个地区或各个时代的现象罗列，其原因就在这里。

这虽然也与研究者对历史的看法或其所关心的问题有关，但是，如果设身处地来看，却也是无可奈何的，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料，提供人们以作全面的研究。

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当然能利用考古学上

的资料。但是当时如果不能获得有关这方面的充分资料，那末，研究工作也是很难达到目的的。例如，尽管中国的丝绸享有盛名，但是却很少有作为遗物保留下来的，几乎不能在研究工作中起什么作用。

在这方面，陶瓷却是难能可贵的资料。因为陶瓷器即使损坏也不致腐烂，仍能依旧地残留在遗迹里。当然，即使是陶瓷器，在发现的数量不多，而又不能掌握其全部性质的情况下，其价值也仍然是有限的。

在前面各章中已经叙述了印度、锡兰以西，东非以东的这个地区中的七十多个遗迹，在这中间，发现了八、九世纪唐代后期至十四、五世纪元末明初的中国陶瓷。但是除了埃及的福斯塔特以外，在其他遗迹中出土的，数量並不很多。

这种情况，又该如何处置呢？实际上，这些陶瓷片的数量虽然不多，但从这些遗迹的分布和从遗迹中搜集到的陶瓷种类等方面，已足以勾划出中国陶瓷销售的扩散，陶瓷种类的繁多，以及进行贸易的年代和规模等等情况。但是，仅仅根据几个遗迹，要推测输出国对于输入国在社会或文化方面的影响，却是困难的。勉强归纳起来，作一个全面的观察，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接近研究的目标，当然，这是很不够的。

说到这里，又得重提在第一章中叙述过的、即出土于埃及福斯塔特遗迹中的陶瓷，它们无论在品质或数量方面，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个地区的问题的材料。

例如，从八、九世纪至十五、六世纪，为什么只有埃及能运到如此大量的优质陶瓷呢？这些陶瓷是怎样使用的，它们对埃及的文化有没有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陶瓷片，在某种程度上就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答案。

现在且看看福斯塔特的陶瓷片可为我们提供有效答案的情况。首先，它能告诉我们中国的内部问题，从唐朝末年历经宋、元两代以至清朝的这段时期中，中国的陶瓷产量是如何增长的，其生产技术又是如何提高的，以及中国的经济和贸易情况等等。其次，它能让我们推测，把中国陶瓷通远地运到东亚、南亚和东非，其运输手段的发展和进步情况，以及通过这种贸易而累积起来的中国、印度、萨拉逊帝国等国家的商业资本的活动情况。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沟通中国和西亚、东非的海上贸易问题了。

最后是输入国埃及接受这些商品的情况。对于埃及大量购买如此珍贵而价昂的中国陶瓷的问题，这些陶瓷片也会替我们提供适当的答案。

关于这一点，在前面第一章叙述福斯塔特出

土的元代青釉瓷器中，当说明它们的优越品质时，曾经简单地指出："总之，即使在中国，元代的青釉瓷器也被认为是价值连城的。在相隔如此遥远的福斯塔特遗迹中竟发现大量碎片，这就可以设想，或是当时的开罗市民相当富有，或是他们嗜好珍奇，或是他们喜爱中国产品，或是中国陶瓷的使用价值很高，这些原因想来必居其一，也可能是所有这些原因凑合在一起，才导致发生这种异乎寻常的事。"这就全面地说明了埃及输入中国陶瓷的情况。

再举一个这方面的例子。当我们在考察福斯塔特出土的陶瓷片时，正在附近继续发掘遗迹的美国研究中心斯金朗氏告诉我们，这里出土中国陶瓷的，不仅仅限于少数房屋，在大部分房屋里都有所发现。因此，中国陶瓷在福斯塔特一定已经普及到相当多的家庭里。我们并且还看了美国考察队所发掘的破片，其中的许多陶瓷都有很好的质量。

总之，当时开罗的财富与一般居民的生活水平，看来远比我们所想像的要高。因此才领悟到《一千零一夜》之类的书上所讲的故事，开罗是多么繁荣富裕，这决不是虚构的事实。

还有，令人感兴趣的是中国陶瓷对埃及社会的影响问题。在埃及，从八、九世纪至十五、六

世纪，陆陆续续地输入了各种不同性质的中国陶瓷，而且一旦出现新类型的中国陶瓷，不论是哪个时代的，他们随即都能把它仿制出来。输入唐三彩，就仿制出所谓埃及三彩（多彩彩纹陶器）；输入白瓷，就仿制出白釉陶器；输入越州窑瓷，就仿制出黄褐釉陶器；输入青白瓷，就仿制出青白陶器；输入青瓷，就仿制出青釉陶器；输入青釉瓷器，就仿制出白地蓝彩彩纹画陶器等等。仿制品全是陶器，而青釉陶器或白地蓝彩彩纹画陶器之类，从照片上看，几乎可以乱真。而且仿制品陶器在数量上也确实相当巨大。

中国陶瓷受到珍视，当然是因为品质优异，所以价值连城。至于为什么同时又烧制大量迎合时尚的仿制品而受人喜爱，这可能是因为当时埃及盛行的中国风尚，掀起了所谓中国热的缘故。

当时，这种风尚不仅出现于埃及，在波斯也是一样。波斯自从八、九世纪开始从中国输入了唐三彩和邢州白瓷以后，马上就仿制出瑰丽的所谓波斯三彩（多彩彩纹陶器和多彩刻线纹陶器）以及白釉蓝彩陶器。不过，这些陶器虽然基本上采用了中国的式样，却并非全盘照搬。无论哪一种类型，都加添了一些颇有波斯风味的工艺，这也许是受到波斯文化传统的强烈影响吧。

可是，十一世纪中期起，自从以青瓷为主的

精致宋瓷开始大量输入以后，波斯陶器的情况就为之一变，旧陶器（初期波斯陶器）的那种绚丽色彩和天马行空般的珍异花纹，全被弃置一旁，而变成了单色的，特别是青瓷的一统天下。器皿的形式也多半是中国风味的，甚至出现了几乎可以乱真的陶瓷碗、盘、瓶、罐之类。中国的青瓷确实对波斯陶器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陶瓷对波斯陶器的影响，以后就越来越大。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波斯陶器在这期间对中国陶瓷也产生了影响。波斯的密那伊手陶器（色绘彩画陶器）对中国的赤绘是具有影响的。又如波斯的白釉蓝彩陶器与中国的青釉瓷器的关系，波斯的拉斯塔手陶器（铜釉彩画陶器）与中国的釉里红的关系等等，都可认为基本上是由西往东的技术交流吧。

总的说来，中国陶瓷对波斯陶器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波斯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掀起了中国热，而叙利亚同样没有例外。在陶瓷器方面流行的中国热，就这样在中东地区风靡一时。

〔海上贸易〕

综上所述，任何人的脑海里都会产生一个大疑问，如此大量的陶瓷，是用什么方法运到遥远的中东地区去的呢？作为沟通东亚、西亚和地中海

世界的贸易道路，广泛流传的总是丝绸之路这个词汇。这是指由中国翻越中亚的沙漠、草原和山岭，到达波斯，然后通向地中海沿岸的贸易道路。十九世纪末叶，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②所提出的这个丝绸之路的名称，好像总是带着浪漫色彩的，因而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只有这条道路，才是古代和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主要道路。但是，这条道路的广泛利用，实际上是在七、八世纪以前。到了八、九世纪以后，应该说，东西方贸易的中心路线已经转移到海上。中国陶瓷输出开始骤然兴旺，确实也是在唐末以后。

那末，一般公认的沟通东西方世界的海上贸易道路，是在八、九世纪开始的吗？事实绝非如此，在比这更早的时代里，即公元一世纪前后，海路就已为人们频繁地使用了。根据确切记载，一世纪前后，西方国家就已经利用印度洋（埃留乌德拉海）上的季节风，开辟了从埃及到印度的航路（《埃留乌德拉海航行记》）。因此，在印度出现了好几处罗马人的居留地。他们收购印度的商品，然后运往罗马。南部印度的科罗曼德耳海岸的阿里加梅杜遗迹，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称为波都基（参阅第八章）。

另一方面，在东海上，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

前一世纪，开辟了从中国东南部的港口绕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半岛到印度东海岸的黄支国（今康契普腊姆）的海上贸易道路（《汉书·地理志》）。[③]它是东亚和近东地区之间的海路，两者汇合于印度。

或许由于这种关系，罗马的物资才源源地运往东亚。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州的鹅克雅遗迹，就是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七世纪的港口城市遗迹，从这里发现了被认为是二世纪中期的罗马皇帝安东尼厄斯·皮乌斯的金币和罗马的玻璃器皿破片。另外，从中国广州市郊的横枝冈地方的某个汉墓里，也发现了罗马制造的玻璃碗等物。一九六八年春季，我亲眼目睹了从菲律宾棉兰老岛出土的腓尼基风味的玻璃小长壶和蓝色的罗马玻璃碗（桑托斯收藏）*。

公元一六〇年（后汉桓帝延熹九年），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大秦王安敦）的使者来到中国，进贡了象牙、犀角、玳瑁等物。[④]这是著名的历史事实，它证明东亚与地中海之间的联系较以前更为密切。

海上航路一旦开辟，中国商品当然也向西方运去。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博物馆里，陈列着

* 三上：《西亚的工艺与日本》，载《东洋美术》第六卷，朝日新闻社。

中国汉朝时代烧制的绿釉陶器和黑釉陶器，并说明是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上出土的。虽然我还不能百分之百地相信这些陶器真的是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上发现的。但是，假使公元前二世纪末已经开辟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航线，那末，从爪哇或苏门答腊出土二世纪时期的中国陶器，倒也是可以理解的。

泰国曼谷国立博物馆陈列着这里出土的战国—汉代的用来作为衣带钩的玉器以及汉代的紫色玻璃球，这就使上述印度尼西亚出土的陶器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则这些物品都在汉代由海路运到上述各地的设想，大概不致有讹。

历史记载和考古学资料都告诉我们，在公元前后，已经很频繁地使用这条海上航路了。因此，这条航路也和丝绸之路一样，早已是重要的贸易道路了。

后来，随着中国与西域各国在政治上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丝绸之路上出现了种种困难。为了应付这种情况，海上航路的重要性就逐渐增加。例证甚多，且不赘述。

公元七世纪，萨拉逊帝国在西方世界崛起，而且在贸易上显露了头角，从此，海路的重要性得到了决定性的扩大。当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的黄巢之乱时[⑤]，扼南洋进出口的广州城，已经定居

了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波斯人和犹太人等十万人以上。这个事实，雄辩地证明，为了财富和商品，萨拉逊帝国的大批商人，从海路来到了这个遥远的中国。

从九、十世纪起，人们突然掀起了海上贸易的热潮，来自阿拉伯和印度方面的大船，络绎不绝地到达广州、泉州、明州（浙江省宁波）和杭州等地，他们买就货物后返回西方。另外还有中国的巨船，也张帆航行于南海。

这种情况当然与当时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的发达和进步有密切关系。到了十一、二世纪，中国已能制造可供数百人甚至上千人乘坐的大船，并且已经在远洋航行上应用了罗盘针。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不克细叙，但重要的是，由于海上交通的发达，使这种笨重而又易碎的陶瓷器的输出，变得比已往更为容易。说明这种情况的资料甚多，这里不再赘述了。

这样看来，即使在公元九、十世纪以后，中国陶瓷已有不少通过陆上交通而运输到了西方，但在中国陶瓷遍及整个西方世界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仍是海路，这是毋庸置疑的了。至于运往中东内陆地带的许多城市，当系通过附近的海港。不仅是陶瓷，就是中国出产的纺织品和其他商品，也莫不如此。

通过这种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使东西双方紧密联系，在打破中世纪时代各地区的孤立状态，并给予这些地区以时代的共同性方面，这种东西方的贸易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陶瓷则是这种重要因素的一种象征。

总之，在中世纪时代，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连结着一根坚强有力的陶瓷纽带，它同时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对于这条连结东西方的海上航路，我就姑且称它为“陶瓷之路”吧。

译　注

① 阿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埃及曾于一九五八年与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九六一年，叙利亚退出阿联；一九七一年，埃及宣布改国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译者

② 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德国地质、地貌学家，曾任柏林大学教授和校长等职，一八六八至一八七二年间，先后到中国旅行七次，并著有《中国》三卷。——译者

③ 《汉书·地理志》：“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按此国约在今印度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Kanchipuram)附近，在汉武帝及王莽时代，与中国有使节往来。——译者

④ 《后汉书·西域传》：“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后汉书》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皇帝马可·略里略(Marcus Aurelius，在位161—180)。——译者

⑤ 指唐僖宗时代的黄巢起义。——译者

跋

我于一九六四年作为一个成员，与小山富士夫、长谷部乐尔、铃木八司、松见守道、蓑丰诸氏，一起到开罗郊外的福斯塔特遗迹，对那里出土的陶瓷进行了考查。时隔五年，由阿拉伯联邦政府赠送的、从该遗迹出土的一百七十六片陶片，终于在今夏运抵东京出光美术馆。

一九六六年，我又和松见守道、铃木八司、上野佳也、重松和男、杉村栋诸氏到埃及考查出土的中国陶瓷。如今，从遥远的埃及送来的中世纪的中国和埃及陶瓷片，又重新展现在眼前，于是，脑海之中就浮现起在开罗考查时的种种往事，联想到由陶瓷而引起的人类历史上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溯昔抚今，不胜感慨。

我对中亚和西亚的历史和考古学感到兴趣，还是四十多年前在旧制高中读书时开始的。进入大学以后，就决心以此为终生事业。此后，情况

又有所变化，因为从事了东北亚的古代和中世纪史专业，兴趣就进一步扩大，从而涉及了东西方世界之间的意义广泛的接触史，即所谓东西方交往关系的研究。

这样，我才进行了陶瓷器的研究，希望通过陶瓷对于贸易、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关系，来探索东西方交往的实况。

战后，因为无法去中国大陆从事研究工作，上述希望就倍感强烈。由于偶然之间对运往中东的中国陶瓷的研究，因而发现我对于西亚陶瓷的情况茫然无知。于是又不得不对伊斯兰陶器（即所谓波斯陶器）进行了研究，并且引起了兴趣，这样不知不觉地消磨了二十年岁月。

对中国陶器和波斯陶器的研究，进展都很缓慢，时日推移，才逐渐稍具规模，于是就受人怂恿而写作了此书，实际上还有许多问题未曾解决，所以此书只不过是一块研究过程中的里程碑罢了。

在世界史上，东西方贸易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希望年富力强的研究者，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持之有恒的钻研，以获得更为巨大的成就。

我还希望在此书的读者之中，如有知道中国陶瓷在南亚、西亚等处的出土地点和其他情况，能够惠示详情。

在此书中，我原想以第十章“陶瓷之路”为重点，但由于前面的几章已经写得太长，限于篇幅、时间和精力，因而不能尽如所愿，深为遗憾。另外，初次写作这样一类的书，文字也恐非流畅，实感抱歉。

照片多数是我所摄的，其中有的是为了纪念意义而收入。对于本书中引用的其他照片，除注明来源外，谨在此志谢。照片有助于说明情况，当然多多益善，但因限于篇幅，所以也无法尽如人意。

最后，向耐心等待我这个怠惰人好几年，又随时教促和鼓励我的岩波书店的高卓茂先生深表谢忱。

三上次男于北镰仓松冈白水书屋。

一九六九年七月。

译后记

本书著者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上次男，是一位著名的陶瓷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于一九〇七年出生在日本宫津市，一九三二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早年，他从事于东北亚历史的研究，曾著有《金代女真族研究》、《古代东北亚研究》、《金史研究》等专著，成绩斐然。五十年代中期起，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陶瓷的研究，曾多次奔走于有中国陶瓷出土的埃及、伊朗、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并且遍访展览中国陶瓷的土耳其和欧美各著名博物馆。他的考察研究工作是十分艰苦和繁重的，在两次埃及之行中，曾经对那里出土的六、七十万片古代陶瓷片进行了逐片的检查，最后选出了中国陶瓷一万二千片，为此付出了巨额的劳动，也因此获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

由于著者对陶瓷的精湛研究和高深造诣，所以在日本和国际陶瓷学界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他

现任日本东洋陶瓷学会常务委员和贸易陶瓷研究会会长。他的有关陶瓷的著作甚多，很难一一列举，其中如《波斯陶器图录》、《波斯、埃及和土耳其的陶器》、《托普卡普萨拉伊的中国陶瓷》等等，都是很重要的着作。至于本书，自从一九六九年初版发行以来，十年之中，已再版了十一次，成为世界陶瓷学界的一本名著。正如日本小学馆出版的《世界陶瓷全集》第十一卷所评价的："三上次男博士所著《陶瓷之路》，记录了目击器物，是一部杰出的著作"。为此，译者有机会把这样一本陶瓷名著介绍给中国读者，真是不胜荣幸。

特别还应指出的是，在本书翻译过程中，三上教授也花费了不少精力。他不仅为中译本写了序言，而且还寄来了本书的全部照片。为了让中国读者看到祖国古代陶瓷的更佳形象，三上教授特地又在他历年拍摄的照片中，精选了萨马腊出土的中国白瓷照片四帧，皮纳格巴亚南遗迹的中国陶瓷器和桑多斯收藏的中国越州窑陶瓷器照片各一帧，取代了本书的原有照片，使中译本较原著第十一版在照片方面更胜一筹。

三上教授是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常务理事，他三十年来在中国古代陶瓷的研究上获得了重要的成就，如今又为本书的中译本尽了他的心

力，因此，在这两个比邻国家的文化交流上，他的确已经作出了出色的贡献。谨借此向他深表谢忱。

译　者

一九八二年春于杭州。

（中译本地图清绘：吕以春）